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 归侨将领

# 传奇

吴辅佐  
麻新林  
王宏德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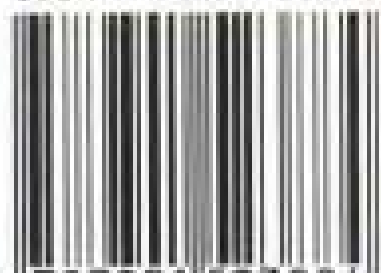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 琳 © 封面设计 张宪峰



ISBN 7-80152-388-1



9 787801 523884 >

ISBN7-80152-388-1/1095

定价：20.00 元

●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 归侨将领传奇

吴辅佐 唐新林 王宏德 编著

黄河出版社

2002年 济南

责任编辑 程 鹏 封面设计 张宪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吴辅佐,扈新林,王宏德编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2.7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ISBN 7-80152-388-1

I. 归... II. ①吴...②扈...③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868 号

**书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著者** 吴辅佐 扈新林 王宏德

**出版** 黄河出版社 (邮编:250002)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印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4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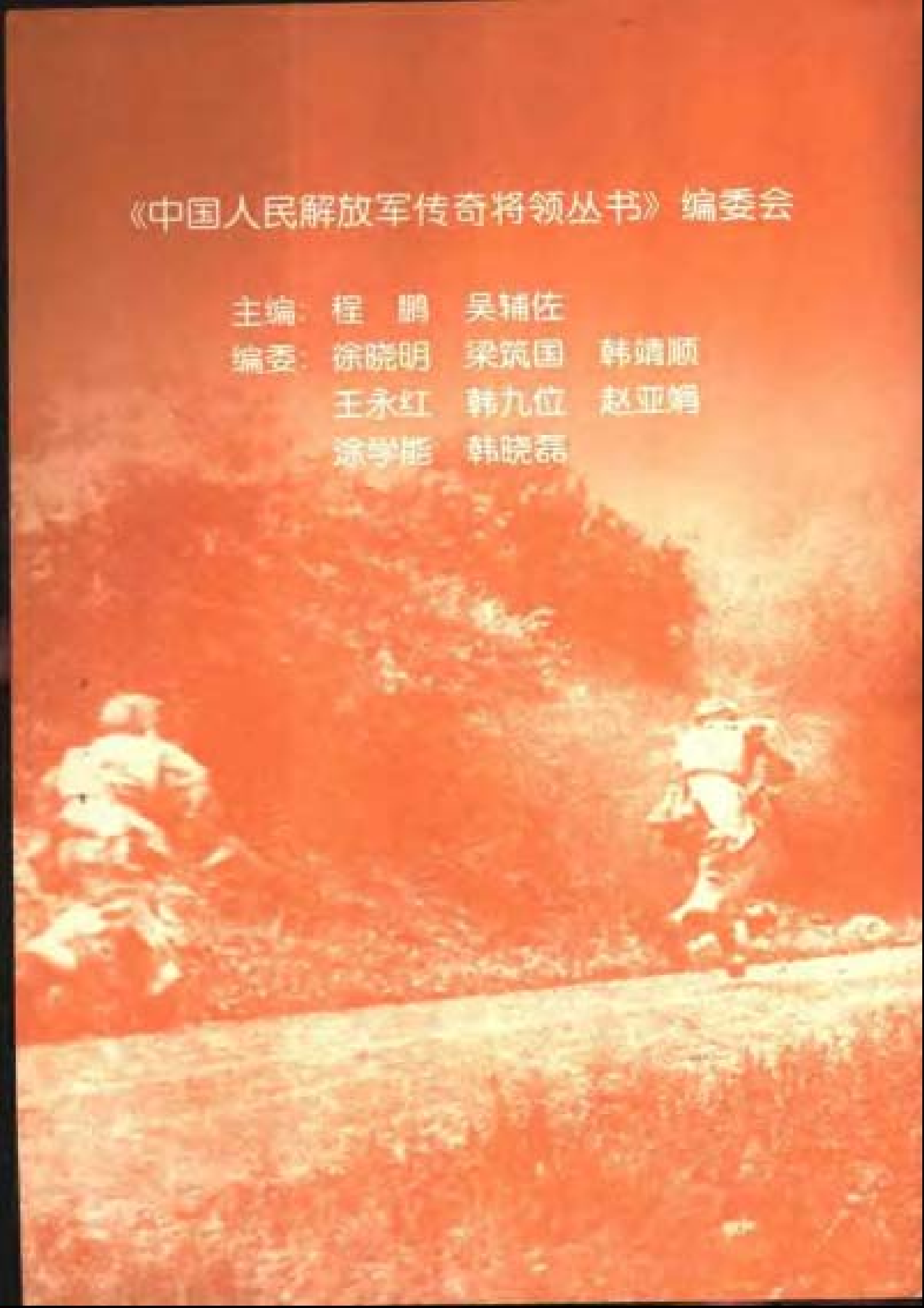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7-80152-388-1/I·095

**定价** 20.00 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编委会

主编：程 鹏 吴辅佐  
编委：徐晓明 梁筑国 韩靖顺  
王永红 韩九位 赵亚娟  
涂学能 韩晓磊





## 前 言

本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之一部。

翻开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955年授衔的1000多位将帅当中,有6位海外归侨,他们是马来西亚归侨叶剑英元帅,菲律宾归侨叶飞上将,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归侨庄田中将和卢胜中将,旅俄归侨唐铎少将,澳大利亚归侨曾生少将。此外还有1961年授衔的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归侨吴克之少将,1964年授衔的印尼归侨叶松盛少将和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归侨陈青山少将。这些归侨将帅们,为自身生存,受尽了海外漂泊、外国人歧视之苦;为寻找真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投身革命;为人民解放,他们率军拼杀,血洒疆场;为江山永固,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建立了不朽功勋,谱写了一串串动人故事,留下了一段段传世佳话,令人深思,掩卷难忘。

本书浓墨重彩,气势恢宏,以传奇的形式,对归侨将军们的非凡经历、艰苦磨难进行了精彩纷呈的展示,对他们的多彩生活、人生变故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对他们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忧国忧民、戎军爱国的拳拳之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视，又对他们为民请命、立党为公的高尚风范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讴歌了叶剑英等归侨将帅的爱国之情、仁厚之心、革命之志。

军旅作家吴辅佐、扈新林、王宏德经过大量资料收集和文学创作，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本书融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于一体，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之际，奉献本书，意在告慰那些长眠于斯的前辈们，也教育那些生长于斯的后人们。

该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革命前辈的指教，参照了许多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还参阅、摘录、引用了一些党史、军史资料，并选用了有关照片。由于材料繁多，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谨向革命前辈、文学同仁表示诚挚的谢意，并竭诚期待所用材料的原作者指正。该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黄河出版社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 目 录

## ★ 元帅鸿儒叶剑英 ..... (1)

1. 一剑击倒日本教官,狂武士乖乖地交出自己的佩刀
2. 担任孙中山先生的高级随员,掌管军令事宜,少将师长叶剑英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叶剑英第一次密报,贺龙、叶挺脱险,才有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4. 叶剑英第二次密报,中央红军安然脱险,毛泽东说:“叶剑英关键时刻立了大功!”
5. 面对特务暗杀,叶剑英指着弹孔幽默地说:“凭这枪法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嘛!”
6. 亲临一线逮捕“四人帮”,干净利索结束“文化大革命”

## ★ “飞将军”叶飞 ..... (37)

1. 亲妹妹找当省长的哥哥叶飞借钱,竟难倒了这



位“共产党的大官”

2. 特务向叶飞连开两枪,尔后又补了两枪,叶将军大难不死
3. 飞身跳悬崖,叶将军再次脱险
4. 部队东进,陈毅拍着胸脯对叶飞说:“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5. 叶飞“导演”《东进序曲》中最精彩的一幕。刘少奇说:“古有飞将军李广,今有飞将军叶飞。”
6. 叶飞率一、四纵艰苦转战,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主席来电:“很感欣慰!”
7. 兵败金门,叶飞司令员不堪回首的一页;炮击金门,毛主席说:“还是请叶飞同志负责指挥!”

★ 常胜将军庄田 ..... (111)

1. 谋生新加坡,幸遇党组织,境外秘密入党;派遣莫斯科,学习军事,后成大事业
2. 倍受周恩来器重的优等生,果然不负厚望
3. 三天熟背全部密电码,历时四个月闯关过隘赴琼州



4. 冒险偷渡香港, 辗转南京晋见周恩来; 据理力陈利弊, 毛泽东收回琼纵北撤命令
5. 进驻中缅、中越边界, 封锁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通道
6. 庄田告诫亲友: “我在共产党里做事, 你们不可倚官恃势, 给政府添麻烦。”

★ 文武奇才卢胜 ..... (149)

1. 被迫走南洋, 两次被逮捕, 追求真理信念不改
2. 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 使敌闻风丧胆
3. 虎落平阳, 被困漳州城; 深夜出逃, 重建革命武装
4. 文武兼备, 深受叶挺赏识; 能征善战, 受到陈毅称赞
5. 虎口夺路, 日军目瞪口呆; 郭村解围, 陶勇、卢胜百里驰援
6. 击毙张灵甫, 打死黄伯韬, 活捉杜聿明, 卢胜将军功不可没
7. 炮击英舰, 把“米”字旗打得粉碎; 飞渡长江, 卢



将军勇往直前

★ “留苏学子”唐铎 ..... (185)

1. 留法勤工俭学,同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一道被法国遣送回国
2. 走上航空路,亲眼目睹宋庆龄登上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
3. 苏军服役 28 年,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宴请
4. 面见刘亚楼,唐铎报效祖国的愿望得以现实
5. 中苏关系恶化,唐铎被打成“苏修特务”,关押七年之久

★ “东江猛虎”曾生 ..... (209)

1. 面对校长高高举起的教鞭,曾生猛冲上去,夺过教鞭,折成两段
2. 报效祖国心愿未了,却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监狱
3. 抗日宣誓:“谁不抗日,天诛地灭!”
4. “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



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5. 国民党宣布:“曾生部被歼灭。”可时隔不久,曾生又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6. 营救避居香港的文化人士,邹韬奋为曾生题词留念:“承蒙卫护,不胜感奋。”
7. 转战华东立奇功,毛泽东问:“你就是大闹广东教育厅的曾生?”
8. 叶剑英力保,举荐曾生担任海军舰队副司令、广东省副省长,但还是被黄永胜投进了秦城监狱

★ 琼崖将星吴克之 ..... (259)

1. 迫于生计,加入国民党军队,揭发反动军官贪污案,被罢免职务
2. 营救符哥洛,终于找到了党。营救冯白驹,再次被撤职
3. 国民党高级官员惊叹:“共产党游击队中竟有此等优秀人才!”
4. 指挥斗门村战斗,击毙敌琼崖守备副司令李春农



5. 拔据点,反扫荡,吴克之抗日逞英豪
6.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吴克之腾挪有道
7. 指挥琼崖纵队一举突破被薛岳称之为“东方马奇诺”的“伯陵防线”
8. 担任防化研究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贡献,却被江青污蔑为“白色据点”

★ “两栖战将”叶松盛 ..... (289)

1. 叶父赠诗:“亲患未报无须计,需平天下不平人”
2. 叶剑英安排叶松盛赴延安深造,一代战将终有用武之地
3. 陆军改空军,叶松盛有板有眼;指挥打敌机,荣获朝鲜国旗勋章
4. 亲率空四师驻防广州,为毛泽东护航
5. 咬断牙,打断腿,坚决不揭发叶剑英的“罪行”

★ “黎乡之鹰”陈青山 ..... (313)

1. 告别病重的父亲,只身逃往新加坡



2. 刚出虎穴, 又入狼窝, 陈青山带领难友机智越狱, 成为琼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3. 与少数民族首领“歃血为盟”的动人故事
4. 冯白驹破例为陈青山的婚礼批了十块大洋, 陈青山感激地说: “司令员, 我们的婚礼太隆重了。”
5. 接应四十军渡海登陆, 为解放海南岛铺平海上通道



## 叶剑英

(1897—1986年)

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 1. 一剑击倒日本教官，狂武士乖乖地交出 自己的佩刀

1916年春天。

隆冬刚过，春寒袭人。

年轻的叶剑英为了生计，离别家乡——广东省梅县，漂洋过海来到了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怡保，开始了他的侨居生活。

世间穷困一样苦，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异国他乡的怡保，叶剑英受尽了资本家的欺压和外国人的冷眼。

祖国贫穷落后，人民穷困潦倒，华侨备受歧视，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着叶剑英的心。

他深感生活无着，报国无门。

正在这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人赴南洋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国人云南讲武堂，免费就学。于是，叶剑英毅然报名，成为第一批回国人讲武堂学习军事的海外华侨的一员。

云南讲武堂坐落在美丽的昆明翠湖西岸的承华圃。

这个讲武堂，创办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的师生积极发动“重九”起义，对光复云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2年，民国建立。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扩大学校规模，将讲武堂改为讲武学校。

袁世凯叛变后，蔡锷与唐继尧等高举义旗，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讲武学校名声大振。但是好景不长，自蔡锷将军患病去日本就医以后，学校被唐继尧一手把持，从而讲武学校也变成了他扩充实力的工具。



叶剑英到云南讲武堂后,先接受半年的军事训练。对叶剑英来说,军事学习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刚入学的他兴奋不已。

叶剑英认识到: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当为先驱,有文才、有谋略者可为后盾。他决心学得文韬武略,将来驰骋疆场,为国效力。

为此,叶剑英改名立志,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

经过半年入伍训练以后,叶剑英正式进入学习阶段。第一学期学习基础学科,第二学期被分配到炮科。

叶剑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学习生活中,刻苦钻研军事基础理论知识,努力学习军事技术本领,本专业各科成绩优异。

除学好炮科知识与技能以外,他还经常跟着其他与之交友的教员学习马术与劈刀术等。

由于唐继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此,云南讲武堂聘请了不少日本教官。

其中有一名日本中尉,此人出身于日本武士之家,精于劈刀术,经常找师生比武,每场必胜,因此自以为了不起,整天耀武扬威,瞧不起中国师生。

而且此人经常违反只能用竹剑劈刺的基本规则,扬言谁敢与他比试就要用真刀。

叶剑英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于是,他暗下决心,要灭一灭这个日本教官的威风。

叶剑英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同宿舍的一位名叫金至顺的朝鲜族同学。

金至顺早就盼着有一位中国人能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日本教



官,为国人争口气,没等叶剑英说完,便连声叫道:“好!好!剑英,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从此,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每天天不亮就来到操场,摆开阵势,你来我往地对劈对刺起来,一练就是数百个回合。

经过半年时间的苦练,他们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于是,叶剑英主动约那位日本教官比武,对方大感意外,他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的,哪里的干活?”

“炮科十二期学生叶剑英。”

“噢!”

日本教官重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早就听教官议论过,炮科有位文武兼备、苦练剑术的中国学生叶剑英。

只是这个日本教官一向盛气凌人,根本不屑于同中国学生们来往。所以,对叶剑英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叶君,我们的比试,是要用真刀的,你的明白?”

“我早就清楚了!真刀就真刀,我们一言为定!”

第二天一早,日本教官如约而至。

叶剑英早已在操场等候多时了。

比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操场上密密匝匝地围满了前来观战的教官和学生。

双方穿好了规定的防护服。在一位教官的裁判下,比武开始了。

那个日本教官的功夫果然好生了得。只见他一边“呀、呀”的大叫,一边双手舞刀,寒光闪闪,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对准叶剑英的头、胸、腰三处要害猛劈,凶狠无比。



叶剑英不敢怠慢,闪转腾挪,左推右挡,俩人走马灯似地战在一起。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场子里只听得两人的钢刀叮当作响。

20分钟过去了,俩人已斗了数十回合。使出浑身解数且想速战速决的日本教官,眼见久战不决,心中不免焦躁起来,暗暗后悔当初不该小瞧了对手。

他这一分神儿,脚步已乱了,攻势已弱了下来。

叶剑英见状大喜,迅速地转守为攻,连劈带刺,一招猛似一招,直逼得日本教官连连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

正待他虚晃一刀,企图脱身之际,叶剑英一个箭步,疾跃上前,大喝一声,举刀凌空劈下。

对方慌忙举刀抵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了下面,狠劲向下压去,对方则拼命向上顶着。

两人对峙了几分钟,日本教官的脸色慢慢涨成了猪肝色,接着双脚一软,“咕咚”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口中连声说道:“轻一点,轻一点,我的,认输!”

“好哇!”人群中一阵喝彩。

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叶剑英高高地举过头顶,连连抛向半空。

金至顺更是兴奋异常,眼里饱含泪花,激动地抱着叶剑英,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场酣斗,使日本教官对叶剑英的劈刀术心悦诚服。

按照日本武士的规矩,他从地上爬起来,立正,向前走了几步,向叶剑英深深地一躬,将自己随身佩带的劈刀作为礼物赠给了叶剑英,以表示敬意。

这把战刀后来一直保存在叶剑英身边,舍不得丢掉。

1919年12月22日,叶剑英以优异成绩从云南讲武堂毕业。



“宝璧”号冒着被击沉的危险，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终于驶入了敌军的射击死角。

“给我狠狠地打！”

随着叶剑英的一声怒吼，海军陆战队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一条条火舌向岸上喷射而去。叛军士兵纷纷倒地。

如同一把利刃直抵喉间，叛军炮兵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无从施展。敌军只好舍弃大炮，拼凑起轻重武器，同“宝璧”号对射起来。

弹雨如注，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突然，指挥战斗的叶剑英发现舰上的重机枪不响了。他急忙跑过去一看，原来射手已中弹牺牲。他不由分说，扔下手中的驳壳枪，大声命令副射手：“给我装子弹！”

未等说完，又一阵子弹打在甲板上，火星在叶剑英的面前四溅。

叶剑英操起重机枪，猛烈地向敌人扫射过去，直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

这时，其他舰只也跟了上来，一边向前挺进，一边组织火力还击。叛军渐渐不支，最后抱头鼠窜。

经过这番血战，孙中山率领的弹痕累累的舰队，终于进到白鹅滩，然后抛锚驻扎，等待增援。

在孙中山广州遇险的55天里，叶剑英一直在孙中山身边，率领士兵护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表现出忠心耿耿、威武不屈的英勇气概。

8月9日，面对强敌，加之帝国主义干涉，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道香港赴上海，陈炯明把持了广州军政大权，海军各舰队被迫缴械。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叶剑英决定暂避香港,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揭露陈炯明的叛变真相。

1922年10月中旬,北伐军许崇智部打垮了北洋闽督,攻克福州,革命局势出现转机。孙中山一面派人劳军,一面将入闽粤军组成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

又将驻广西的桂军、滇军以及驻西江一带的粤军组成西路讨逆军。

身在香港的叶剑英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福州,被委任为东路讨逆军总部参谋。讨逆军第八旅旅长张民达听说叶剑英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又是梅县老乡,积极要求叶剑英到该部当参谋长,经过许崇智的同意,叶剑英到第八旅赴任。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又下令讨伐陈炯明。16日西路军攻下广州,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设立大元帅府。

之后继续讨伐陈炯明,前锋直指陈炯明的老巢惠州。

叶剑英与张民达率领第八旅大战言岭关,全歼熊略部,解围博罗,克服泰美,连战皆捷,屡建战功。

此役叶剑英谋划辅佐,功不可没。从此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粤军战将,与张民达一起多次受到孙中山的褒奖。

可惜的是,讨逆军不是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各路人马各怀鬼胎,虽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是,终究难逃脱失败的命运。

正当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之际,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援助之手。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功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从此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创办军官学校,组建真正革命的军队是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的一个重大决策。

叶剑英在廖仲恺的邀请下到黄埔军校参加筹备工作,并留任教授部副主任,主管军事理论教育,担任兵器学的授课任务,成为黄埔军校中一位很有威望的领导与教官。

由于叶剑英从内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他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是由于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的人党要求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批准。

1924年5月,孙中山统一改编各路粤军,原粤军第八旅被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叶剑英被任命为师参谋长,师长张民达。他时常往返于军校与二师之间,工作非常繁忙。

1924年7月,陈炯明再次令叛军威逼广州,孙中山不得不推迟北伐部署,反击叛军的进攻。

应师长张民达的请求,叶剑英奉命返回建国粤军第二师参加平定叛军的行动。

连平一战,震撼敌军,各路叛军不敢再出战,陈炯明重返广州美梦又一次破灭。

第二师移防广州,为配合黄埔军校的教学,第二师奉命组建香洲独立营,叶剑英出任香山县县长,并兼独立营营长。

1924年7月,陈炯明贼心不死,又与广州大买办头子陈伯廉勾结,策动广州商团叛乱。叶剑英又奉命从香洲赶回二师,协助张民达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行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赴京共商国事,陈炯明认为反扑时机又来了,自任“救粤军总司令”,于1925年1月7日大举进犯广州。



广州大本营决定东征，第二师作为东征军右翼先头部队，在张民达及叶剑英的指挥下，在其他各军各怀异志，作战不力的情况下，与黄埔军校教导团精诚团结，紧密合作，首克石龙，酣战淡水，横扫潮梅，取得了重要战果。

在作战中，叶剑英亲自侦察，周密计划，被誉为有勇有谋能文能武的“儒将”。肃清梅县残敌后，叶剑英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梅县县长，把一个乱世梅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老百姓的拥护。

1925年3月，二师师长张民达不幸溺水而死，叶剑英痛失挚友，悲痛万分，与二师司令部人员一道支撑危局。

1925年5月，香洲独立营与第二师缉私营合并，扩大为二师新编团，叶剑英被任命为新编团团长。

1925年6月，叶剑英率二师从东征前线回师，参加平定了杨、刘之乱。

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民党把广东的大元帅府制政府改组成委员制的国民政府。8月，将广东的各系军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五个军。叶剑英所在部队被合并到第一军，他仍然担任新编团团长，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不久，陈炯明又准备进攻广州，国民革命军奉命进行第二次东征。

10月初，叶剑英新编团奉命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一支队，叶剑英任支队司令，率部配合友军攻克惠州，部队留守惠州，维持治安。

蒋介石看到叶剑英文武双全，能攻善守，是个将才，12月电调叶剑英任其嫡系教导师二团团长。不久教导师改为二十师，叶剑英被提升为副师长。

叶剑英在军事上大展宏图的同时，与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共产



党人周恩来等人亲密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共产主义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政治上更加成熟,也越来越靠近共产党。

1926年7月,在广州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蒋介石让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代理第一军军长,接着又令第一军担任总预备队,叶剑英被调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率第一、二师随蒋介石北伐。

9月,在争夺南昌的战役中,总预备队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叶剑英劝告,争功逞能,急于进攻,孤军突进,被分割包围,王柏龄见势不妙,又贪生怕死,率先逃跑,叶剑英只好组织部队仓促撤退,部队损失惨重。后在武昌北伐军的支援下才攻克南昌。

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痛斥王柏龄等人的无能,特别准许叶剑英佩剑晋见,并要叶剑英当一师师长以拉拢他。叶剑英认为一师是蒋的嫡系,难以管束,关系也很难处,而蒋的面目一时还看不清楚,于是借故巧妙地推辞了。

南昌战役后,蒋介石为了扩充实力,决定将收编的赣军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担任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部队成分比较复杂,但叶剑英规定从师到连各级都仿照苏联红军,设立党代表,多由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党员担任。叶剑英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军纪。

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以后,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为一支较可靠的革命力量。第二师组建不久,就奉命开赴吉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江西也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摆在叶剑英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留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享受荣华富贵。另一条



路就是脱离蒋介石,继续革命。

此时的叶剑英已认清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真面目,毅然选择了后者,通电全国,公开反蒋。叶剑英的这一行动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在第二天别人向他报告时,仍将信将疑。

叶剑英通电反蒋后,积极进行新编第二师在吉安暴动的准备工作,但吉安的反动派也加紧了行动,叶剑英决定先去武汉进行联系。

叶剑英离开吉安后,二师中的左派分子随即举行暴动,但由于缺乏经验,又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的第三军缴械了。

叶剑英也被开除出国民党,并受到通缉。

此时的武汉,在革命的旗帜下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叶剑英到达武汉后又一次陷入了迷惘之中。

武汉政府故意拖延时间,拒不支持新编二师的暴动。叶剑英想先回吉安,但到了南昌以后,知道了吉安的情况,不得已又返回武汉。

当时在武汉,叶剑英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位是邓演达,另一位是张发奎,张发奎因北伐战功卓著,升任为被称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叶剑英到四军任职。

武汉政府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与西北的冯玉祥联合,进行第二次北伐。

由于冯玉祥与武汉政府意见不合,北伐受挫,第四军由郑州班师武汉,不久,叶剑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并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和在国民党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当秘书长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

在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叶剑英将他在山上听到的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开会,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

叶剑英沉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解的内情和盘端出。

叶挺听后,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

叶剑英、廖乾吾、高语罕都支持贺、叶的意见。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贺、叶不上庐山;二是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去南昌;三是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叶剑英最后对叶挺、贺龙等人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甘棠湖上的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事后,汪精卫、张发奎数次发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不成,就连下数道命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严令贺、叶将部队



立即撤回九江,并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领导人。

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消息,又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廖乾吾。廖及时转告给了恽代英、高语罕等人。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守军三千多人,占领南昌城。8月3日,起义部队按照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张发奎一下子丢掉了一个军及近两个师,气急败坏,又接到蒋介石及汪精卫追剿贺、叶的电令,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对策。

多数人主张立即派兵尾追,情况十分危急,叶剑英更是心急如焚。如果重兵尾追,起义军势必遭到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思考,叶剑英决定利用张发奎一心想重回广东立足的企图,“劝”张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而将部队转向广东。张发奎经不住能重回广州的诱惑,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为起义军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保存了革命火种。

8月4日,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由武汉抵达九江。该团前身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一天曾下令消灭军校师生,是叶剑英动员张发奎以“左派”领袖的招牌出面交涉才保存了下来,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教导团原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可是在赴南昌途中受阻,错过了起义时间。当该团抵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下令要全团缴械“清党”。

为保护这支革命武装,叶剑英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自请兼任教导团长。



叶剑英的到来使教导团官兵心中升起了新的希望,军心很快稳定了下来,离队的人员也陆续回来了,从而保护了这支革命力量。

不久,为了缩小目标,缓和与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在叶剑英的建议下,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又被改为第四军教导团。

8月中旬,叶剑英离开军部,亲率教导团沿赣江南下,进军广州。经过千里行军,于同年9月底到达广州。

### 4. 叶剑英第二次密报,中央红军安然脱险, 毛泽东说:“叶剑英关键时刻立了大功!”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

张国焘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发展的形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

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

会后,张国焘回到理县的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

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6月1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7月18日决定把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给张国焘。

张国焘这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期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徐向前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

张国焘也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

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

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统一指挥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8月初,红军总部又决定将第一、第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



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毛泽东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处处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

他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并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

中共中央多次电示张国焘,劝其改变立场,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不但对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要其北上的指示不予理睬,而且于9月9日背着中央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与其会合后“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叶剑英。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语气很强硬,主要的意思是坚决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

叶剑英一看事态严重,觉得应该马上报告给毛主席。他心里虽然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他悄悄出去,飞快地跑到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看完电报后也很紧张,急忙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的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当叶剑英赶回去的时候,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他这才拿出电报交给陈昌浩。

后来,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急忙去了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从而避免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大灾难。

临走时,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叶剑英,对他说:

“老叶,你也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虽然知道有危险,但是他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他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

于是,他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叶剑英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先对徐向前说:“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

徐向前说:“好!”

得到徐的同意后,叶剑英马上写了一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

通知上说,当晚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

通知写好之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应该先准备粮食。

接着,叶剑英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



李克农、萧向荣等七八个人。

叶剑英讲了这个事情,并且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也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行动。”

会后,叶剑英回到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的一个喇嘛庙里。可是他怎么能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好不容易熬到1点45分,叶剑英连忙爬起身来,把事先悄悄拿来的全军惟一的一份甘肃省地图带上,把大衣一穿,就往外走。

就这样,叶剑英一个人离开了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了路。

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了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

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觉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

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

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岔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

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还不快走!

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

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团部队时,已是拂晓时分了。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着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陈昌浩发觉中央单独北上后，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张国焘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在其他时间和场合也多次谈到这件事，60年代初，毛主席指定薄一波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薄一波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曾与杨成武谈起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周恩来在1972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剑英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



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

叶剑英逝世后经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胡耀邦于1986年10月29日代表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再一次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说毛泽东同志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 5. 面对特务暗杀,叶剑英指着弹孔幽默地说:“凭这枪法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嘛!”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统治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绝望境地,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溃退到华南和西南一带,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我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敌人,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党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同时确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率,向华南进军。

经过一个时期紧张的南下准备工作,1949年10月21日,叶剑英到达广州。

从此,刚刚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叶剑英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长的身份,开始了他主政华南三年不平凡的生涯。

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已建立,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正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和考验。

尤其是获得解放较晚的华南地区,国民党潜伏和遗留下来的大批特务、土匪及各种反革命残余势力到处进行着十分猖獗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广大农村的封建势力尚未被摧毁,土地改革尚待实施,城市经济千疮百孔、濒于崩溃,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帝国主义者和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幸灾乐祸地预言:共产党在华南是无法立稳脚跟的。

面对严峻的形势,叶剑英从进城的第三天,就接连不停地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调查情况,讲解政策,征求意见,商定对策。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各方面工作进展迅速,成就斐然。

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华南地区的形势好转。

随着一份份签署着叶剑英各种职务大印的文件的下达和深入实施,城乡各地的面貌一天天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天提高,辽阔美丽的华南大地到处呈现着“建设新华南,创建新生活”的沸腾景象。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在军事骚扰、政治谩骂、经济封锁等各种手段遍施殆尽、一筹莫展之际,便又使出了武力暗杀这一惯用的伎俩。

1950年年初,国民党特务当局在香港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只有一个:秘密潜入广州,伺机刺杀中共



小李顿时觉得这辆卡车有点可疑。司机小吴也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于是,小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叶剑英。他听了后非常镇定,示意要适当采取应急措施,但不要慌,要注意观察,沉着应付。

为防止意外,小吴减慢了车速,小李则拔出手枪,推弹上膛,两只虎虎有神的眼睛紧盯着卡车上的动静。

前面出现一条岔路,小吴一踩油门,准备出其不意,加速超过去。突然,那卡车后厢上的帆布猛然挑起,从里面伸出了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只听得“哒哒哒!”一长串子弹向叶剑英的座车飞来!

“首长,低下头!”早已处于临战状态的小李一边大叫,一边迅速举枪射击。

卡车上的敌特见“猎物”已有准备,作贼心虚,连忙驾车窜上岔路,向沙河方向逃去。

面对这突然出现的险情,叶剑英丝毫不为所动。

他收起了刚才一直翻阅的文件,用力拍了一下小吴的肩膀,示意他赶快离开此地。小吴飞一般地开着车,不一会儿,便到了住地。警卫部队闻讯立即出动,往沙河方向追捕凶手去了。车上的三人都安然无恙,只有小车车头部位中了一枪。警卫人员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嚷嚷着要“限制”叶剑英今后的公开活动。

叶剑英走到车前,用手指着弹孔,幽默地说:“你们瞧,就凭这枪法,用不着大惊小怪嘛!应该想法通知毛人凤,再派特务来行刺,非得带上一门美式榴弹炮才行。”

一句话,逗得大家大笑起来。

人们常常喜欢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来赞誉那些威严持重、稳如泰山的将帅。



对这两句赞美之辞,叶剑英元帅当之无愧。

他在极其危险的境况中表现出来的坚定、勇敢、沉着、无畏的高贵品格,令后人叹为观止。

### 6. 亲临一线逮捕“四人帮”,干净利索结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叶剑英对于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高喊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开展四大”、要“横扫一切”军内“牛鬼蛇神”一套乱军活动十分反感。

他认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人民军队要稳定,一定不能乱!如果军队乱了,敌人就会乘机而入,就无法应付了。

为此,他同几位老师一起,为军队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为了稳定局势,防止“造反派”自毁长城,动员军队院校师生离京回校,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于11月中下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连续召开两次“十万人大会”。

在大会上,叶剑英和陈毅等老师讲话,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叶剑英有针对性地指出:“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他还说:“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啃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1967年1月中旬,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



的专题发言。会上,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接抗争。

他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面对江青的淫威,义正词严,拍案怒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反党乱军的活动,以致右手第五指远端骨折。

经过激烈的斗争,他参与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被毛泽东批准颁发了,这个文件对当时稳定军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在2月14日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又再次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他的话给了林彪、江青等人以一针见血的揭露,抒发了一位共和国元勋的浩然正气。

不久,叶剑英被林彪一伙诬陷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蒙冤受屈,尔后实际上被林彪一伙剥夺了在中央军委的领导权力。

1969年10月,他被疏散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到不应有的磨难。

1971年9月13日,林彪见罪行败露,贸然叛逃,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对于叶剑英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高声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



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

就这样，毛泽东亲自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也为叶剑英平了反。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

不久，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

一个是刚刚复出不久、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

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

对于这两个“眼中钉”，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们紧锣密鼓，异口同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他们针对毛主席对邓小平有看法，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在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

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



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面对“四人帮”的种种篡权阴谋活动，叶剑英避开了“四人帮”的监视，同党内、军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秘密商谈，讨论解决江青之流祸国殃民分子的办法。

他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交谈，沟通思想，共商清除“四人帮”的计策。

此后，他又与政治局其他领导共商大计，认定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

最后，他和华国锋等人一同作出了重大的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在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

国庆节刚过，“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发动政变，公开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

时间紧迫，“四人帮”就要下手了，叶剑英感到不能再等了。

于是，他与华国锋等人商议，决定在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

经过周密布置，中央办公厅发出了通知：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以及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

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也能到场，通知他参加修订文献，列席会议。

6日晚7时多，叶剑英就赶到了中南海，此时，华国锋已等在那里。



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与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一会儿,王洪文就来到了怀仁堂的正厅东侧门,他心里想着政变成功的美梦,脸上一副得意的神色。

突然,他看到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向他冲了过来,一下子明白上当了,于是一边大喊“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一边拼命反抗,但他怎么敌得过两个膀宽腰圆的战士呢!很快就被推倒在地,押到华国锋和叶剑英的面前。

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着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说:

“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

“狗头军师”张春桥戴着一副眼镜,夹着公文包,摇头晃脑地来到了怀仁堂,隐隐约约觉察到这里的气氛好像有点不对,还没等他琢磨过味来,就被两名警卫战士押到了华国锋的面前。

于是,华国锋又将对王洪文类似的决定对他读了一遍。张春桥平时耀武扬威,这时却吓得两腿打颤,话都说不出来,一点都没有反抗就被押走了。

最后一个到的是姚文元,当他听到政治局要他修订文献时,心里得意洋洋,嘴上却骂骂咧咧地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他急匆匆赶往中南海,竟将平时不离头的帽子也忘戴了。当他光着个秃头迈进怀仁堂时,心里还盘算着这回自己可以大显一番身手了,没有想到等着他的却是天罗地网。

被抓时,这个“四人帮”的“笔杆子”竟坐在地上耍起了无赖:



“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

大家理也未理他，将他押进了候审室。

在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同时，另一路人马在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带领下，来到中南海江青的住处。

这位自比“吕后”、梦想当国家主席的女人在听完中央对她的处理决定后，大耍泼妇之风，又叫又骂，让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也不交，但很快她的气焰就被打了下去，最后不得不将钥匙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了执行小组成员。

在办完一切交接手续后，被押上了一辆轿车，送到了她早就该去的地方。

王、张、江、姚落网的同时，中央派出另外一支特别行动部队迅速出击，抓捕了“四人帮”的其他主要成员，并查封了他们所有的办公室。

这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

# “飞将军”叶飞



1. 亲妹妹找当省长的哥哥叶飞借钱,竟难倒了这位“共产党的大官”

2. 特务向叶飞连开两枪,尔后又补了两枪,叶将军大难不死
3. 飞身跳悬崖,叶将军再次脱险
4. 部队东进,陈毅拍着胸脯对叶飞说:“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5. 叶飞“导演”《东进序曲》中最精彩的一幕。刘少奇说:“古有飞将军李广,今有飞将军叶飞。”
6. 叶飞率一、四纵艰苦转战,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主席来电:“很感欣慰!”
7. 兵败金门,叶飞司令员不堪回首的一页;炮击金门,毛主席说:“还是请叶飞同志负责指挥!”



# 叶 飞

(1914 - 1999 年)

原名叶启亨。福建省南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一旅旅长兼旅政治委员,第一师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 1. 亲妹妹找当省长的哥哥叶飞借钱，竟难倒了这位“共产党的大官”

1950年8月的一天，忙碌了一上午的叶飞起身准备去省委机关食堂吃饭，因为下午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

忽然秘书匆匆推门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信，信封看上去有点皱巴巴的，看来在路上已“走”了不短的时间了。

叶飞以为又是一封检举揭发或反映情况之类的信，吩咐秘书放在桌上，等吃完饭以后再看。可是秘书叫住了他，轻声说道：“是菲律宾寄来的！”

叶飞感到有点意外，停住了脚步，接过了信，果然，映入眼帘的是一行英文字母，下面还有一行中文：“菲律宾吕宋岛”。

叶飞的心中一阵激动，眼角也有些湿润。他拿着信又慢慢坐回了座椅里，好半天也没开启信封，呆呆地坐着，陷入了沉思，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海外漂泊，动荡不安的岁月。

叶飞出生在菲律宾的吕宋岛，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结婚后仅几个月便离别了新婚的妻子及家人，跟随一位回乡探亲的老乡远走南洋，辗转到了菲律宾吕宋岛。在菲律宾由于舍得吃苦，又善于经营，逐渐有了一些积蓄。

在吕宋岛，叶飞的父亲按照华侨的习惯，与当地一位经营农商的菲律宾女子结了婚，这位女子就是叶飞的生母。她是一位有文化的妇女，英语很好，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在当地华侨中颇受尊重。

她结婚后仍继续独立经营油米杂货商店，同时操持家务。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叶飞幼年时活泼好动,在生母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在四岁时,生母还教他学习了一年的英文。

在吕宋岛,叶家虽然生活小康,事业尚属顺利,但仍不免受到歧视和压迫。

父亲常对叶飞说:“不要忘记故乡,不要忘记祖国,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无能,你们自己要争气,将来为振兴祖国作贡献。”

正是基于对故土的眷念,在叶飞刚满五岁那年,父亲就带着他和二哥叶启存,由菲律宾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金淘区深鞍乡。

叶启存长叶飞两岁,后与叶飞一同参加了革命,曾担任过中共南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安(溪)、南(安)、永(春)游击区红军游击队,1935年不幸被捕,最后壮烈牺牲。

不幸的是,刚到家乡一个月,父亲就被土匪“绑票”。后虽经多方努力,父亲被赎了回来,但由于这次的惊吓,父亲回菲律宾后,就再也不敢回国了。

叶飞和二哥于是便交给家乡的母亲谢氏抚养,谢氏一直没有随叶飞父亲去南洋,留在故土苦撑家业。她自己没有生过孩子,把叶飞和叶启存当亲生儿子一般看待,含辛茹苦地抚养他们兄弟俩。

叶飞回到家乡不久就入了私塾读书。第二年又转入乡完全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兄弟俩学习刻苦,成绩十分优异,深得学校教师、国民党左派叶骥才的喜爱。

其间,正值中国大革命时代。革命风雷激荡着古老的南安大地,叶骥才在闲暇时常给他们讲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使得叶飞兄弟俩在很小时就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对他们以后矢志投身革命不无影响。



1925年，叶飞高小毕业，准备继续升入中学。

可是此时一场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父亲从海外来信说，由于经济困难，他们兄弟俩中只能有一人可继续升学，另一人要回菲律宾帮助父亲经商。

叶骥才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找到叶飞母亲并亲自写信给叶飞的父亲和生母，告诉他们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恳切地劝说他们一定设法让两个孩子继续读书。叶老师的行动感动了父亲，终于同意叶飞和叶启存继续学习。

在叶骥才的帮助下，叶飞考入了由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厦门中山中学，并直接在初中二年级插班学习。

在校学习期间，叶飞除了出色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以外，还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读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最为集中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中山中学被勒令关闭。叶飞被迫转入厦门省立第十三中学继续学习。

由于较早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年仅14岁的叶飞并没有被反动派的疯狂进攻所吓倒，相反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1928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厦门团市委的委托在省立第十三中学建立团支部，叶飞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同年，为集中精力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叶飞放弃了中学毕业后上大学的机会，并以与朋友一同去日本留学为名，与海内外亲人中断了一切联系。

此后，叶飞担任了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主要在工人中开展建立团组织的工作。其二哥叶启存担任了团省委宣传干事。

1930年7月，由于“厦门劫狱”事件的影响，叶飞不幸在厦门



被捕。

为取得社会和家庭营救。叶飞设法将被捕消息传给了海外的父母。父亲立即让二哥启存回国设法营救。

起初父亲曾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遭叶飞拒绝。

由于叶飞始终未暴露身份,国民党当局也查不出更多的证据,于是,国民党法庭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他一年徒刑。

在中共组织和家庭的配合下叶飞被营救出狱。出狱后的叶飞又一次中断了与家人的联系。

1949年上半年,当叶飞率领第十兵团浩浩荡荡进入福建时,顺道看望了已分别20年的家乡母亲谢氏。

当母子会面时,母亲已认不出他了,更想不到这位人民解放军的首长就是她日夜思念的儿子叶启亨(叶飞出生时他父亲按族谱给他取的名字)。

直至同年9月,第十兵团进抵泉州,叶飞才将母亲接来,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说:“我就是启亨,叶飞就是我!”

母亲恍然大悟。母子相见,泪如雨下,此后老人一直随军与叶飞同住。

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病故。自从父亲去世后,谢氏与叶飞海外的亲人也失去了联系。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叶飞的思绪,原来秘书把饭菜送了过来。叶飞定了定神,打开了手中的信。

信是大妹妹寄来的。

此时,叶飞才从信中得知,他全家兄弟姐妹共有九人。叶飞排行老三,除大哥叶启迪,二哥叶启存以外,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两



个妹妹，叶飞离开菲律宾时他们还都没有出生。

父亲去世后，叶飞的生母依然经营小商店，大妹妹挑起了全家生计的重担。

信的最后，叶飞的大妹写道，现在生意很难做，母亲又不善经营，但又不忍心让父亲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因此一直苦苦支撑，时至今日，家中已经负了很大一笔债，无法偿还。其他弟妹还在读书，母亲积劳成疾，为了不使病中的母亲再受到打击，希望叶飞能借给她一笔钱渡过难关。

妹妹还说，她是从同乡那儿了解到叶飞的情况的，想他现在是共产党的大官了，借一笔钱应该不会很为难。

看完信，叶飞真的很为难了，妹妹说得一点不错，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长，还兼任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

可是妹妹哪里知道，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菲律宾的官可不一样。但是，一位堂堂的省级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没有钱可以寄给急需用钱的家庭，又怎么能让妹妹相信呢！

再说，与生母一别30年，自己没有尽一点人子之职，现在母亲生病，家业也濒临破产，自己没有一点表示又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这倒让叶飞一时没了主意。

此时还得处理公务，没有时间多想了，叶飞放下信草草吃了点饭，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了。

晚上回到家，叶飞考虑再三，又跟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给妹妹回封信。

信中表示了对母亲及家中的歉意及思念自不必说，另外着重说明了自己确实没有钱借给家中，只能请母亲及弟妹一同回国由



他来负担供养,并可供弟妹在国内读书。

信发出去了,叶飞也长长舒了一口气。

可是,正如所料,这封信寄出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回音。

直到1965年,妹妹再次来信,告之叶飞母亲已病故。叶飞5岁一别,没有能再见自己生母一面,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叶飞的养母谢氏解放后倒是一直跟叶飞一起居住,晚年享了几年清福,直到1963年病逝。

叶飞与弟妹们见面时,已经是中菲建交以后的事了。那时,他们都已是上了年纪的人,恩怨早已没人再提,有的只是亲情的流露,这对叶飞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 2. 特务向叶飞连开两枪,尔后又补了两枪, 叶将军大难不死

1931年叶飞被捕出狱以后,由于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宜再留在厦门工作,于是,被中共组织调往福州工作,担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的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蔡协民的领导,不久蔡协民调到厦门工作,党的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由陶铸同志继任。

“九一八”事变后,叶飞领导福州团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次年春,在叶飞的组织下,福州几个学校在西湖开化寺联合举行爱国宣传大会,并演出抗日戏剧。

演出时,驻福州的日本领事和日本军舰“北上”号舰长无理捣乱,并掏枪威胁学生,引起公愤,结果大家一拥而上,将日舰长打伤。



各学校还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北上,使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有声色。除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之外,在叶飞的具体组织领导下,福州还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助会等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相当活跃。

1932年下半年,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年仅18岁的叶飞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巡视工作。当时闽东的宁德、霍童地区已有一支30多人、七条长短枪的工农自卫队,由区委书记颜阿兰率领。

1933年5月28日,叶飞与颜阿兰率工农自卫队举行“霍童暴动”,缴获国民党保安团80多支枪,并于同年6月底创建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叶飞的领导下又先后建起了第一、第五、第七、第九等七支主要革命武装,为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1933年冬,叶飞到闽东福安地区闽东游击队一秘密交通站与一个同志接头。

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处的客栈,叶飞当时扮成了一名商人,由于接头时间还没有到,叶飞就在楼上店堂里闲坐,并机警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有三个人从楼下直冲上楼,叶飞一看势头不对,就想掏枪,可是已经晚了,其中两人上来就按住他,另一个朝他的头连开两枪,叶飞立即倒了下去,鲜血顺着脸流了下来。

三个家伙开完枪后,丢开叶飞,搜去叶飞的手枪和笔记本,转身就向楼下走去。

由于那两枪没有打中要害,此时的叶飞头脑还清醒,听到楼梯的响动,本能地抬了抬头,恰好被走在后面的一名歹徒回头一瞥看见了,他马上大叫:“还没死!还没死!”



说着又跑过来朝叶飞补了两枪，一枪又打在头上，第二枪打在上臂上。几个歹徒看到叶飞再也不动了，估计这下死定了，于是就匆忙跑下了楼，离开了客栈。

叶飞头部、胸部、手臂多处中弹，但是出现了奇迹，五枪居然一枪也没有击中要害，叶飞仍然没有死。

由于流血过多，他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心想这下要死了，自己才19岁，就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心中很是惋惜。

又过了一会儿，叶飞感到仍然有知觉，于是一个念头闪过：也许还不会死，自己不能在这里等死，要争取活下去！

在这种强烈的求生意念支配下，叶飞感到有了一点力气，但起来是不可能了，只能爬，先是爬到了楼梯口，定了定神，又顺着楼梯一阶一阶地往下爬，在他爬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道殷红的血迹。

到了楼下，店堂里早就跑的没有了一个人。叶飞又歇了一会儿，接着往外爬，出了门，沿着墙向店后面爬去，一直爬到一座小磨房旁的水沟边，终于没有了一点力气，慢慢地失去了知觉。

叶飞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子里的床上，旁边还有人在照顾着。

原来是附近村子里的共产党员听到枪声后，心想一定是自己的同志和敌人发生了战斗，于是，悄悄地过来察看情况，发现了叶飞，并把他救了。

幸好叶飞被及时救走，因为杀手是福安县国民党特务队的人，他们回去后从叶飞的日记本中了解到叶飞的真实身份，赶忙又派人回来要砍叶飞的头好向上峰领赏。可是此时已不见叶飞的踪影。于是敌人在周围加强了监视与盘查。叶飞在当地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



### 3. 飞身跳悬崖,叶将军再次脱险

1934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经过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方志敏在这次战斗中被捕。突围出来的部队在粟裕、刘英等人的领导下,整编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于1935年2月,进至浙西南地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8月间,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粟裕、刘英率挺进师百余人,撤出浙西南根据地,转战于闽浙两省交界地区,10月,挺进师在福建省寿宁县与闽东特委会师。

双方共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

为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同时成立了闽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挺进师大部改称闽浙独立第一师,闽东独立师改称为闽浙独立第二师,继续坚持闽东游击战争。

闽浙临时省委以及闽浙军区成立之初,闽东特委及独立师与浙南党政军双方关系较为密切。但是在如何坚持革命斗争的方针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刘英是一位比较老的同志(1942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牺牲),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同样坚持“左”的一套做法,脱离斗争实际,军事指挥上也常常出现大的失误。为此叶飞经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得不到刘英的理解和信任,叶飞非常苦恼。

面对可能招致闽东根据地和独立师严重失败的严峻形势,叶飞与闽北游击根据地负责人黄道取得了联系,向他详细汇报了闽浙临时省委内部的状况,并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担任



走去,后面响起了枪声,叶飞感到左腿一软,被打中,后面的国民党兵追了过来。叶飞赶忙向村子右侧的山上跑去,可到了山顶一看,一下子傻了眼,山的另一边是悬崖,足有十几丈高,后面的敌人还是紧追不舍。

叶飞狠狠心,与陈挺对视了一眼,大喊一声:“跳!”

然后,他率先纵身一跳,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助,悬崖的半腰间,有一棵树斜斜地伸向天空,把他俩挡了一下,两个人都幸免于难。

天黑以后,他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五个夜晚,才回到了驻地。

这件事史称“南阳事件”。

很长时间以后,叶飞再次见到了粟裕,才知事情的原因。粟裕告诉叶飞,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叶飞的,没有说明什么原因。

“南阳事件”后,刘英单独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等人的党籍,同时指责粟裕也参加了叶飞、黄道等人的反党活动,也对粟裕进行了隔离审查。

“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也给闽浙边的革命斗争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叶飞被抓的消息传到闽东根据地时,部队非常气愤,认为哪能有红军抓红军的道理,小叶(闽东军民对叶飞的亲切称呼)是红军,抓小叶的人一定不是好人,有些人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带部队去找刘英算账。

幸好叶飞脱险赶了回来,才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南阳事件”是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在南方根据地内部的继续和深化,而其表现形式又带有中国浓厚的传统色彩。

毛泽东就曾经说过:“火拼”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非



常常见的现象,看来在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完全避免,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然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与旧式农民革命的队伍毕竟不一样,在革命队伍内部,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指引着每一位革命同志的方向,问题和矛盾,以个人的觉悟依靠组织的力量能够妥善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和浙南的红军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两支武装一直并肩作战,叶飞和粟裕也长期战斗在一起,合作共事,配合得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8年上海党中央一次会议上,李富春问叶飞:“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叶飞把事情的经过简要介绍了一下。李富春听后很吃惊,并问叶飞:“这件事,你报告主席和中央了吗?”

叶飞说没有。李富春对叶飞说:“有机会时应当向主席报告一下。”

但是,叶飞感到事隔多年,旧账何必再提。况且刘英同志已在1942年壮烈牺牲了,就一直没有再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事。

**4. 部队东进,陈毅拍着胸脯对叶飞说:“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

次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终于答应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实施抗战。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经过各方努力,国民党方面答应让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进行整训后,开赴敌后抗日战场。

1937年12月,经过激烈斗争,闽东红军游击队终于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部队先改称闽东抗日游击支队,1938年初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全团1300多人。

2月中旬,奉命离开闽东奔赴抗日前线。5月,第六团由岩寺移驻泾县青七江畔,进行皖南整训、练兵。

经过半年的整训及练兵,一支游击习气非常浓厚的部队变成了正规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并且顺利实现了从山地游击战争向平原水网地作战的转变。

同年10月,叶飞率第六团进入江苏南部的茅山地区,归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当时的苏南是日伪顽较为集中的地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奉行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减租减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及根据地的发展处处受到限制。

对此,1939年2月,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重申



全党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指示新四军要实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陈毅听了周恩来传达的中央全会精神后,精神为之一振,回到一支队后,立即就将叶飞找去,要他准备率领六团执行向东作战的方针,兵进路东地区。

所谓路东地区,是指常州以东、宁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

这里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在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以重兵占领了该地区。

陈毅交代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挺进,打击日寇。我们不能再依靠国民党发枪、发饷,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力量。你们这次东进,一是要发展队伍,二是要夺取武器装备自己,三是筹款子。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我看不对!只有有了这些,才能抗日!”

叶飞对前一段时间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早已心存不满,听完陈毅的决定后,心情非常激动,立即着手进行东进的准备工作。

为了应付受节制的国民党三战区,叶飞决定化名叶琛。5月4日,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早晨出发。

刚刚吃完晚饭,支队打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叶飞马上去见他。

叶飞接到通知后,立即跨上马向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飞驰而去,十多里地,一会儿就赶到了。他走进陈毅的房间,只见陈毅一改往日爽朗的个性,在默默地抽着烟,看到叶飞走进来,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冲着对面的凳子,示意叶飞坐。



叶飞不由得心中一沉，看来情况有变。

果然不出叶飞所料，沉默了一会儿，陈毅仍然是一言不发地递给叶飞一封电报。

电报是项英发来的，主要意思是坚决反对六团东进。有两条理由：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交通发达，日军兵力强大，部队东进有被全歼的危险，要陈毅对部队负责，对统一战线负责。

事实上，此时，项英虽然接到了中央明确的指示，但是，他仍以所谓“江南特殊论”，拒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导，继续坚持其右倾路线。

见此情景，叶飞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毅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起来，而且越走越快。

十多分钟后，陈毅突然停了下来，一步跨到叶飞的近前，问叶飞：“你看怎么办？”

叶飞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瞪着陈毅不说话。

陈毅看叶飞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又追问了一句：“如果东进，你的六团会被消灭吗？”

对这个问题叶飞考虑得比较多了，马上答道：“你问这个呀！我看敌人要消灭我们，恐怕没那么容易。”

陈毅好像仍不放心，又问了一句：“你有把握？”

“有把握！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派人沿途敌情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并拟定了多套方案。如果你担心这个，我可以给你立军令状！”

陈毅对叶飞的回答很满意，决心也更坚定了，对叶飞说：“那好！你回去吧，照原计划行动！在行动之初，要更注意隐蔽，既要



可是，“江抗”的胜利也惊动了国民党第三战区，他们一方面大肆诬蔑“江抗”是“不守军令的杂牌军”，扬言要消灭它；另一方面，又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声称“江抗”很像是新四军的部队，要新四军立即将该部撤回原防，否则将作为叛军加以剿灭。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初战告捷，敌后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叶飞根本不理国民党第三战区那个茬，乘胜继续东进，既抗击日伪，又打击顽军。在对敌作战的同时，叶飞还非常注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江抗”深入河、湖、港、汊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扩大抗日武装，建立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

为了继续扩大抗日影响，叶飞决定派遣一支部队到上海近郊活动一下，给敌人以震慑。在一次追击伪军的过程中，叶飞所部跑到了上海虹桥机场附近。指战员们听说到了上海近郊，欣喜若狂，大家相互说着：“我们竟然打到了大上海来了！”

带队干部廖政国想，要是趁机袭击一下敌人的机场，烧它几架飞机，那我军的影响就更大了，也更能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于是经过简单的布置，就向敌人机场内冲击。

由于敌人的麻痹大意，此役出乎意料的顺利。其实根本就沒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机场，机场平房里只有少量的伪警察和办事人员，睡得像死猪一样，日本鬼子都躲在机场四周的碉堡里睡大觉，他们以为这里是上海近郊，根本没有人敢来捣乱，哪想到新四军神兵天降。

躲在碉堡里的日军也不知我军的虚实，只是躲在碉堡里胡乱打枪，就是不敢出来。



在与敌人对射的过程中,侦察员发现了停在机场里的四架飞机,战士们纷纷围了上去。

廖政国一声令下,战士们打开了汽油筒,往机身上猛浇,然后点燃一支支火把扔了上去。

顷刻,空旷的机场上空燃起熊熊大火。

考虑到这里离上海太近,敌人的增援部队随时会赶到,纠缠下去对我军不利,于是我军主动撤出了战斗。

当夜,虹桥机场周围枪声彻夜没停,军车往来不断,上海日军更是如临大敌,通宵戒严。

由于火烧了机场,影响非常大,上海的老百姓以为新四军要攻打上海了,很多群众已经在作欢迎新四军的准备。

第二天,上海《申报》、《译报》、《导报》等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对此役作了报道,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导报》由于对战况报道翔实,受到日军的怀疑,主笔陈同生不得不撤离上海到“江抗”工作。

“江抗”广泛活动于苏常太地区,神出鬼没打击日军,缴获颇丰。

东进之初的陈旧武器,不久都换上了新式的三八大盖,每个班还配备有轻机枪,每个连都装备了重机枪,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

至1939年10月,部队发展到6000余人(含地方武装)。其中第六团由东进前不到600人(有一个营留守)发展到2000余人。胜利地实现了对陈毅司令员的承诺,部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壮大,由此也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关于“向东作战”指导方针的正确性。



此次东进作战也使叶飞在新四军中名声大振,以敢打敢闯蜚声全军。

**5. 叶飞“导演”《东进序曲》中最精彩的一幕。刘少奇说:“古有飞将军李广,今有飞将军叶飞。”**

中央对新四军的作战指导方针除了“向东作战”以外,还有一句就是“向北发展”。

1939年10月,为执行党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根据陈毅的命令,叶飞率“江抗”主力第六团撤离东路地区,渡江北上。

1940年春,部队抵达苏北江都、吴家桥地区,与管文蔚领导的部队汇合,组成挺进纵队,管文蔚任纵队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张藩任参谋长,吉洛(姬鹏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纵队成立军政委员会,叶飞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此时,国民党在华北发动的反共高潮遭到了失败,于是把反共矛头指向了华中,调动国民党正规军向华中的新四军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第一个目标就是驻苏皖五县交界处半塔集的新四军第五支队,挺进纵队成立后的第一场仗就是驰援半塔集。

接到江南指挥部电令后,即由叶飞率一团和四团各两个营,从吴家桥地区出发,从邵伯湖西渡运河,横跨天(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直扑半塔集。经过一昼夜的连续行军后,于3月24日抵达半塔集东南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顽军1000余人,突破了顽军包围半塔集东南面的阵地。26日,又将顽军独立第六旅击溃,并歼其一个营,与新四军其他部队一道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



我们不能主动去打韩德勤。我们只能进行自卫斗争，否则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界的同情。”

叶飞忙问：“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文章怎么做？”

刘少奇接着说：“文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重点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

刘少奇起身走到铺着地图的桌子前，招呼叶飞过来，尔后指着地图对叶飞说：“要解决苏北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中央决定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现已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也已经展开部署；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都有部队。但是，我们的部队不能直接开进来，我们要寻找时机。中央估计顽固派不久将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就是机会，届时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坚守苏北某一点，吸引顽固派来围攻，只要他们先动手，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

到这时，叶飞已经完全明白，刘少奇找他谈话的用意了，这是要他担负起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相机夺占苏北的任务。这时的叶飞有点犹豫了，不敢一下承担这个任务。

叶飞考虑，自己的部队只有两个团，我军其他的主力还在江南。而韩德勤有十几万人，我军孤军坚守太久了没有把握。

所以，叶飞向刘少奇提出：“我们挺纵的兵力太少，时间一长恐怕坚持不了。”

刘少奇明确地说：“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内是你



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我负责。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可以到了。就像这次半塔集保卫战一样,守一个星期增援便来了。”

叶飞的部队以游击战见长,很少打保卫战,这次驰援半塔集,叶飞就留心了,进了半塔集以后,他仔细看过地形,向守卫部队了解过兵力部署情况和战斗过程,心里有了点数。心中一盘算,坚持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

于是叶飞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此时的叶飞才26岁。

回到江都吴家桥地区,叶飞召开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刘少奇传授的策略,向与会同志具体介绍了皖东地区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等好的做法。大家听后极为兴奋,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全民抗日的做法。

叶飞就顺势提出很有针对性的问题:“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的做法对不对头,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石激起千层浪。

大家的思路打开了,大部分同志都说应该像皖东那样的搞法。

叶飞接着传达了中央对解决苏北问题的意见以及挺纵可能要负担的任务。这时纵队有位同志提出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执行的是皖南的路线,如果按照你讲的照皖东的一套办,那么要么是皖南的路线错了,要么是你反党!”

问题提得这样尖锐,大家一下都怔住了。

叶飞暗想,少奇同志讲现在为了团结项英同志,暂时不能把他反对东进、挺进苏北的右倾主义错误路线公开。但是,如果不讲清楚项英同志所执行的错误路线就不能让大家信服。

于是,叶飞决定单独找这位同志谈谈,把大家的思想问题都解



决了再作决定不迟。叶飞宣布,暂时休会。

当晚,叶飞与军政委员会委员分别谈话,并且着重与提出问题的同志进行了长谈。

叶飞结合向东作战以及来苏北这一段时间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皖南路线的错误所在,阐明了灵活斗争的必要性。

经过叶飞的耐心分析与疏导,这位同志搞清了继续执行皖南路线的危害,思想也通了。

第二天继续开会,大家思想统一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改变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建设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展人民抗日武装。

会后立即就任命惠浴宇为江都县县长,贴出布告减租减息。大家都十分兴奋,准备敌人来进攻,正好趁机解决苏北根据地的问題。

农民长期被地租和高利贷捆绑得透不过气来,挺纵一搞减租减息,抗战热情很快迸发出来,一下子就把军民关系推向一个高潮。

吴家桥的工作部署好后,叶飞就准备过江去向陈毅汇报皖东之行,主要想谈一下刘少奇交代的任务,并向他请示如何执行这一任务。

谁知,就在这时日伪军对吴家桥地区进行“扫荡”,叶飞走不成了。

5月17日,日伪军500多人,气势汹汹地扑向吴家桥。吴家桥一仗打了一天一夜,几乎把日本鬼子全歼,几百日伪军横尸旷野,这是该地区抗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仗。

当夜,大雨哗哗下个不停。鬼子兵冒雨搬运尸体去火化,搬了



整整一夜。

在这之前，一团刚到苏北，阴历大年三十（1940年2月7日）拂晓，日寇“扫荡”大桥地区，也打了一仗。

当时，国民党军闻风而逃，一退30多里，我军则一个反击，追到仙女庙附近，粉碎了日寇“扫荡”。

从此新四军名扬苏北，苏北人民把新四军叫做“四将军”。

当地人民很快传开了喜讯：“四将军个个是神兵，打小鬼子保护咱老百姓。”

战后，我军连夜转移到靠近宜陵的地方休息，部队有的还没有住上房子，在各处躲雨。

叶飞和其他领导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日军受了我军重创之后，可能再次集结兵力向我军进行报复性“扫荡”，而吴家桥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因此，需要重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休整部队。

此时，苏北国民党军队有三股力量。

其中力量最大的是韩德勤，他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主席兼江苏省保安司令，归他指挥的有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还有十个保安旅。韩军号称10万，实际上只有5万余人。

其次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属部队，九个纵队，总兵力号称三万，实际上也只有二万多人，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总指挥部设在泰州，并称“泰州两李”。

第三是税警团，由江苏省税警团的总团长陈泰运指挥，四个团兵力，四五千，武器精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是宋子文创建的嫡系部队。



从政治上来分析,韩德勤是蒋介石嫡系。韩德勤当过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属于反共顽固派。陈泰运是黄埔一期生,而且是军统核心组织“复兴社”成员,他虽未被重用,但因是何应钦同乡而被宋子文、孔祥熙任用,曾遭韩德勤软禁过,和韩矛盾大,可争取中立。“两李”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在苏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定号召力,在政治上属中间派。

在两李的队伍中,还有共产党的力量,张公任部下的八支队支队长陈玉生是共产党员,队伍也是受共产党影响组织起来的抗日进步武装。二纵队司令颜秀五,早年在上海还曾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关系,经过惠浴宇同志做工作,靠拢我军,是我军对两李进行工作的联系人之一。他部下的五支队有四个大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启东抗日义勇军改编成的,有党的总支部,大队长王澄是共产党员。

为了执行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陈毅在对苏北力量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击陈、联李、孤韩”的发展苏北的策略方针。

为联合“两李”,陈毅做了大量工作,并三次亲赴泰州与“两李”会晤,做稳定“两李”的工作。

陈毅在做“两李”工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何况两李和所属各部也是大有差别的。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介石、顾祝同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经过认真的分析,叶飞决定通过宜陵友军颜秀五的关系,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地区休整待机。

叶飞之所以主张选郭村作为休整的地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一是这里比较安全。二是郭村在1939年10月就建立了党支部,领导青年抗日救国团,搞过春荒分粮斗争,还掌握了自卫队武装,群众基础好。三是这地方是三角地带:西边十里外,是鬼子高邮、邵伯据点;北方十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三旅;东边离泰州二十多里,南边是宜陵圪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区。这里正好是日伪、韩顽、两李三股势力的结合部,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积极打击日伪,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搞减租减息,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叶飞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挺纵到郭村以后,在叶飞的指导下,立即开展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委任区长,扩大自卫队,主要向北发展,向西打击日伪。

郭村向北20里,就是韩德勤部保三旅张星炳的地界。我军向北发展,就把两李甩在侧后,顶到韩德勤的面前,准备他来进攻。对两李,叶飞一再派人谈判、解释、做工作。

然而,意想不到的,向我挺纵发起进攻的不是韩德勤部队,而是两李!

但是,从全国形势来看,两李进攻郭村有他的必然性。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失败后,就把摩擦重心转移到华中。

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李品仙进攻豫东、皖东,顾祝同、冷欣进攻皖南、苏南,韩德勤则全力进攻苏北的新四军。



告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郭村地形较好，吴家桥是一线七里长庄，不易坚守；而郭村的三个庄子呈三角形，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连张星炳部所占地盘，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于部队运动，只有南面和西南面是开阔地，利于部队固守。因此，还是在郭村迎战较为有利。

陈毅很快来电指示，语气坚决：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已时则暂时退回江南，与江南部队会合，然后卷土重来。

这是陈毅第三次来电了，叶飞连夜召集挺纵和苏北特委的领导联席会议，后来又把团以上干部找来一起讨论。

大敌当前，人们纷纷发表见解，献计献策。

苏北特委的正、副书记韦一平、惠浴宇都表示：郭村党的群众基础好，新四军来了以后，已公开建立政权，减租减息，搞红了，被迫放弃，必受反共部队摧残，损失太大，也会失去人心。

挺纵参谋长张藩、政治部主任吉洛（即姬鹏飞）与团的干部都认为在郭村打有胜利把握，退守吴家桥则不利。

众人一直讨论到半夜，各方面的利弊强弱都分析到了，甚至都考虑到了郭村北面的保安三旅的可能行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保卫郭村。

可是陈司令员三次电示不同意固守郭村，怎么向他交代呢？抗命专擅，干系本就不小，万一打不好，部队大受损失，那就不得了！

叶飞作为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不能不反复思忖，他沉思很久，掂量半天，最后下决心说：“既然大家都认为在这里打有把握，那好，就下决心在这里打。对陈司令员，我负责好了。陈司令员说



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敌情。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的向陈司令员负责！向党负责！”

于是，叶飞复电陈毅，仍然坚持保卫郭村。

陈毅一见电报，真是又气又急，连连说道：“这个不知轻重的叶飞，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陈毅一面命令陶勇率部火速增援郭村，一面电告叶飞：我在6月28日便衣渡江，一切等我到时再议……

正在这时，陈玉生来电告急。李长江准备向郭村我军进攻之前，企图先以四个支队解决陈玉生支队。此时，陈玉生的共产党员身份已是路人皆知了。陈部驻泰兴县的虾蟆圩地区。他的来电是要把部队拉过来，就是说要起义，否则就要给李长江吃掉了。

叶飞看到事情急迫，一面报告江南指挥部，一面电告陈玉生，同意他们起义，由叶飞派部队前去接应。

为了迷惑敌人，叶飞采用示形于敌的计谋，有意暴露他亲自率领部队去增援陈玉生。

下午，叶飞骑着白马，率四团浩浩荡荡由郭村出发，黄昏在塘头附近渡过通扬河。

夜深人静。

四团从吴家桥地区向东疾进增援陈玉生，叶飞却又秘密地由原路悄悄回到郭村。

叶飞所以有意让李长江知道自己去救陈玉生，是判断李长江看到叶飞亲自出动，必会估计叶飞带去的是主力一团，就不敢对陈玉生动手；万一郭村打起来，实际上叶飞和一团都在郭村，也能应



付。

李长江果然上了叶飞的当,他根据叶飞已离开郭村的情况认为:第一,挺纵分兵了;第二,叶飞率主力已离开郭村,郭村兵力空虚,这是攻打郭村的最好时机。

因此,他突然改变部署,决定先打郭村,然后再解决陈玉生部队。加上陈同生又扣在他手里,他自以为时机到了,再也不想做那个“中间派”了。

身为总指挥的李明扬对这场武装冲突,内心是充满矛盾的。韩德勤的险恶用心,作为长期混迹于官场的他,可谓洞若观火;可是蒋、顾、韩一再施加压力,不对新四军动武就交不了官差;而对李长江的飞扬跋扈,也心有不满。但是,李明扬又不愿意亲自出马打新四军,于是李明扬在进攻郭村前夕以“开会”为名避到兴化去了,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万一“副总座”出师不利,也有回旋余地。

李长江呢,可没有李明扬这么老到,他急于抢地盘,急于当大官,利欲熏心使他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他准备就绪,披挂停当,就杀气腾腾地向郭村直扑来了。他狂叫:“我要让叶部死无葬身之地,至少也要从郭村滚蛋!”

叶飞确定保卫郭村以后,根据胡服固守一个星期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叶飞命令:“在吴家桥地区的后方机关、医院,全部分散到农村群众中去隐蔽,随部队到达郭村的地方机关、后方机关全部集中郭村;在郭村构筑工事,设置防御阵地;一团和纵队特务营合计四个营的兵力,一团全部担任防御,北面以一个营防御张星炳部进攻,两个营在南面、东面防御李长江部进攻,纵队控制特务营为机动兵力。”

最后,叶飞确定了此次作战的总方针: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



验,针对李长江各部政治态度不同,配合不会十分协调,张星炳攻击不会十分积极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以阵地前的短促突击,击退敌人进攻,稳定郭村阵地。

李长江部先后到达蓝家桥、白塔河、杨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对郭村的包围态势。

李长江部队仗着人多势众,来势很猛。

郭村西南面是旱地,一片坟包,便于敌军接近。

果然,陈中柱纵队从该方向猛扑过来。这里我军只有一个加强连,李长江部队逼近我军阵地,子弹打到了村西端的特委机关驻地。

哪里军情最危急,就首先奔向哪里,这是叶飞指挥作战的特点。他急忙带着警卫员奔向村西南阵地。

黎明来临,东方已露出曙色,大地上的景物显得越来越清楚了。

怯于夜战的李长江的士兵,在白天由于人多势众,一个个胆子壮起来。

所以南面进攻的顽军极为猖狂,火力也较其他方向炽烈,从望远镜中看出,开阔地上顽军正以密集队形向我前沿猛扑,偏向西南的一股竟已逼近我阵地,在我密集手榴弹反击下仍是蜂拥上来,纵队政治部干部已率保卫班与顽军搏斗。

叶飞放下望远镜,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像是陈中柱的青年大队,我们就首先打垮这一路。”

定下了决心后,叶飞立即命司号员吹号调一营。

一营营长王营春早已将部队集结好,枪都上好了刺刀,号声一起,立即冲击,迎头痛击进犯的顽军主力。



一小时后,一营带着 200 余俘虏胜利归来。

从俘虏中一查,果然是陈中柱部,其中还有李长江的另一个纵队陈才福部的俘虏。其余各路顽军也随着陈部遭受打击而稍敛气焰。

激战至黄昏,陈中柱部又占了郭村外面的小庄子,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短促反击,将其击退。

这时,我军已经查明,李长江已动用十二个支队(团),倾全力向郭村进攻了。

战斗到第二天,李长江恼羞成怒,给陈中柱下了死命令:“要坚决拿下郭村,有退缩者,连长可枪毙排长、营长可枪毙连长!”

李长江并且对部队许下愿:“打下郭村,官兵放假三天,三天之内,女人任意玩,东西随便抢。”

这消息传到郭村,更加激起军民的愤怒。真是不用动员,男女老幼齐上阵。

广大指战员更是被人民的热情支援深深感动,一个个握着拳头,坚决地说:“还有什么说的,就是拼死也要保卫郭村,不让人民遭殃!”

战斗从拂晓开始就十分激烈,顽军气势汹汹地连续冲锋。这时,纵队教导队队长蒋鹤林端起轻机枪,跳出工事向顽军猛烈扫去,枪弹到处,就像刀切豆腐似的,顽军一片片倒下去。

侦察连连长吴立批带着一个排冲出去,前进 50 米,就地守在横坡上。到下午,把顽军击退到离郭村两里远的王家庄。

部队的必胜信心确是惊人的,形势这么危险,双方兵力悬殊这样大,但全军上下却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当顽军和我军各占王家庄一半时,炊事员去送饭,挑着饭菜竟跑到了顽军的阵地,被顽军



一阵射击打了回来，军帽和鞋都丢了。

可他一回到部队就幽默地说：“反动派还能久占这个庄子？我不过把饭送早了一点罢了。”

我军向来是不等着挨打的，防御中的进攻，是我军的一贯战术。

白天顽军进攻我军，夜晚我军就去打他们。

当晚，叶飞命一团参谋长廖政国指挥一个营反击，三人一组，全营同时向顽军猛扑，直把顽军逐出数里以外……

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敌我双方又相互对峙了整整一天。

第三天，顽军整天以密集的炮火轰击郭村，纵队指挥所附近也落了一些炮弹。

可是，这一天敌人只是炮轰，却没有再发起攻击。

这种不寻常的平静，引起了叶飞、管文蔚、张藩等人的注意。

叶飞熟悉李长江的草包脾气，程咬金三斧头，只要挡住他前三斧就好办。

他连续两天拂晓进攻，吃了苦头，会不会改在夜间攻击呢？他反复思忖着：夜战是我军特长，对手一般说来是不会采用这一战法的。但郭村我军兵力薄弱，防御空隙大，李长江也就有可能在夜间将他的第三板斧砍过来。

经过一番分析，叶飞渐渐想出了眉目，对管文蔚说：“北面张星炳那里估计不会有积极动作；西南、南面都已经攻过，连续碰壁；东边还没有攻过，这个方向是个空隙，水网地带，由颜秀五二纵队担任进攻，颜部攻得不积极，我们防得也不严密，李长江很可能选择这里乘虚而入。”

管文蔚道：“对，敌人可能就在这个方向攻击，我应作好充分准



当先,带着一营冲出圩子,与顽军展开了白刃战。

此时,苏皖支队也将进攻的张星炳部击退,由参谋长张震东亲率一个特务连,从另一个方向向顽部冲击。

敌人的攻势终于再一次被压了下去。

战斗到上午9点钟,乔信明、刘先胜率部赶回来了,在途中又给顽军侧背一阵猛烈打击,打得顽军在开阔地上到处乱窜,直到下午3时许,顽军才组织起零星攻击。但那已经是不在话下了,顽军对郭村的围攻已基本上失败了。

我军在清理战俘时,发现了敌人的纵队司令陈中柱及其支队长陈东生等人。反共战将陈中柱出现在叶飞等人面前的时候,极为狼狈,往日的狂妄早不知何处去了。

再说陈毅司令员,得到郭村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着随身人员化装便衣渡长江北来。

当他到达新老洲后,这个消息就被一些干部知道,大家真是兴奋极了。

一团两个营向扬泰线出击时,惠浴宇率三营一个连到大桥地区接陈司令员来到郭村。

纵队和特委的负责人都去迎接他。大家以为打了胜仗,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他骑在马上气鼓鼓的。

叶飞心知肚明,也不敢吭声。

陈老总下了马,叶飞向他敬了礼。

陈毅伸出手去,一面和叶飞握手,一面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唔,既然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很快,纵队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反攻,陈司令员也出席



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发展苏北,任何战役战斗必须服从这个战略任务。没有郭村战斗的胜利,江南部队过江以后,光是吴家桥弹丸之地,无法集结,无法休整,给养困难,很难立脚。

战役结束后,为顾全抗战大局,叶飞根据陈毅的指示,放还部分俘虏和枪支,与李长江及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重新和平共处,并使其保持中立。

郭村战斗打开了新四军在苏北的局面,使新四军获得了进军苏北的出发地,奠定了站稳苏北的脚跟,对新四军开辟整个苏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影《东进序曲》,以其激烈的战斗,曲折的情节,处处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吸引着广大的观众,使人们看后深受教育。《东进序曲》就是郭村保卫战的真实写照。

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以后,叶飞率部随陈毅向东挺进,进占黄桥地区,取得了著名的黄桥保卫战的胜利,在苏北牢牢扎住了根,实现了中央发展苏北的战略意图,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6. 叶飞率一、四纵艰苦转战,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主席来电:“很感欣慰!”

1945年12月上旬,叶飞所部在准备远征东北途中,由于形势变化,奉命留在山东地区,加入山东野战军序列,编为山东军区第一纵队。

解放战争中,山东是抗击敌人重点进攻的主战场,在山东战场叶飞率领一纵先后参加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



战役等几个重要战役，为遏制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的势头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在孟良固战役后不久，叶飞率领的一、四纵队却面临了一次全军覆没的危险。

孟良固战役后，进犯鲁中之敌全线溃退。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40余天后，蒋介石又以32个旅、24万人，于6月25日开始进犯沂蒙山解放区，在莱芜到蒙阴不足百里的战线上，竟然集中了18个旅的兵力！国民党军步步为营，排成密集横阵平行推进，企图把华东我军挤到胶东半岛的牛角尖，与我决战。

此时，华东战场的局势十分严峻。国民党的喉舌中央社天天叫嚷说：共军背靠大海，海水是喝不干的！退到胶东，胶东是牛角尖，烟台是没有桥可以通到大连的，何况还有海军阻击；如果往西过微山湖与刘伯承会合，有强大兵力阻击；如果固守鲁中山区，要被国民党军强大炮火“扫荡”；如果倒回华中，到处重兵，必然被消灭；如果渡河“北窜”，又有“国军”精锐兵团。

在蒋介石看来，胜利是稳拿到手的了。

山东战场局部形势非常严峻，野司首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出击敌后，调动正面敌人，打乱敌人的重点进攻部署，策应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并确定采取正面阻击两翼出击的战法：

正面由野司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阻敌前进；

右路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陈士荣、唐亮指挥，向津浦路以西，出击鲁西敌后；

左路兵团（第一、第四纵队）由叶飞统一指挥，出击鲁南敌后，以策应刘邓大军进军中原，调动进犯鲁中地区之敌，以便在运动中



伺机歼敌。

此时正值齐鲁大地夏雨季节,整个鲁南大地,连日闪电惊雷,瓢泼大雨不停,山溪暴涨,浊流滚滚。

叶飞率一纵于1947年6月28日出发,经500华里急行军,插入鲁南敌后。

此时,受到战火蹂躏以及国民党兵抢掠的鲁南大地,家家遭抢掠,庄庄添新坟!

老根据地人民遭受的摧残,激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阶级义愤,纷纷要求投入新的战斗,杀敌立功。

7月1日,也就是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之时,第一、四纵队经过八天的激战,合力攻克费县。尔后,左路兵团奉命乘胜进攻峄县、枣庄,威胁台儿庄、徐州,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作战。7月9日,收复峄县、枣庄,迫敌冯治安部退守运河一线。

其时,徐州之敌调走一个军追击刘邓大军。由于城防空虚,受到我军严重威胁,敌又被迫调该军回保徐州,我左路军完成了战役计划。

根据陈毅、粟裕的命令,叶飞率左路兵团继续挥师西进,进攻滕县、邹县,控制津浦铁路徐州、兖州段,配合右路兵团斩断敌重要补给线,威逼调动占我鲁中之敌,寻机歼之。

野司当时给左路兵团的任务是相机攻占滕县和邹县,但由于以1个纵队的兵力攻打一个方向,兵力分散,加上攻城器材缺乏,弹药因雨季转战淋湿后大多失效,虽经连续四天攻击,仍未能攻下,与敌形成相持状态。而敌又有大队人马回援,于是,7月20日,叶飞命令左路军主动撤出滕县、邹县战斗。

7月23日,我一、四纵队进抵枣庄东北集结待机。野司的意



图是待华野北线部队南麻、临朐战役得手之后，南北夹击敌一个兵团，决定左路军在鲁南待机。

我华野北线部队于南麻、临朐地区反击敌整十一师、整八师，由于暴雨倾盆，没有打好。而鲁南也是连日大雨，大小河沟水位暴涨，兰陵以南地区，地势低洼，淹成一片泽国。交通断绝，北进困难。

这样，我军不仅没有达到南北夹击敌人的战役企图，反而被敌人抓住我华野两个主力纵队孤悬鲁南敌后的弱点，妄图吃掉我左路军。

敌人颇有点得意忘形，在电报和无线电话中，把一纵称为“面包”，四纵称为“西瓜”，只要打开报话机，就可听到吃“面包”啃“西瓜”的一派狂言。

他们认为，“面包”、“西瓜”是吃定了！因为，合击我两个纵队的是五个整编师的兵力，后续欧震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即将赶到，南面的台儿庄、运河一线又有冯治安部两个军，我军无论如何是突不出重围的！

好不容易围住了我两个主力纵队，蒋介石也来了劲头，这一段时间里，他把视线转到了鲁南战场，几乎每天都有电报与鲁南来往，亲自指挥围追堵截，要报孟良崮七十四师被歼这一箭之仇。

野战军首长也为我两个纵队的处境焦虑。陈、粟、谭首长在电文中指示叶飞：“以插回蒙山争取东返会师为行动方针。”如果在枣庄地区或兰陵地区，“应有决心在鲁西地区机动转移一时期，打一两胜仗，不过早暴露东返企图；如果在峰枣地区，则可派一个师“引敌人向西北，你们才能迅速向东”；并问叶飞“能否分出一个到两个师协同鲁南地方武装开展局面，使主力掩护适当地点，然后于适当



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注下，总部及时地给叶飞发来了情报。从实战情况来看，证明这些情报是很准确的。但是战场情况转瞬多变，因此这些情况要比左路军自己搞到的情报要迟一天时间。左路军弄到的情报所以快，电台主任秦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及时而准确地破译了敌军的电文。

此时，叶飞掌握两部电台：一部向上保持联络；一部收听敌台，及时破译，掌握敌情。根据敌情判断，国民党军全力防我一、四纵队向东突围，拟合围我左路军于鲁南地区。

情况明，决心大。

叶飞决心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示形于东，造成敌人错觉，随后再以主力一部继续向东佯动，引敌东去，这样就可使我一、四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拉开距离，趁机西去，跳出敌人合围圈。

要达到这个战略意图，向东佯动的部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样才能造成主力东去的声势；而且又必须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在敌人重围之中，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甚至为主力突围而牺牲。谁来担此重任呢？

四纵司令员陶勇同意叶飞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并主动提出由四纵的彭德清师担任佯动掩护任务。

彭德清师即第十师，第四纵队的主力，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坚强部队。佯攻掩护需要这样一支坚强部队。

但是此去是否能回归？却是个未知数！

陶勇为了使两个纵队顺利突围，忍痛使用彭德清师，这种心情和气魄是可以想见的！

的确，使用十师是最妥方案。

由于该师只两个团，兵力不足，叶飞又以一纵第一师参谋长余



光茂率第三团加强该师。

叶飞和陶勇商定后，一、四纵队其他领导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行动开始。

7月24日，左路军故意向东行动，直逼向城，与敌整七师、整四十八师激战终日，给敌人造成我军向东突围的假象。

这一招果然奏效，愚蠢的敌人乖乖上钩了。

敌人马上调整部署。26日敌伞兵纵队自台儿庄进占峄县，敌三十三军一部进占齐村，一齐向东压来，都想抢个头功。

彭德清师与敌纠缠后，天尚未黑，正值夕阳西下，于是就佯装成左路军大部队，大张旗鼓地向东行动，沿途刷上一、四纵队各师番号，向沂河前进，吸引、迷惑敌人。

敌再次上当，得到情报，以为是左路军全部行动，赶紧向东追击。

趁此时机，叶飞率一、四纵队挥师西去，以第一师为前卫，在距敌军十华里处，疾速前进，进占齐村西北十五里的要隘山下，掩护全军通过。

28日晚，我一、四纵队于滕县以南，冒着倾盆大雨，跨越津浦铁路。

声东击西得手，我军与追击敌军拉开了整整一夜的路程！

天亮以后，被蒙在鼓里的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也不追了。

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一、四纵队主力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军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

由于敌人改变部署，叶飞原先估计将遭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也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区。

我两个纵队虽然在叶飞的率领下跨越了津浦铁路，但艰苦的



斗争仍然等在前面。对于突破鲁南敌军包围圈,这可能是最艰苦的一段了。

那是独山湖水网地带,七八十里路汪洋一片。部队全部暴露,任由敌机疯狂扫射。

连绵阴雨,被服装具全部湿透,鞋袜全无,赤脚在水荡或泥泞里行进。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抢掠一空,粮秣无着。

到处散布着还乡团的地主反动武装,不时响起冷枪,突然飞来流弹。敌还乡团在与我军打游击战、麻雀战。

部队确是吃尽了苦头,受到了考验,遭到很大损失,非战斗减员不少。

有一次过河,水流湍急,一纵副政委谭启龙骑的马力气小,加上过度疲劳,一个浪头涌来,连人带马都给冲走了。

刚巧叶飞在一边,顺手一把拉住,否则,恐怕谭启龙就有生命危险了。

部队极为狼狈,空着肚子行军作战,疲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不少干部战士走着走着,倒在路边的泥坑里就睡着了,炮弹和炸弹的交替爆炸也唤不醒他们。

女同志就更加艰苦,政治部的、后勤部的,加上文工团的,为数不少。徒涉滕县以西的沙河和独山湖边水荡时,矮小的女同志就险遭没顶之灾。幸得随军的胶东民工担架团的大汉们把她们挟着背着,虽然免不了喝几口水,终于到达了彼岸。

干部战士一个个憔悴不堪,面黄肌瘦,披头散发,令人不忍目睹。

但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不走不行,不走就会全军覆没!

在此紧要关头,必须加强政治工作,鼓舞士气。叶飞和副司令员何克希、副政委谭启龙亲自拟定了“紧急动员令”：“……由于我



们迅速掉头,已经开始将敌人调动和撤开,但也由于连续大雨,影响了我们按原定计划行动。亦因此敌人已调来一部分兵力,企图拦阻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立即准备作战,粉碎任何拦阻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敌人!今天的情况,正是考验我们每个干部党员党性的关键!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起模范作用!”

紧急动员令如同一个熊熊火炬,在部队中燃起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烈火。

7月28日晚,我一、四纵队冒着大雨跨越津浦铁路。29日,因沙河水位暴涨,北上受阻。30日,敌欧震兵团的整七十五师、八十五师、五十七师自滕县西犯,堵我北上,企图压缩我军于独山湖以东狭小地区后,加以围歼。

军情紧急,大战在即,指挥员必须当机立断。

针对敌情,叶飞立即命令第二师先敌抢占休城东北的战家河,其余部队于白天冒着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分路徒涉沙河等三条急流。

此时,敌已进抵沙河东岸,与我第二师隔河对战。当晚,部队开进,敌仍尾我追扰。第四纵队第十二师抢占大古村一线高地,掩护其余部队向西北挺进。我后卫第一师接替该高地时,敌整五十七师趁隙占领,经一师猛烈攻击后夺回。

31日,一师阵地整天为敌猛攻,天上,有飞机在轮番轰炸,地上有数倍于我的敌军轮番冲击,阵地曾数度告急,但敌终未能得逞。

入夜,部队继续北上,第一师扼守郭里集东北的王山、卧牛山一线,以掩护全军通过郭里集至马坡一段水阔八里、深及胸部的泛滥地带。



敌人当然不会放过我军,攻击更为猛烈。我扼守王山的第一师第一团第九连的一个排,英勇奋战,伤亡殆尽。

敌军我军,尸体擦着尸体。不少我军战士的尸体,被敌人数把刺刀一齐刺进了身躯,可以想见,在敌众我寡情况下,战士们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8月1日,白天行进,通过泗河,终于在这个建军节的纪念日,与我右路陈、唐兵团胜利会师。当晚,部队进抵济宁以东,准备在济宁以南,西渡运河。2日晨,敌整八十四师阻我西进,激战终日,遭我严重杀伤后,回窜济宁。

3日1时,风高月黑。

在万籁俱寂中,叶飞命左路军悄悄起床,提前行动,部队断绝烟火,战马衔嚼,人不知、鬼不觉地绕过济宁,于大长沟公路抢过运河。

敌第五军也想到了长沟这一要点,他们经兖州西犯,于3日6时赶到长沟,但我军已胜利进入鲁西南大平原嘉祥地区了。

我一、四纵队经过艰苦转战,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人民解放军终究不是“面包”和“西瓜”,并不那么好吃。

想吃,想啃,是要硌掉牙齿的!

部队到达鲁西南之后,由于十余天的过河涉水,艰苦战斗,加之部队成员中俘虏成分较多,减员很大,情绪低落。叶飞的心情很是沉重,尽管是从危难中摆脱出来的,也觉得两支主力纵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有些对不起党。

到达鲁西南以后,收到的第一个电报,是毛主席从陕北发来的。这是个鼓励一、四纵队的电报,全文100多字,是给叶飞并转一、四纵队全体指战员的。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毛主席对于一、四纵队的胜利突围，“很感欣慰”，并予嘉奖。

电报中，毛主席鼓励叶飞及全体指战员要振作精神，准备再战。收到毛主席这个电报后，叶飞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花，心里好受了些。

收到的第二个电报，是陈老总的，也是安慰和鼓励一、四纵队的意思。

中央的慰勉电是8月6日发来的，指出由于我左路军的行动，“目前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转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后来，叶飞又看到毛主席在8月7日致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问道：“叶陶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望即告。”

殷殷关切，力透纸背，叶飞诵读再三，深受感动。

当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中央嘉勉电，读至“并问全军将士安好”时，全场一片唏嘘……随后，一、四纵队与右路兵团合编为华野西线兵团，转战鲁西地区。

这是华野一纵历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段历程。

老作家黄源曾经说过，如果日后有人写出这段经历，很可能是新的《铁流》。

很巧，当时华野政治部文工团正随一纵行动，和指战员们一起历尽艰险。作家茹志鹃、邓友梅等就在这个文工团，他们以后写的中、短篇小说就有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和撷取此中素材的。

邓友梅写的中篇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还拍摄成电影。黄穗写的《向敌后进军》、枫亚写的《向敌后出击》，都在全国解放以后出版了单行本，朴实无华而又真实地记述了当年的人和事。



他接着说：“我们十兵团是能打恶仗，能打胜仗的部队。历史把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战役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也一定能打好。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眼下部队求战热情很高，决心要打好这一仗。可是我们在渡海攻打平潭岛时暴露了一些问题。”说话的是二十八军代军长肖锋，自从军长朱绍清因病离队治疗后，二十八军由他代理军长。

“谈一谈，主要是什么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船只，其次要根据海洋气候选好适当的时机。我们二七四团在大练岛战斗中，就遇上了台风，四个连只上去了两个，幸好敌人增援的部队也遇上了台风，否则将损失很大……另外，我们的后勤供应困难很多，战士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

“是啊，我们的确困难很多。”

叶飞熟知这些情况，但他又不愿因强调这些困难而影响指挥员们的情绪，他打断了肖锋的话说：“可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要知道现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各部敌人自顾不暇，如果坐失良机，敌人很可能重新集结，那时候我们困难会更大。现在，各部队都要认真总结一下前一段的作战经验，扎扎实实地作好渡海作战的准备。”

最后，泉州作战会议决定：由二十八军攻打金门，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攻取厦门。

因为船的诸多问题，在泉州会议上，各军的将领们提出了厦门金门同取，或是先金后厦，或是先厦后金三种方案。叶飞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先厦后金。

那些日子，作为十兵团最高指挥官的叶飞，常常是彻夜不眠。



他深知厦门之战的重要。党中央、毛主席关注着厦门战事，三野的首长们也期待十兵团能够一举获胜。在厦门长大的叶飞何尝不想在家乡父老面前打赢一场漂亮的攻坚战呢？然而，面临的困难的确很多。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其颜色与海礁、石头无二，非到近处很难觉察。打了几十年仗的部队，还从来没遇见过如此设防的海岛。

厦门进攻作战进行得比较顺利，仅仅一个夜晚就解决了问题。到16日早晨，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我军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在厦门北半岛的防御，并迅速向周围扩展。返航的船只又源源不断地把后续部队运往岛上，岛上的敌我力量在明显变化。16日黄昏时分，失去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即四处逃窜。

厦门作战，我歼敌2.7万人，其中俘虏2.5万人。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中将领师长李益智说：我们误认为你们主攻鼓浪屿，就重兵南调，结果万万没想到我们中了计，你们调虎离山，我们只有被动挨打。

十兵团大军人城，厦门人民夹道相迎。攻进厦门，意味着福建全境的解放，这举世瞩目的胜利，使指战员陶醉在凯歌声中。至于十兵团的司令员叶飞，他在自己的故土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厦门民众以敬仰之情赞颂着这位“华侨将军”、“小叶子”。要求采访的记者，要求签名留念的学生，时时都在包围着叶飞。叶飞成了众目睽睽的大人物。

然而，在大的胜利背后，人们却往往忽略了那些本应该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就总体上说，厦门攻坚战是一次大捷；就局部看，鼓浪屿的登陆作战却是一次失败之举。尽管它在整个作战中起到了“北兵南调”的重大作用，但它在木船越海作战中提供了种种教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训和借鉴,为以后攻打金门岛提供了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十兵团的将领们本应认真地对鼓浪屿登陆战加以总结,然而,在鲜花和赞扬声包围的将军们对此却不应有地给忽略了。

于是,便有了后来人民解放军 9000 壮士饮恨金门的沉痛教训;于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史册里写进了令十兵团的官兵们终生引为遗憾的不堪回首的一页。

攻下厦门,打金门便迫在眉睫。

然而,千疮百孔的厦门市一团乱麻似的工作拖住了叶飞。在厦门百姓和当地领导者看来,这位十兵团的统帅代表的是中央、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于是,成堆的问题一古脑儿摆在了叶飞的案头。

这一切如一团乱麻搅乱着叶飞的思绪,征战几十年,他很少管理过城市,一接触没想到有如此之多的棘手问题。部队千里征战,不管是就地筹措也好,后方供应也好,有一套科学合理的保障体系。但地方不一样,几十万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则另有一套为叶飞所不懂的解决办法。可你懂也好,不懂也好,厦门人民把你当做可以信赖的父母官,全靠你拿办法,一切都要你表态。

那些日子,叶飞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厦门的问题。为了更有利于厦门千头万绪的工作走向正轨,他作出了大胆而果断的决定:兵团机关移驻厦门。并发出命令,于 10 月底以前筹措大米 400 万斤,柴草 600 万斤,以解决军民的燃眉之急。

然而,几十年后,叶飞在他的回忆录里坦诚地承认这是一个失策。

说它失策,是因为这样一个决定,直接影响了攻打金门。进入厦门,十兵团的领导们必然陷入一团乱麻似的地方工作中。另外,



厦门是一座海岛,与大陆的电缆又没有铺设,金门方向一旦有事联络起来困难很多。这一点,恰恰被叶飞忽略了。

此外,叶飞对金门守敌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偏差,他认为,对付金门守敌这样一伙残兵败将,无须杀鸡用牛刀,派二十八军对付一下绰绰有余。对此,叶飞有一段自责性的回忆:“金门尚未解放时,我即将兵团部移驻厦门,这是一个失策,因为这影响了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如派刘培善(副政委)同志在厦门主持接管工作,我和兵团仍驻同安,掌握全局,两方面就可以兼顾了。我为什么发生这个失误呢?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于是就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而厦门是通商口岸,如果接管工作不搞好,发生混乱,影响很大,对海外都有影响。所以我作出将兵团指挥部移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的决定,而把解放金门的任务交给了二十八军的首长执行。”

叶飞的判断有什么不对吗?没有。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都证明,金门的李良荣兵团的确是一帮乌合之众,在我十兵团决定攻打厦门时,他就想率部撤向台湾。如果岛上仅有李良荣这群残兵败将,对能征惯战的二十八军来说完全可以对付。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当叶飞率领十兵团指挥机关浩浩荡荡由同安向厦门开进的时候,蒋介石在台湾向金门的李良荣也下达了死令:“死守金门,否则,金门岛上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通通军法从事。”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当然,蒋介石知道一道命令,不可能挽回金门守军的动摇和失败情绪,更不能确使金门万无一失。此时,蒋介石想到一个人,此人便是驻广东汕头的十二兵团司令官胡链。

对胡链这个人,蒋介石和陈诚共同认为,这是一员忠心耿耿的虎将,对蒋家可说忠贞不二。胡链出身贫寒,早年为生活计,投军谋生,后经人介绍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北伐时期在陈诚的第十八军当一名连长,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作战勇敢,深得陈诚赏识,后在剿共中功勋卓著而多次擢升。芦沟桥事变后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和雪峰山会战屡有建树,37岁就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来又升为十二兵团副司令官。淮海战役中,司令官黄维率领十二兵团驰援黄伯韬。被围于双堆集,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链侥幸逃出。这位曾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当过参军的将军,深得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让他重新组建了十二兵团。对此,国民党军政委员颇多微词。

蒋介石经过和陈诚一番密谋之后,立刻派东南军政副长官罗卓英飞赴汕头。

当罗卓英把蒋介石的手谕亲手交给胡链时,这位兵团司令受宠若惊。委员长命令他速率十二兵团移防金门,接替李良荣二十二兵团的金门防务。他表示:效忠蒋委员长,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胡链接到蒋介石手谕的第二天,就开始率部向金门方向运动。

而这一切,叶飞在作攻打金门的部署时,却未曾考虑在内。

二十八军攻打金门作战准备在加紧进行中。

闽南的十月,正是秋色迷人的季节。

地处莲河村的二十八军指挥所,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背



的官兵非常气愤,为此差一点与二十九军闹矛盾。

部队在攻打平潭岛时已筹集了一些船只,攻打平潭岛全部被台风吹散了。

征船之难,二十八军上下体会极深。这一带是新解放区,群众觉悟远远比不上老区,老百姓害怕打仗,加上国民党的造谣恐吓和反动宣传,有的人连人带船藏到了深海小岛上,有的干脆丢下船远走他乡,留下的船也大都被破坏了。

为了找船,肖锋动员了全军的官兵们。

新到的参谋长刘运杰找船去了。政治部主任李曼村也带人找船去了。到10月20日,二十八军总共才筹集到300多条船,一次仅能输送八个营的兵力。而这部分船只,有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暂时沉在岸边江底,还有的拖到苇丛中被伪装起来。

看着眼前这局面,肖锋忽然想到了三野代司令员粟裕。

据说当解放金门的作战方案报到粟裕那里时,粟裕明确作了三点指示:

1. 以金门守敌原有1.2万人计算,只要敌人增加一个团不打。
2. 没有一次载运六个团的船只不打。
3. 要求苏北及山东沿海挑选的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不到不打。

这三点,可谓是攻金作战的点睛之笔。遗憾的是,被叶飞在布置金门作战时忽略了。这倒不是叶飞顶着上边的指示不执行,更不是抱什么个人成见。实在是,一连串的胜利,加之对当面之敌的错误判断,使叶飞对攻金作战考虑得过于轻松了。以至于到10月21日,离总攻金门的时间只有几天时,叶飞在电话里明确指示肖锋:“我看有两个团的船只就可以下手。”



尽管肖锋仍然坚定地认为没有六个团的船只不能出战,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在兵团首长已经下定决心,的情况下,如果再去申辩岂不是干扰上级的决心。而当时的二十八军指挥员们,几乎多数都认为攻金时间应该推迟。刚刚配属二十八军的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师长朱云谦曾这样对肖锋说:“既然攻金条件不成熟,你为什么不能再次向叶司令员建议一下。”肖锋面带难色地说:“你们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顺利拿下了厦门,如果我们二十八军不能及早打下金门,确实不好说话呀!至于向兵团首长进言,是不行的。因为兵团已经否定了我的建议。”

10月22日,正在二十八军积极备战时,十兵团的敌情通报到了:敌胡链的十二兵团一一八师已抵金门。关键时刻,敌我力量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恰在这时,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从厦门打来一个关键性的电话,决定了攻金作战的开始。叶飞说:“老肖啊,胡链第十二兵团的几个军已从海上向东北方向运动,有的船停在金门、厦门东南海域。他们究竟往哪里撤退搞不清楚,我们要抢在胡链登陆之前攻击金门。”

紧接着这个电话的,是十兵团的决定。

根据兵团首长决定:二十八军10月24日夜攻打金门。并在命令中特别重申:金门兵力1.2万人没变。我军现有船只,一次可运八个营为第一梯队,一夜来回两次,可登陆五个团。据此,歼灭金门守敌是有把握的。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抢时间,抢在胡链登陆之前占领金门。

肖锋意识到,二十八军历史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战斗就要来临。



与厦门岛相比,金门当时是一个并不怎么知名的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 124 平方公里,小金门为 15 平方公里。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 10 公里处,北距大陆也是 10 公里。该岛状如哑铃,东半部为山地,西半部为丘陵,北部岸滩地段便于登岛。岛西部有金门县城,岛上居民约四万人,多是华侨家属。岛上十分荒凉,没有什么重要产品,居民主要靠侨汇及农渔业为生。传说早在唐朝,中原人陈渊来金门牧马,岛上才有渔业耕稼之利,于是,后在岛上建有“陈牧马侯祠”。1949 年以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看重了这个荒僻小岛。他认为,控制了金门,就可封锁厦门的出海口,共产党如果跨海攻台,厦门港必然是主要的舰船集结地,从这个意义上,控制金门对屏护台湾意义重大。蒋介石非常明白,在陆地上,共产党已不允许他有立足之地,他只有着意经营沿海的几个岛屿。共产党没有空军和海军,这一点,他略占优势。如果以金门某几个小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再加上他的海空军力量,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重新回到他的南京总统府。

金门,蒋介石把它看做是生命之舟。所以,当汤恩伯丢了厦门,退守金门以后,他立即开始连续不断地为金门调兵。原防务金门的李良荣兵团,加上刚从台湾调来的青年军第二〇一师,总兵力 2 万余人。二十八军的攻金方案,基本上是根据金门岛的这二万兵力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胡链第十二兵团十八军的两个主力师,正在靠近金门。十二兵团的第十九军,蒋介石本来是令其去防守舟山群岛的,但开赴舟山群岛的途中蒋介石突然变了主意,令十九军改驻金门。此外,在十二兵团迅速驶向金门的同时,蒋介石深恐连吃败仗的汤恩伯连金门也会断送。于是,在胡链开往闽浙沿海途中,电令胡链去台北,宣布胡链以十二兵团司令官的名



义,替代汤恩伯担任福建省主席,令胡死守金门。胡链不敢怠慢,于24日晚间冒着风浪搭一艘补给船驶向金门。此时,我二十八军的攻金部队刚刚起锚。其实,胡链和十九军攻金门的船队已于23日到达金门岛外的海面,只是因为风大还未登陆。对这一点,我军缺少的是足够的估计和认真的研究。

其实,早在十几天前,二十八军攻打大、小橙岛时,就抓获了国民党的一个团长,经审问,知道胡链的第十八军有两个师已经全部抵达金门岛。这本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但我方指挥员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国民党是要逃跑,敌人俘虏的口供不可靠。

实际上,从我二十八军攻击战斗开始的那一刻起,面对的早已不是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的残兵败将们。

当二十八军的登船部队即将起锚时,肖锋突然又接到兵团领导的电话,告知金门守敌可能已经增加,要肖锋不可上岛,留在后边指挥。肖锋本来对原计划有新的考虑,当即问攻金计划是否改变。回答是:决心不变。并说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胜利是有希望的。

1949年10月24日晚,进攻金门岛的第一梯队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从莲河、大橙岛、后村启航,船队像一支支离弦的箭,射向了金门岛。

二四四团团团长邢永生,率领自己的团队从莲河出发。全团乘坐大小船只43只,成三棱形船队劈浪前进。

二五一团团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大橙岛出发。船队犹如一个“川”字形,左中右呈三条直线,显得很有秩序。

二五三团团团长徐博、政委陈立华率领大小80只船,从后村启



航直驶金门岛。

当三支船队驶到金门海峡中间时,海面上刮起6级强风,大海掀起冲天巨浪,凶猛地袭击着船队,打得船只像在荡秋千。由于各船队船只的性能不一样,在狂风巨浪的袭击下已无法再协调动作,队形已经一片混乱。由于每个团只有一部两用报话机,对军指挥所的联系已十分不便,各营、连之间仅靠手电筒上蒙一块红布,用灯光联系。

启航数小时后,到了10月25日凌晨2点左右,最前边的船只离金门岛仅有五六百米了,忽然间黑沉沉的天空被一串串闪亮的弹道划破。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船队中间掀起一道道水柱。金门岛的守军开始对我登陆部队实施拦阻射击。

我登陆先头分队都是久经战火的老兵,在敌人炮火疯狂袭击面前,他们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冲向海滩。

关键时刻,我后方炮火开始向金门岛前沿发起袭击,以支援我攻击部队实施登陆。在我强大的炮火支援下,渡海攻金的第一梯队二四四团在垵口地段、二五三团于古宁头、二五一团于湖尾乡地段登陆成功,并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然而,登陆的三个团在没有巩固滩头阵地的情况下,即向敌人纵深发起攻击。

可就在这时,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出现了。按照兵团首长的部署,第一梯队三个团登陆后,船只立即返回接第二梯队登陆,否则,我军打下金门只能是句空话。谁知我第一梯队的三个团登陆时,正值涨潮,国民党守军在海滩浅水区设置的障碍物全被潮水覆盖了,许多登陆船的船底被挂住,动弹不得,战士们只有下水前进。这时,如果组织得好,船队还有返航的可能。本来每条船上都有负责押船返回的干部战士各一名,这些干部战士见前边的船只全都



没返回,就想等统一指挥一齐返回。就在这时候,一些临时招募的新船工害怕敌人猛烈的炮火,纷纷跳海逃生,整个船队已无法统一指挥。

此时,已经错过了涨潮高峰,数百只船全部搁浅在海滩上。25日天大亮以后,这些搁浅的船只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国民党守军第十八军军长除了命令部队用火炮轰击外,还专门派了两个团的部队去烧剩余的船只。一番激战之后,敌人逼近了海滩上搁浅的船只,他们朝木船上倾倒汽油、花生油,放火烧掉了所有的木船。二十八军肖锋在隔岸看到的,是一片片滚滚的浓烟。没有了船队,在大陆那边待命的第二梯队四个团无法增援,这样就造成了第一梯队的三个团在金门岛上孤军浴血苦战。

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眼看着自己的部下在血海中苦战,而自己援兵在手却又无法支援的处境了。

1991年的一天,已经离休赋闲的肖锋将军在对笔者谈起金门之战时,其痛苦之状溢于言表,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畏惧和痛苦。但金门作战,当我听到对岸金门岛上最后那稀稀落落的枪声,甚至依稀飘来的冲杀声,我深知这场血战的艰难和壮烈,而此时我手中尚有足以压倒敌人的援兵啊,我的心啊,如同撕裂般痛苦。我这一辈子,也无法忘掉在前线我听到看到的一切。1949年10月25日,这是我一生最为痛苦的日子,那么多人,一去无还哪!”

然而,兵团领导仍寄希望于作最后的拼杀以扭转局面。汤恩伯、胡铤、李良荣之辈均为败军之将,他们的部队不是残兵败将,便是全军覆没后招募的新兵,应该是一触即溃的呀!怎么突然有了本事。但是,他们恰恰忘记了,我三个团的登陆部队面对的是敌人



两个兵团的强大力量,何况它们又有海、空军及坦克、装甲部队的配合呢!

兵团领导依然没有考虑撤退的问题,下决心要增援第一梯队。在厦门征集了一次可运载两个团的六艘汽船和木船,这如果能够付诸实施的话,对于危险境地的第一梯队将是巨大支援,局面将会改变,至少也可以坚守相当一段时间。

然而,意外的情况发生,六艘汽轮的船主们太害怕打仗了,他们有意拖延时间和途中破坏,而负责押船的战士又不会开船也不懂航线,结果六艘汽船有五艘不是开错航线就是抛锚。预计的增援无法实施。

兵团首长命令,要想尽一切办法增援。肖锋根据兵团的命令,决定由即将担任八十二师副师长的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领该团一营,二五九团派两个连向金门进发。肖锋命令,孙云秀上岛后,由孙云秀统一指挥岛上登陆部队。因为二十八军此时已发现一个重要失误,那就是在所有的登陆部队中竟然没有上去一名师级干部,上去的三个团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孙云秀带领四个连队冒险起渡,他们利用夜色掩护,躲过了国民党空军的搜索,基本平安地在金门岛胡尾乡登陆,上岸即歼敌一个营,但因兵力太少,突破口又遭敌人很快封锁,二四六团两个连在滩头被敌人分割,当天全部伤亡。二五九团的两个连是在古宁头登陆的,登陆后也仅坚持到26日夜间即全部伤亡。

今天,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知晓1949年10月金门之战是何等的悲壮惨烈了。然而,仅仅从敌我双方的伤亡数字,我们足可对这场血战的激烈作出大略的判断。金门之战,我

## “飞将军”叶飞



军损失近万人,敌人伤亡更严重,多达2.6万人。区区弹丸小岛,覆盖了数万战死者的遗体,可以想见,其场面是何等惨烈。据说,此战之后,蒋经国曾去金门岛“慰劳蒋军将士”,在他当天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字句:“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我军登岛的仅仅是三个团的兵力,而敌人守岛的兵力,则是两个兵团,悬殊实在是太大了,何况蒋军又占有海空优势呢!以我9000之众,毙敌2万余人,我登岛作战的官兵是何等英勇无畏,完全是可以想见的。

解除金门我登陆部队的危境,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然而,遗憾的是,肖锋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此时的金门岛,已完全被敌人严密封锁了,海面上的任何一件漂浮物,国民党军队都不轻易放过。金门岛的船只已经完全被敌人控制起来了。金门西北的十里海滩,连船的影子都没有,仅有的是敌人烧毁我登陆船只剩下的一堆堆炭灰。

27日白天,敌人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进攻。我军剩余部队此时多隐蔽在古宁头附近的北山一带。敌人对这里组织了大规模的进攻,军舰也绕到古宁头北面的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人海陆夹攻下,我官兵一直战斗到牺牲,大部分伤员被俘。

26日从古宁头突围到岛的东南山区准备打游击的部队,在敌人如同梳篦子一样的搜索下,也已经无法藏身。据后来被证实的消息,这些同志大多壮烈牺牲。

27日9时,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从金门县城以南的南贤厝村最后一次向大陆指挥部用报话机报告:“我三个突击团登陆后即被

中国人民解放军奇将叶飞



胡链兵团包围,苦战 60 多个小时,现已弹尽粮绝,为革命我们没有二话,绝不投降。最后,祝首长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刘天祥团长的话没有说完,只听轰隆一声爆炸声,报话机里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二四六团团长沙云秀在沙头附近被敌人包围,决心不当俘虏而自杀牺牲。

二四四团团长沙永生因重伤在东山沟被敌人包围,被俘后英勇牺牲。

二五三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牺牲。

二五三团团长沙博,在太武山的山洞中藏了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蕃薯为生。国民党军金门战场指挥高魁元,在俘虏中查不到徐博的活人,也遍岛寻不见徐博的尸体。他不相信这位共军的团长会泅渡回到大陆,就派兵在山上一遍遍地搜索,最后才将他从山洞里找到。

到了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时,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作战,我军的失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国民党的舆论开始了自相矛盾的鼓吹。《中央日报》称,消灭对方“5 个团共 1.4 万多人”,甚至胡吹俘虏中有“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此后,国民党官方仍嫌吹得不够,又予以加温,称金门之战消灭对方“7 至 8 个团,2 万多人”。此后,又是拍电影,又是搞祝捷庆祝。

然而,以伤亡 2.6 万多人的代价,对付我三个登陆团,于国民党军方高层来说,吹起来毕竟是觉得有些心虚的事。还是亲自指挥作战的胡链、高魁元等稍微客观些,称只消灭了对方“1 万精锐之众”,并说登陆部队中根本没有师以上干部。他们同时不得不承



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顽强作战精神,称在夺取第一座阵地时,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更使敌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被俘的数千伤员中,竟无一人投降。胡链直言不讳地称: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这样的事简直不可想像。

金门战斗的失利,震动了全国,惊动了中央。

这是中国共产党三年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损失最大的战役。这是在举国上下一片凯歌声中的一次失利之战。投入作战的9000余部队竟然成建制地覆没了,这在解放军战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0月29日,二十八军代军长肖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地来到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的办公室,一见到叶飞便失声痛哭。叶飞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进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肖锋、李曼村走后,叶飞就开始起草请求给予自己处分的电报。

三野首长的批评也是很严肃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要求十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加以检讨”。

当天,十兵团即向三野报告说:“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重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链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兵力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敌援军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10月31日,由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



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委黄水星,二十八军代军长肖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参加的十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肖锋第一个发言,他说,金门失利“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极大的罪,请求十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很快接过肖锋的话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肖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予严厉的处分。”

三野前委很快接到了叶飞请求给自己处分的电报。三野和中央军委没有处分叶飞。

11月8日,毛泽东指出:“以三个团去打敌人的三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教训,准备再次攻金。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

这样,叶飞及二十八军官兵就失去了再攻金门的机会。对于叶飞来说,失去了立功赎罪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叶飞直接打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再次要求处分。毛主席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叶飞的忏悔是十分痛苦的,他把这痛苦的忏悔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回忆录里:“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而我们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



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客观条件是欠缺的。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8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的最根本的原因。”

此后为再攻金门,叶飞组织兵团和各军师作了极为认真的学习和总结,吸取了大量有益的经验教训。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中央取消了再度攻金的计划。从此,没有再攻金门岛,这对叶飞来说始终是一大遗憾。

叶飞所部在金门作战中失利这件事,本来中央和军委早有定论。但是,“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在搜集叶飞“十大罪状”时,将金门失利也作为一大罪状抬了出来,企图以此整倒叶飞,这本来就是叶飞心中的一大伤疤,给叶飞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现在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决定炮击金门,严惩美蒋,叶飞怎能不感到心潮澎湃呢?可当时,福建前线的炮兵力量并不强大,福建军区仅增加了一个炮兵师。

叶飞根据台湾每隔一天向金门开出一至两艘中字号运输舰以及每当运输舰接近金门海域时,金门将派出三艘驱猎舰到外海迎接的敌情,定于9月3日下午1时50分,向金门发起炮击。当炮击开始后,大、小金门顿成火海,即刻就摧毁了国民党金门守军的7个炮兵阵地,击沉炮艇、拖轮各1艘,击伤驱猎舰3艘,击毁水上活动码头一个。

这次炮击,给予美国和国民党台湾当局以沉重一击。



此后,美蒋抓住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尚未入闽的机会,派出飞机轮番轰炸福建沿海城市和前线炮兵阵地。

对此,叶飞等向中央军委请调防空部队。不久,中央军委即派出一个八二毫米高射炮团入闽,并不断给予来犯国民党飞机以打击,使福州、厦门的空袭稍见缓和。

为解决防空兵部队太少的难题,叶飞部署了一次“空城计”,将福州的八二毫米高射炮兵团秘密调出福州而进入厦门,构成一个对空火力网。

当蒋机肆无忌惮飞抵厦门上空时,高炮团以突然和密集的火力一齐射击,击落蒋机三架,击伤多架。是役后,叶飞又立即将高炮团紧急调回福州,掩护 1954 年国庆游行活动。叶飞的妙计使台湾当局弄不清福建叶飞部究竟有几个高炮团。从此,福州和厦门及前沿阵地防空的紧张状态有所缓和。

自 1954 年 9 月 3 日的炮击开始至同年 10 月,福建军区部队共击落蒋机 12 架,击伤 42 架,击毙国民党空军上校大队长陈康。

战后,在陈康驾驶的飞机残翼上标有的“银空猎犬”的字样仍清晰可见。

1958 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叶飞原不参加这次会议。但突然接到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的电话,他转告叶飞:中央决定再次炮击金门,指定要叶飞负责指挥。

当时叶飞已由司令员位置上退了下来,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工作重点主要是在地方。因此,他对这个重大军事行动,不由福州军区司令员指挥而由政治委员来指挥有点疑惑。

于是就向王尚荣询问:“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并指示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炮击金门作战。

在王尚荣部长的安排下,在叶飞的宿舍里架起了专线电话,成了炮击金门的总指挥部。福建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理指挥。

8月23日中午12时,震惊世界的炮战终于开始。福建前线所有炮兵阵地万炮齐发,其炮火密度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击柏林的炮击,使蒋军伤亡惨重,并险些击毙金门守军头目胡班和美军顾问。

下旬,叶飞由北戴河返回厦门前线,开始了指挥炮兵攻击金门海上运输线的炮战。在叶飞的指挥下,很快切断了金门的一切补给渠道,使金门蒋军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

9月7日,美国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庞大的海上编队。美舰分别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

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为准确执行毛泽东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请示毛泽东,如果美舰向福建前线开火时,是否可以还击?毛泽东明确指示:“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为了使前线炮兵准确无误地打击蒋舰,叶飞下令前线所有炮兵师(群)、炮兵团部队以及海军岸炮部队必须准确射击。

当炮击开始后,美舰“纸老虎”的原形立即暴露,丢下蒋舰掉头向台湾逃窜,使蒋舰遭到了惨重损失,共被击沉三艘,击伤数艘。

此次炮战摸清了貌似强大的美国军队的底牌,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神威,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重大战略任务。

# 常胜将军庄田



1. 谋生新加坡, 幸遇党组织, 境外秘密入党; 派遣莫斯科, 学习军事, 后成大事业
2. 倍受周恩来器重的优等生, 果然不负厚望
3. 三天熟背全部密电码, 历时四个月闯关过隘赴琼州
4. 冒险偷渡香港, 辗转南京晋见周恩来; 据理力陈利弊, 毛泽东收回琼纵北撤命令
5. 进驻中缅、中越边界, 封锁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通道
6. 庄田告诫亲友: “我在共产党里做事, 你们不可倚官恃势, 给政府添麻烦。”



## 庄 田

(1907—1992年)

广东省万宁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入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1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瑞金红军学校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军模范团政治处主任,红一军团第三师七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第三师七团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九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三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队长,抗大三分校大队长、教育长,陕甘宁边区考察团团长,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副总队长,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粤桂边纵队司令员,桂滇黔纵队司令员,1947年至1948年任越南国防部军事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教育长、副校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 1. 谋生新加坡, 幸遇党组织, 境外秘密入党; 派遣莫斯科, 学习军事, 后成大事业

“呜……”

茫茫的南海中, 一艘新加坡的货轮正吐着浓烟, 吃力地航行。

由于载物过重, 船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就像一个醉汉一样, 摇摇晃晃的时隐时现, 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在本来就不很大的船舱中, 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五六十个衣衫褴褛的贫苦农民。虽然眼下已至秋天, 但由于人多, 一个个仍然热得喘不过气来。

汗味、发霉的食物味、劣质的烟草味, 还有说不上名的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 熏得人们直骂娘, 再加上不断的颠簸, 使得人们直想呕吐。

就在这拥挤不堪的船舱里的人群中, 夹杂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 他虽然由于营养不良而非常瘦弱, 但是一双浓眉大眼却能看出其倔强的性格; 个子不高, 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英气。

他叫庄田, 原名庄振风, 1907年出生于海南万宁县龙滚乡风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庄魁运, 母亲张氏均是穷苦农民。庄田虽然是家中惟一的男孩, 但由于家境贫寒, 为了吃饭, 17岁的他也不得不与同村的几个伙伴一道告别父母, 加入了闯南洋谋生的行列。

在经过几天痛苦的航程之后, 这艘老牛船终于漂洋过海到了当时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庄田和几个同行的伙伴在几年前到达这里的一位同乡的帮助下被介绍到一家橡胶厂做工,像千万个从广东沿海各地漂洋过海被贩卖到这里的“猪仔”一样,天不亮就在资本家的吆喝声中起来割胶,饱受了英国资本家的欺压和盘剥。

在厂期间,庄田难以忍受工头对工友的欺压,经常保护一些遭受工头无端打骂的伙伴,由此遭到工头的疾恨,于是就找理由把庄田解雇了。

在此后的一连几个月里,庄田都没有找到工作,漂泊在异国他乡的风雨中,忍饥挨饿,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就在庄田衣食无着,进退两难时,幸得一位好心的同乡的介绍,才在一艘荷兰资本家经营的“生什”号轮船上找了份锅炉工的工作。

在当时,只要有点办法,谁也不愿干这项工作。但眼下饥不择食,也顾不了考虑这么多了,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从此每天起早摸黑,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而且这个工作干起来就不能停,特别是在夏天,船上没有任何降温设备,锅炉房里更是闷热难忍。庄田整天受着高温煎熬,体弱的他经常中暑昏倒在锅炉旁。

残酷的侨工生活使庄田开始思索一些问题,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为什么外国资本家对待华工这样狠毒?

庄田心中的愤懑难以排解。

轮船靠港时,其他船员在无聊苦闷中无所寄托,便整天跑去酒馆、赌场、烟馆消磨时光。而庄田却只是呆在轮船上,望着港湾里时进时出的船只沉思。

庄田的洁身自好以及他勤劳朴实、正直勇敢的个性引起了“生



什”号轮上一位名叫黄宜敦老工人的注意。

庄田不知道,黄宜敦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生什”号轮船上党的支部书记。

自从注意上庄田后,黄宜敦便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庄田,帮助他解答一些想不通的问题。

时间一长,二人结成了忘年之交,在茫茫的大海中,有这样一位长者在身边关心自己、开导自己,庄田的内心非常高兴。

随着时间的人推移,黄宜敦开始向他传播一些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向他讲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故事,并启发他认识作为一个产业工人仅仅只要求自己做一个本分、正直的人是很不够的,还要有远大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自觉地努力奋斗,这才是有工人阶级觉悟的表现。

在黄宜敦的启发诱导下,庄田的阶级觉悟有了迅速提高,他开始懂得了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地,必须彻底推翻这个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的道理,并且感到了在“生什”号一定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活动。

黄宜敦看到庄田的成长进步非常高兴,不久就把“生什”号上中国共产党秘密支部存在的一些概要情况告诉了庄田,庄田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激动,强烈要求加入共产党。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6年3月的一个夜晚,“生什”号轮的中共党支部正式接纳庄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秘密组织了入党宣誓。

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祖国的先进党组织,并且自己已经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庄田的心情非常激动。

庄田暗下决心,把这一神圣的时刻当做自己人生道路的新的



他先到了上海,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接见了庄田以及与他一起回国的几位学员。周恩来向庄田等人介绍了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鼓励他们到前线去,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把自己所学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军事斗争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周恩来对庄田这位学习尖子格外器重,亲自找庄田谈话。他告诉庄田,红军部队正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造就大批能文能武的军事干部。

为此,中共中央已调刘伯承等人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办学之初,一切从零开始,但最缺少的是教官,你们这些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优等生,党希望你们能去红军学校当教官,为红军培养更多的军事人才。

归国之前,庄田一直为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的豪情壮志所激动,对于周恩来的安排,庄田没有思想准备,但他看到周恩来那充满信任和鼓励的目光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党的希望,是组织上的安排,个人应该毫无保留地服从组织决定。更何况,莫斯科的学习生涯,使他明确知道,军事教育对一支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想到这里,庄田的心里豁然开朗,他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代表其他几位学员表示,一定要将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在上海受领完任务后,庄田很快就来到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江西瑞金,刘伯承得知给他送来了莫斯科步兵学校的高才生时,非常高兴,亲自组织欢迎会。

刘伯承握着庄田的手亲切地说:“庄田同志,周副主席以及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早就告诉我了,你可是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优等生啊,红军学校迫切需要你这样的同志来充实我们的教官队伍,我



代表我个人也代表红校的全体同志欢迎你们。”

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庄田的内心无比激动,决心把自己所学的本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红校的广大指战员。

初到红军学校,庄田被任命为学员第一连第二排排长。

他想方设法授好课,并深入训练场加强训练指导。帮助学员掌握进攻、防御、追击、退却、侦察、警戒等战术原则和技术。庄田授课深入浅出,注重实效,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也很受刘伯承的赏识。不久,庄田就升任学校第二营政治指导员,第二营下分政治、步兵、特务三个连队,有学员 1000 多名。为使学员学好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战役战术以及管理教育等课程,庄田亲自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教材,供学员们使用。他讲课声音洪亮,举例生动形象,感染力强,深受学员欢迎。他对学员管理教育既严格又适度,使全营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随着红军的发展,1933 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一个“模范团”。庄田奉命调任“模范团”政治处主任。

该团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实质上是红军总部的一个高级教导队,每三个月从红军主力部队以及各地赤卫队中选调优秀干部战士接受培训。庄田并不把工作局限在政治工作方面,他始终战斗在军事训练的第一线,制定培训计划,落实训练进度,协助团长、政委很好地落实了中央军委的意图,工作十分出色,培训了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在培训过程中,“模范团”还非常注意在实战中提高“模范团”学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在庄田等人的积极争取下,中央军委决定由叶剑英统一指挥“模范团”等部队,在福建清流地区开展一次进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攻战役,以配合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战斗打响后,叶剑英命令庄田率领一个营消灭沿田埂设防的国民党“围剿”军一部。庄田受命后随即将部队分为两路,实施迂回夹击,奇兵从天而降,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很快就溃退了。庄田小试牛刀,能打仗的名声很快就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3年5月,中央军委以“模范团”为骨干,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师,庄田被任命为师政治部主任。

红三师经过短期整训后,随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反“围剿”作战之初,红三师就取得了朋口战斗的胜利。

此次战斗经过周密部署,于凌晨时分打响,我军约一个团的兵力按计划迂回到了敌人的侧后,主力部队则实施正面强攻,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阵地很快被突破,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红三师乘胜追击,一鼓作气,一举攻占了连城。

这次胜利,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少有的几次漂亮仗之一。

然而,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原则,致使红军损失不断加重。

庄田对这种主观指导严重脱离红军客观实际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多次直抒己见。

庄田对“左”倾军事指挥路线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并多次明确主张应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指导反“围剿”斗争,因而得罪了王明等人,遭到了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先被撤销了团政治委员的职务(由于红军损失严重,部队缩编,庄田已于1934年初由师政治部主任改任团政治委员),并被内定为所谓“罗明路线的小人物”,不久又遭到关押审查。庄田并没有被这种淫威



所吓倒,他毫不屈服,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据理力争,这使得负责审查他的人非常恼火,准备对他采取更为严厉的处置措施。

就在这时,周恩来恰巧到庄田所在部队检查工作,发现了庄田被关押后,立即找有关同志谈了话,在周恩来的周旋下,庄田才被解除了审查,并调任红九军团第七团政治委员。随后,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庄田的所谓“错误”也得到了平反。4月,庄田受命率领红七团参加了乌江北岸的阻击任务,两个多月时间转战千里,与兄弟部队一道牵制了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并在老木孔等地区,将黔军犹国才部五个团予以重创,俘虏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贵州军阀围堵红九军团的部署。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激功会师后,他奉命前往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任政治委员。他与许多坚持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指挥员一道,有力地抵制了分裂主义的错误行为。为此,受到了张国焘的责难,被调到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第三团任政治委员。后随西路军浴血转战河西走廊,兵败后历尽艰险,直到1937年3月才辗转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抗大第三分校大队长和教育长,继续为党的军事教育事业贡献力量。1940年1月,他出任陕甘宁边区考察团团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率团对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并向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作了详尽汇报,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同时为保卫和建设边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资料。



### 3. 三天熟背全部密电码, 历时四个月闯关 过隘赴琼州

海南岛抗日武装蓬勃发展, 迫切需要大量的干部。

中共琼崖特委负责人林李明在 1940 年 4 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篇报告。在报告的末尾言辞恳切地说: “希望党中央阅了这些报告后, 能给琼崖党的工作以具体的指示, 并派一批军事的、政训的、党的、民运的干部及制造手榴弹等技术的人才到琼崖去帮助开展工作!”

4 月份,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到延安汇报工作, 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胡服、古大存、吴有恒等人也于 6 月 28 日、7 月 4 日致电中共中央, 建议派大批干部赴琼开辟根据地, 指出“这对中国革命有极大的意义, 在海南组织一支强大部队, 创立根据地, 对全国大有益处, 望中央、省委派最负责的人, 以坚决的方针去工作”。

电报中对琼崖“伪、敌、我形势, 日、我和友党、友军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共产党的武装占有完全的优势的情况下, “因当地党对统战策略的错误了解, 对国民党过于退让, 不去发展, 至今政权仍是国民党的”, “望中央去电南方局及广东省委, 力争海南岛成为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猛烈发展自己, 建立部队, 并争取瓦解或相机解决国民党之保安团, 坚决建立政权, 则海南岛大可发展。”强调“广东党如果以坚决的方针完成海南岛的工作任务, 对华南抗战形势的好转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东江现有部队的保全与扩大同海南岛的工作互相配合, 对争取时局好转亦有重要的意义。”



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紧接着,陈云又向庄田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使之成为琼崖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三是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陈云同志的指示使庄田豁然开朗。他说:“请党中央放心,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一定牢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

最后,陈云同志还告诉庄田,中央决定从电台和军械部门抽调几位同志随他一起出发,并交待庄田到总政治部机要处去学习密码。

临走前,陈云又再三嘱咐说:“庄田同志,你是从延安派去的干部,要把延安的作风带过去。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党内外团结,并注意经常与党中央保持联系,重大事情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告别了陈云同志,庄田回到了住处,抓紧时间交待工作,做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七天之内记熟电报密码及使用方法。在机要人员的帮助下,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庄田就背熟了所有的电报密码,并掌握了使用方法。

随同庄田一起前往海南的还有勇敢善战的覃威,曾与庄田一同战斗过。另外还有电台台长刘成义、军械师王昌义及云勇、曾飞等人。

临行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进行了最后的思想动员,并对途中有关事项作了仔细的交待。

原先已到延安、拟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林李明,因“七大”迟迟不能召开,也奉命返琼,与庄田同时离开延安,分头南下。

5月5日凌晨,庄田等人随周恩来一行分乘四辆卡车,离开了延安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是党中央派驻重庆代表团的领导人,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他经常往返奔波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这次能有机会跟他同行,令庄田非常兴奋。

当车子驶出古老的延安城门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依依不舍地望着杨家岭那排半圆形的窑洞,都在心里默默地喊:

“再见了,毛主席!”

“再见了,战友们!”

“再见了,延安!”

从延安经西安到了重庆,一路比较顺畅。

到达重庆后,庄田一行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暂时住了下来。第三天,周恩来派人把庄田叫到他的住处。他一见庄田就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来来,庄田同志,请这边坐。”

庄田坐了下来。周恩来同志亲切地问他路上累不累,大家休息好了没有。庄田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同志点点头,又问道:“你们当中有几个是琼崖人? 懂不懂地方话? 会不会讲?”

庄田回答说:“我们当中只有我和云勇是琼崖人,地方话当然懂,可是多年不讲了,现在讲起来有点拗口。”

周恩来笑了笑,又说:“告诉大家,到琼崖去要学习当地语言,这是联系群众、同当地人民交流感情的武器。不懂地方话,就做不



好工作。”

周恩来同志讲话很随便,就像拉家常一样,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询问赴琼的准备工作情况:“怎么样,同中央联系的密码都记熟了吧?会使用吗?”

早在延安时,周恩来就曾经派人通知庄田说他要亲自检查一下他们对密码的掌握情况,可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

庄田把电报密码和使用方法向周恩来同志背诵、复述了一遍。他听了很满意,并告诉庄田说,已让廖承志在香港买了两部电台,估计庄田他们到雷州时会送到,然后带往琼崖。

接着,周恩来同志对他们所执行的任务作了详细的指示。他指出,全国抗日的高潮即将到来,整个形势十分有利,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在谈到琼崖的具体情况时,周恩来说:“琼崖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琼崖人民同敌人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琼崖远离中央,交通不便,外援困难,斗争十分艰苦。要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还要做出艰苦的努力,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琼崖的革命斗争很关怀,曾经多次派人去参加领导琼崖的革命斗争,这次又派你们到那里去,你们一定要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指示带下去,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琼崖的具体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接着说:“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党中央的意见还是要他当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政治委员,对琼崖的革命斗争实行一元



化领导。你们把这个意见转告给琼崖特委。你们到琼崖工作的同志要支持冯白驹的工作，在特委的集体领导下把工作搞好。”

“请中央放心！”庄田接过话说，“我一定将指示转达给琼崖特委。作为我本身，一定按照中央的指示，尊重冯白驹同志的领导，协助他做好工作。”

“这样就好！”周恩来同志点着头，又说：“目前，敌人在琼崖驻扎着大批装备精良的军队，你们的斗争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必须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设好，这是由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的。”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我党独立自主，以及我军要不断发展的原则。他指出，我们必须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里。要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设立财政、经济机关，征收抗日捐税，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干部。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周恩来同志就途中如何化装隐蔽等安全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离开重庆后，庄田等人开始了南下的旅程。他们越过了川黔边境的娄山关，进入了云贵高原，经贵阳转去柳州，于6月初到达广西桂林，然后又乘火车经衡阳转赴韶关。在那里，他们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纠缠，乘船经清远到了广州湾（现湛江市）。

广州湾是个海滨城市，当时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租界，日军迟迟未曾对这里用兵。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海滨城市广州湾在战时格外地繁华起来，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商人把这个地方当做庇护



所,纷纷跑到这里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庄田一行七人化装成归国华侨,住在一家法国人开的旅馆里,等候琼崖特委驻西营地下联络站派人来接头。可是一连等了好多天,都不见有什么动静,心中特别焦急。

一天,庄田在房中实在呆不住了,带着刘成义外出了解情况,回来时,在旅馆门口碰见了一位身穿西装的中年人。他上下打量着庄田,试探地问:“你是张先生吧?”

庄田心中又惊又喜,这是接头暗号。

但是,为了避免上敌人的圈套,他定了定神,冷静地问道:“先生贵姓?有何贵干?”

“我姓谢。”来人小心地看看周围,又问道:“一路上只有先生一人?”

“不,同行共有七位。”庄田用暗语回答。

“可找到你们啦!我叫谢里森。”

来人高兴地握住庄田的手。

原来,他就是琼崖特委驻广州湾地下联络站的负责人。

当下,他们就在楼下餐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交换情况。交谈后庄田才知道,他已经找了好多天。他告诉庄田,廖承志同志托人在香港买电台的事还没有办妥,要他们稍候几天再走。

等到廖承志托人在香港买来的电台运到时,已是十多天后了。一天早晨,谢里森租来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海康县,然后分批改搭单车(自行车)向徐闻进发,傍晚到了一个海边渔村住下。

渔村只有十几间茅屋。地下联络站的同志介绍说,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抗日战争爆发前,渔民们在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反渔霸、反盐税的斗争。



庄田他们在村子里住下了。为了预防万一，联络站的同志让他们白天疏散到村外去，夜里再回到村里来。

数天后，终于打听到有六只帆船要返回琼崖临高县。庄田立即随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去找船主，请求让他们搭船。那个船主姓王，他见庄田一身华侨打扮，便劝他说：“先生想搭我们的船回琼崖？哎，危险哪！日本仔的兵舰日夜巡逻，一遇上他们可就没命了！”

“是啊，船家，这我知道。可是没法呀！”庄田恳切地说。

接着，庄田假戏真做，编造出一套自己漂泊异国的可怜遭遇。船主听着听着，不再吭声了。

旁边的一个老舵工见庄田确实像回乡“番客”的样子，也帮他说情。船主终于答应了。

可是，偏偏老天不作美，一连好几天，总刮西南风。一等又是好几天。

一天傍晚，船主跑来通知庄田上船。庄田抬头看看天，果然是渡海的好时机，东北风呼呼地刮，海浪哗哗地涌，海面灰蒙蒙的。

帆船扬帆启航了。想到很快就能到达琼崖，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

不料，当深夜行至中途时，船速忽然减慢了。庄田急忙跑上舵楼，只听船主说：“真糟糕，风停了。”

庄田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要是他们不能在天亮前靠岸，一旦被日军发现，那问题可就大了。船主也十分焦急，喝令船工们赶快摇橹。

船像蜗牛似的向前挪。一个老船工跪在船头祷告天公保佑。为防不测，庄田赶紧把其他几位同志召集到舱里，向大家说明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了事情的严重性,并要大家作好与敌人肉搏、为党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思想准备。

还好,没过多久又起风了。船帆又高高地升了起来,船头哗哗地犁开浪沟,船又向前疾驰起来。大家高兴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在桅杆顶上瞭望的船工忽然拍起巴掌报警。船主一个箭步跑到船舷边侧耳细听,喃喃地说:“日本鬼子的军舰真的来了!”

庄田环顾海面,四周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是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马达声。船主转身对着船工喊:“落帆!”

船工们解开后车上的缆绳,船帆“刷”地一声落了下来,接着,桅杆也放倒在船上。

马达的响声越来越近,日舰上亮起了探照灯。船上的人都伏在船舷边,操起了木棒,刚才烧香求神的老船工也握了一把斧头在手。船主全神贯注地操着舵,时左时右躲着探照灯光。还好,日军没有发现他们,军舰从帆船附近飞驰而过。船上的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船主立即吩咐扬起风帆,继续前进。

一路无事,船终于赶在拂晓前,安全通过了琼州海峡,在临高县的一个渔港靠岸了。

庄田一行上岸后,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穿过日军的重重封锁线,于9月7日到达美合抗日根据地。离开延安到今天,已整整过了四个月。

美合位于澄迈县西南部,方圆100多里,周围有仁兴、岭资、岭南、和安、兰洋、南坤六个乡。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部于1934年年底从琼山县树德、咸来一带迁到了这里。

站在这块解放了的土地上,庄田的心情十分激动。



正当他在欣赏四周优美的自然风光时，一位身材魁伟的人快步走来。他大约 30 来岁，大方浓眉毛，眼睛炯炯有神，瘦削的脸上带着微笑。来人老远就向庄田伸出手来。

庄田忙迎上前去，正要开口，那人却先自我介绍说：“我叫冯白驹。你就是党中央派来的庄田同志吧？欢迎，欢迎！”

庄田紧紧握住冯白驹的手，说：“老冯同志，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请多多帮助！”

“哪里，哪里，我们才应该向你们学习呢！”

冯白驹同志使劲地握着庄田的手直摇，又说，“这回好啦，加上你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我们琼崖就更有力量啦！”

冯白驹同志这些纯朴谦虚的话语，充满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庄田激动地说：“老冯，你们辛苦啦！”

冯白驹同志爽朗地笑了，说：“没什么！没什么！”

庄田望着冯白驹同志那瘦削的脸庞，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停了一会儿，冯白驹同志对庄田说：“老庄，你们未到之前，党中央就用电报通知我们了。我们多么盼望你们早日到来啊！现在你们安全到达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会合作得很好的！”

说了好一阵子话，庄田又把身边的几位同志一一介绍给冯白驹同志认识。冯白驹同志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员和设备，更加高兴了，连忙表示感谢党中央对琼崖抗日斗争的关心和支持。

不久，琼崖特委举行会议，庄田和从延安学习归来的林李明同志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大家听了非常振奋。会议认真学习了党中央的指示，并结合琼崖抗日斗争的形势研究了今后的斗争方针和政策。大家认为，琼崖抗日斗争的形势



非常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之后,集中其主要力量指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今后的斗争将更加严酷。

针对这种情况,特委决定:放手扩大人民武装,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军民团结,提高抗日军民的斗志。

会议还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改选了特委,由冯白驹任特委书记兼独立总队队长、政治委员,林李明任特委副书记,庄田任独立总队副总队长,李振亚任独立总队参谋长,王业熹任独立总队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部队作了调整,撤销了东路、西路指挥部,改为支队建制。琼文地区的第一、第二大队奉命合编成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警卫连编有一个女子军排。在澄迈、临高、儋县一带的第三、第五大队合为第二支队,支队长马白山,政委符哥洛。直属特务大队大队长朱克平,政委吴文龙。直属第四大队队长兼政委张开泰。并在各级设立了政治机关,配备了政治干部。至此,独立队已有3000人马,远远超过了执政的国民党一方。

会议结束后,冯白驹等同志向庄田详细地介绍了琼崖革命斗争的情况。此后,庄田便下部队,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用延安的经验指导部队的建设与作战,开始了琼崖革命斗争生涯。

随庄田运来的“大电台”,于11月初与延安等地取得了联系,在这个紧要关头,立即派上了大用场。

后来,国民党军向美合根据地发动进攻,我们撤离根据地,回



到文昌、琼山老游击根据地,在那里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和日本侵略者的“蚕食”、“扫荡”,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随后,我们留少数部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分东、西两路撤出外线作战,建立了五指山根据地。

### 4. 冒险偷渡香港,辗转南京晋见周恩来; 据理力陈利弊,毛泽东收回琼纵北撤命令

在工作中庄田十分尊重冯白驹的领导,积极协助他做好党的工作和部队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将红军和八路军的好传统好经验带到了琼崖,大大加强了总队的全面建设,并为总队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庄田在对敌斗争中能从实际出发,执行党的对敌斗争政策,既坚决又比较灵活。他针对琼崖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到各地调查研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以及社会各阶层及人民的情况。并建议特委应公开向人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时要求部队充分作好反击国民党顽军的准备。

1940年底,琼崖国民党保安部队3000余人分五路进攻美合根据地。

在庄田等人的指挥下,安全掩护了后方医院和琼崖公学以及特委、总队机关的转移,并顺利进入琼(山)文(昌)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此后又一次进攻琼文游击根据地,并形成对特委和总队的两面夹击态势。

为打退顽军的进攻,庄田亲率第一支队,在罗蓬坡战斗中全歼

## 常胜将军庄田



8月23日,特委和纵队得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在庄田指挥下纵队向日军占领区发起攻击,解放了许多城镇,同时包围了许多重要城市。至此,建立起了拥有1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1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也发展至五个支队7000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共达2万余人。

1946年春夏之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符气岱同志到海南,向琼崖特委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庄田以琼崖纵队全权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参加军调小组,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琼崖纵队北撤的问题。

当时,庄田正率领部队在琼岛西部进行休整。接到通知后,庄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琼崖的革命斗争是在远离党中央的孤岛上进行的,党中央经常告诫大家要从琼崖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灵活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

琼崖与解放区关山阻隔,千里迢迢,国民党重兵层层设防,要想把这一支近万人的队伍带到解放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另一方面看,琼崖孤悬海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长期坚守。占据海南,对将来的对敌斗争是很有好处的。因此,庄田从内心来讲,不赞成琼纵主力北撤。

事关重大,特委对北撤问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琼纵北撤的指示。在会上,庄田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党中央关于南方各个独立根据地的共产党武装北撤这一战略决策是针对全局讲的,但琼崖的国民党反动派拒不承认琼崖党组织和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合法地位,派四十六军加紧围攻五指山中心根据地,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如果将武装部队集中起来北撤,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庄田的意见与冯白驹等同志不谋而合。

经过认真的讨论,特委决定:一方面作好准备,随时执行北撤的指示;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建议继续在海南坚持武装斗争。

为向上一级党组织详细说明特委的主张,特委决定派庄田赴香港,找香港分局的负责人方方作当面汇报。

于是庄田和助手罗文洪一起化装成商人,准备乘船赴香港。

庄田先到文昌县同特委副书记李明同志(即林李明)接头,他要庄田到海口找地下联络站——“阜成丰”旅店的老板谢佩珊,再由他安排船只送他们经广州到香港。考虑到具体情况,庄田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海口是琼崖国民党的巢穴,不少国民党的特务、暗探都认识庄田,途经海口太冒风险。

于是,经过李明同志的同意,庄田决定在离湛江较近的文昌东阁港偷渡。

这天晚上,庄田和罗文洪由交通员符气岱领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文昌县委驻地后港村,在这里同县委的负责人一起商量偷渡的办法。这时,忽然有人传报,说有一个名叫钟光集的商人从海口乘出租汽车来,要求与庄田会见。“这个身分不明的商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莫非我们的行动暴露了?”

庄田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便拒绝与他会见,并请文昌县委书记符思之立即给他们准备小船,马上偷渡。

庄田急忙赶到东阁乡的一个海边渔村,正准备上船,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又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最近几天,国民党海南当局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海口进行大搜查,封锁了所有的海陆交通线,过往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庄田吩咐艄公,立即扬帆起渡。



船进入了辽阔的大海。庄田感到有些疲倦,很想合上眼美美地睡一觉。可是想起登船之前所发生的事和过海后更艰险的旅途,睡意顿消。罗文洪和符气岱也因心里有事睡不着。

于是,干脆都坐了起来。庄田对罗文洪和符气岱说:“国民党特务可能发觉我们的行动了。他们在海口和东阁搜捕不到我们,一定会跟踪而来。明早,敌人可能会对湛江实行戒严并封锁从湛江至广州的水陆交通线,我们要设法在天亮以前甩掉敌人,迅速通过湛江,绕道乘汽车到广西玉林,然后返回梧州,再乘船到广州赴香港。”

他俩认为这个办法可行,都表示同意。

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庄田等人在赤坎一个渔村登陆,立即到湛江市郊区的公路边等候去广西玉林的过路车辆。

不久,从市区方向开来一辆人货混载的汽车,他们把它截住,征得司机同意后,爬上了汽车。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到达玉林不久便听说,湛江实行大戒严,捕获了一个琼纵的副司令。他没敢在玉林住宿,立即购买船票到梧州去。

梧州,国民党的特务也很多,他们只住了一夜,就购买船票到广州。到达广州后,又转乘火车直奔香港。

庄田一行找到了广东区党委在香港的地下联络站。在那里,他们会见了珠江纵队副司令谢立全同志。庄田的突然出现,使他大吃一惊。

他高兴地与庄田握手拥抱,对庄田说:“老庄,你还活着呀!”

接着,把一张国民党报纸递给庄田:“你好好看看吧,敌人的报纸刊登了你被捕的消息。我们不明真相,真急坏了!”

庄田接过报纸,草草地看了几眼上面刊登的消息:“共匪琼纵



副司令庄田等途经湛江时被我侦缉机关捕获。”

他把报纸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想得真美，真是白日做梦！”

住下来以后，联络站的同志告诉庄田说：“你们离开湛江半个小时以后，国民党特务分成两路追捕你们。一路由湛江至广州，另一路由湛江至澳门，还专门派出两条机帆船，在湛江至香港的海面搜捕。”

联络站的同志特别交代：“在香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也很猖狂，你们要注意隐蔽。过几天，方方和其他负责同志要来找你们谈情况。”

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捕获的不是庄田，便派特务到香港来了，其中还有在海南要求会见庄田的那个名叫钟光集的“商人”。其实他并不是什么“商人”，而是一个国民党中统特务。

正当庄田等待接见时，广东区党委决定将一部分东江纵队的干部撤往越南，要求琼崖纵队也一起撤到越南，并决定派联络员张创向琼崖特委传达。庄田得知这个情况，当即表示不同意，并准备汇报。不久，方方同志派人接庄田到他的住处。

庄田和罗文洪来到方方同志的住处，方方早已在那里等候了。一照面，他就亲切地说：“老庄，这段时间你等急了吧。”

庄田紧紧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手，直率地说：“一心想向党中央和华南分局汇报情况，想着前线打仗，关在房子里可真不是个滋味啊！”方方同志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啊哈，你又在想打仗了！这也是打仗嘛，打的是更重要的仗。”

寒暄了几句，方方同志说：“党中央根据双十协定精神，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将南方五省的一些部队调往



北方。这个决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央通知你们同国民党谈判北撤问题,是原先作的决定,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国民党广东当局认为琼纵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因而不承认海南党组织和琼崖纵队的合法地位。最近,王若飞同志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张治中回广东同张发奎交涉,张发奎公然拒绝谈判,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琼崖纵队歼灭在海南岛上。由于北撤的决定是党中央作的,所以,要改变这个决定必须经过中央同意。香港分局正在向中央建议,让你们马上到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海南的情况,请中央作决定。”

庄田听了方方同志的话,心里非常高兴,对他说:“红旗不倒靠党撑。海南革命斗争每到关键时刻,都得到党中央明确具体的指示。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党中央的指示啊!”

方方同志十分理解庄田的心情,说:“琼崖的同志们都在盼望你们的消息,一俟中央电复,你们就启程吧!”

他还具体地向庄田谈了出发的路线及途中应注意的事项。

几天以后,庄田一行离开香港,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

经过几天海上的颠簸,他俩顺利地到达上海,当天又乘车到达南京,来到梅园新村30号——党中央代表团的驻地,找到了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知道庄田来了,高兴地出来迎接。他亲切地说:“庄振民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周恩来同志叫的是庄田十多年前的名字,听起来十分亲切。庄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激动得热泪盈眶。

庄田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副主席,我们向您请示工作来了。”



周恩来说：“你们一路辛苦了。先吃饭住下来，我们慢慢谈。”

吃过中午饭后，周恩来同志把庄田等人带进了他的办公室，招呼他们坐下。这时，董必武和廖承志同志也走了进来。

为了使首长便于了解海南的革命斗争情况，庄田和罗文洪画了一张海南斗争形势图。首先简要地汇报了海南军民八年抗战的艰难历程，接着，重点汇报抗战胜利后海南的局势。当他们谈到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英勇还击了敌人的进攻的情况时，周恩来同志赞扬说：“你们做得对！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才能恢复和平。”

周恩来同志看了庄田一眼，问道：“琼崖特委对中央关于南方部分部队北撤的决定有什么考虑？”

庄田回答：“我们觉得中央从全局出发，调整我军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我们海南的革命斗争一直是在远离中央、孤悬海外的环境下进行的，尽管环境十分艰苦，但由于海南的党组织坚定灵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紧紧依靠三百万海南人民，革命红旗始终不倒。现在，琼崖纵队已发展到一万多人，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土地，而国民党四十六军正在疯狂地“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部队集中起来北撤，就有被一举歼灭的危险。特委经过反复讨论，要求继续坚持海南武装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请中央考虑我们的请求。”

周恩来同志仔细地听取了庄田的汇报和建议，当即交待他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书面报告。庄田和罗文洪经过认真的商讨，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呈交给周恩来同志。报告经他亲自审阅修改后，很快就被送到延安去了。

不久，周恩来同志拿着党中央的电报告诉庄田：“党中央、毛主席



为实现这一重大部署,庄田决定进行积极果敢的军事行动,消灭敌人,扩大影响,壮大力量。

11月中旬,庄田亲自指挥由几支游击队整编而成的部队一举攻克了靖镇区果梨据点,全歼守军一个中队;不久庄田又指挥部队趁势进军平孟、合峒等地,相机打击驻守在百合的广西省保安团一部,歼敌150余人;接着再歼靖西国民党武装民团一部。

经过庄田等人的精心筹划以及积极果敢的军事行动,迅速打开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部队也迅速发展壮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队由500余人发展到了1000多人。

为更好地统一辖区内的各种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庄田等报请上级批准,决定成立桂滇纵队,庄田被任命为司令员。

1948年5月,为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中共桂滇边工委又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直接领导一线军事斗争工作。庄田又被任命为前委书记。

在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中,庄田也经历过失败的考验。前委成立后不久,为扩大根据地,经工委批准前委决定,由庄田率领桂滇纵队第一支队和云南东南部人民武装——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该纵队原属中共上海局领导,由于桂滇地区已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经中央批准,此时已划给中共香港分局领导,具体由桂滇纵队负责指挥),挺进滇东、滇东甫地区。

但由于敌人预有准备,而我方对情况侦察了解不充分,致使这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未果,同时部队也遭受较大伤亡。庄田对此十分痛心。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庄田果断地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在



10月上旬,国民党军为了“肃清”后方,稳定防御,派遣第八十九军一部、第二十六军一部,企图寻找边纵主力决战,以一举消灭边纵主力。在敌人大兵压迫的严峻形势下,面对敌人的垂死挣扎,庄田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根据敌情,巧妙用兵,利用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取得歼敌近千人的战绩。此后在运动中又寻机歼敌。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先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000余人。为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华中南和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使云南解放战争向着更为有利的形势发展。庄田遂率边纵进驻中缅和中越边界,封锁了云南国民党军企图退往国外的通道,同时积极进攻当面之敌,为南下野战军解放云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他遵照边区党委的决定,率领边纵一部打通云南至广西百色的道路。并于1950年1月与野战军在百色会合,随后在第四兵团陈赓司令员指挥下,沿国境线向云南境内疾进,经剥隘、富宁、砚山,直插金平、马关,一举占领了河口重镇,解放了屏区县城,封锁了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南逃的陆路通道。

此后,他又率部参加了滇南战役,与野战军共同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庄田及其所率领的桂滇黔边纵为彻底解放华南与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年初春云南解放后,庄田所在的桂滇黔边纵队编入云南军区,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之初的云南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国民党残余势力尚未最后被消灭,反动会道门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充斥城乡,民间枪支多为恶霸地主所掌握,惯匪和国民党特务联成一气活动猖獗。庄田积极协助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和郭天民副



司令员指挥剿匪和反霸以及支援进军西藏的斗争。

在此期间,他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当时剿匪任务极为繁重。云南武装土匪共有 250 多股,总人数达 10 多万人。

这些恶势力破坏交通,抢劫仓库,袭击人民政府,杀害干部群众,给云南的生产和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为此,同年 5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剿匪方针,庄田指挥部队对大股土匪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的办法,采用分路合围或长途奔袭以及猛打猛追的战术;对分散的小股土匪则采用“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组织小分队跟踪清剿,力求净化。

至 1951 年年底,取得了消灭残匪 10 余万人的重大胜利。

### 6. 庄田告诫亲友:“我在共产党里做事,你们不可倚官恃势,给政府添麻烦。”

1957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庄田为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司令员。

在海南任职期间,他带领军区和各分区(师)的领导干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进行战役考察,如同当年在延安任陕甘宁边区考察团团长那样,周密细致,由此弄清了海南岛的军事、政治和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完全符合海南岛实际的巩固和保卫海南岛的作战及建设方案。

同年秋,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视察海南,对海南军区制定的这个作战方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庄田治军严格,对歪风邪气十分痛恨,一旦发现,即严厉申斥,不讲情面。

## 常胜将军庄田



他善于做政治工作,更擅长军事指挥,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高级将领。

他工作深入,作风扎实,办事讲求效率,在对个人要求上也十分严格。

他注重自身修养,严于律己,不计名利地位和生活待遇,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对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是海南人,一些亲友故里希望能找他这棵大树靠个背,他告诉这些亲友说:“我在共产党里做事,不同于旧社会为官作宰。你们不可依官恃势,不可给政府添麻烦。”

1961年,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分工抓部队训练和院校工作。在大军区领导岗位上继续兢兢业业为党努力工作。

由于党内“左”的倾向和错误的日渐扩大,1964年他突然被免去了大军区副司令员之职,转业到广东省任副省长。对于这一决定,作为一个征战了大半生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员,他相信党中央,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冤案终归会真相大白的。

对在地方当一个挂名副省长,他毫无怨言,一些老同志为他鸣不平,他却十分泰然,并做替他抱不平的同志的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所谓专案组立案审查,高级将领的生活待遇被取消了。

这时,身陷逆境的庄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他相信那些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叛徒”等罪名迟早会得到纠正的。

此后,他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打击迫害,被造反派监护审查,党的生活被停止了,一切政治权利被取消了,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老



共产党员的正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

庄田得知后,心情为之振奋。

此后,他于1972年和1974年分别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写信申诉自己遭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经过。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怀帮助下,他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政治名誉。

1975年他重新工作,被任命为广州军区顾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5年,戎马征战近60年的庄田被批准离休,享受大军区职务待遇。尽管离休了,但他仍在努力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革命历史回忆录《琼岛烽烟》、《逐鹿南疆》两本书。还带病参与组织编写反映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的《琼崖纵队史》,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2年4月25日,庄田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不幸逝世,终年86岁。

庄田逝世后,新华社为此发了专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的报纸先后刊载了他逝世的消息。

庄田将军虽然离去了,但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为祖国华南和西南解放及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领导人的光辉业绩。

# 文武奇才卢胜



1. 被迫走南洋，两次被逮捕，追求真理信念不改
2. 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使敌闻风丧胆
3. 虎落平阳，被困漳州城；深夜出逃，重建革命武装
4. 文武兼备，深受叶挺赏识；能征善战，受到陈毅称赞
5. 虎口夺路，日军目瞪口呆；郭村解围，陶勇、卢胜百里驰援
6. 击毙张灵甫，打死黄伯韬，活捉杜聿明，卢胜将军功不可没
7. 炮击英舰，把“米”字旗打得粉碎；飞渡长江，卢将军勇往直前



# 卢 胜

(1911— )

广东省乐会(今属琼海)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南红三团班长、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独立营营长,第四支队支队长、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团政治委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师一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师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军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1. 被迫走南洋,两次被逮捕,追求真理信念不改

说起儿时的悲惨遭遇,没有几个比得上卢胜。

在他的记忆中,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模样。

他从小与年迈的老祖母在家乡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县)九曲乡芳岭村相依为命。祖母曾告诉他:你的父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死了。1920年,当卢胜10岁时,他的祖母到处求告拜托,东拼西凑,想尽办法将他送进了私塾,但没过几天,由于贫困,就读不下去了。从此,祖孙二人走上了靠乞讨度日的漂泊生涯。

1926年,卢胜15岁时,贫病交加,又夺去了老祖母的生命。

从此,卢胜失去了所有亲人,生活更加困苦不堪。

此时,中国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席卷琼崖大地,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地成立农民协会,斗地主、分田地。在苦难中长大又是孤儿的卢胜在乡亲们的带领下积极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苦大仇深的他在革命的斗争中立场非常坚定,先是参加儿童团,不久就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正当人民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之际,蒋介石在1927年窃取了革命的领导权后不久,就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四一二”政变。

琼崖的国民党右派也步其后尘,一反“革命”面目,在琼崖发动了“四二二”反革命事变,解散各类工农组织,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9年3月,经卢胜的一位远房亲戚、华侨共产党员卢嘉桂介绍,在合星学校重新加入了新加坡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马泰等南洋地区活动非常活跃,与国内的联系也很多,卢胜重新参加了组织活动,心情非常激动,工作干劲也更足了。

由于合星学校支持并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事实上当时的合星学校已经成为马共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因而遭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仇视。

不久,学校被查封,卢胜和其他师生100余人被逮捕。他因无法交付罚款,先后被关押了七天。

出狱后不久,经人介绍,卢胜又到一艘外国海轮上当了一名海员。

在漂泊的海上生活中,他继续在海员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团结海员反对残酷压榨海员的包工制度,维护海员的基本权益。

1932年春,他被殖民当局以“共产党闹事”罪名第二次逮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后因殖民当局查无实据,便以“危害治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32年秋,在海外无法立足的卢胜辗转回到了故乡海南。此时的海南共产党组织都转入了地下,工农红军也遭受重大损失而转入隐蔽斗争。他几经周折但仍无法找到中共组织与红军。于是,卢胜不得不改往福建厦门。

在厦门,他按照归国前马共组织的指示,与厦门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接上了头,并被安排在厦门地下交通站大同咖啡馆和厦门菜馆里工作,卢胜利用掩护身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同年10月,他经杨全明(新加坡早期共产党员)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2. 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使敌闻风丧胆

1932年12月,为了发展闽南游击战争,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大量抽调机关工作的同志充实游击队。卢胜被派往闽南漳州游击区。

到了游击区后,卢胜被分配到了独立师红三团,成为一名工农红军战士,开始了真枪实弹的革命斗争。

1933年,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在“左”倾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红三团在反“围剿”作战中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卢胜随部队转入平和县山区坚持斗争。

由于国内抗日救亡斗争的形势不断发展,原“围剿”闽南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等部参与“福建事变”,使其与工农红军的关系有了根本的转变,由此造成了局部地区有利的革命形势。

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卢胜成长很快,在此期间,卢胜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与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地方组织农会,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做了大量工作。鉴于他出色的表现,不久他就被任命为连政治委员。

1934年4月,驻平和县的国民党保安部队纠合民团武装一千余人,进攻平和五南区游击区,卢胜奉命率部队对运动之敌进行袭扰,以迟滞其作战行动。

卢胜受领任务后,率领部队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设伏,待保安团大部通过后,他大喊一声:“打!”

敌人只顾朝前看,根本没有想到在后面突然冒出一股游击队,还没等反应过来,已倒地一片。

敌人急忙返回身还击,可是,又看不到红军的身影,气得一个



个大喊大叫。

等回身刚要走,身后又“噼里啪啦”一阵枪响,弄得敌人到处乱窜。

看到完成了任务,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卢胜并不恋战,率领部队很快撤出了战斗。

又过了几天,正当卢胜再次率队准备伏击保安团时,因消息泄露,反被保安团两路夹击。此次,团政治处主任李克带领另一支部队随卢胜一起行动,在突围中,政治处主任李克不幸牺牲,卢胜腰部也负了伤。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卢胜沉着冷静,忍着伤痛,坚持指挥部队与保安团浴血战斗,最终杀出一条血路突出了重围,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4年11月,国民党保安队对根据地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围剿”。卢胜积极主动要求担负最艰巨的任务。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闽粤边特委和红军部队指挥部决定围歼保安团,并作了严密布置。卢胜奉命率全连正面阻击敌人,主力部队从两侧实施迂回包围。

卢胜率领一个连的部队阻击上千人的敌人,压力可想而知,全连指战员团结一致,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斗前后持续9个小时之久,敌人硬是没有能够从我方阵地前前进一步。

针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卢胜没有让部队死打硬拼,而是采取了多种灵活机动的战术。除正面阻击敌人之外,在敌人进攻的间隙,卢胜还经常组织小股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做掩护,主动出击。在一次出击时,卢胜亲自带队,无意中摸到了敌人临时指挥所附近,一个冲锋,打散了敌人的指挥所,并击伤了保安团头目沈东海,



使得敌人很长时间失去指挥,难以组织新的进攻,为阻击争得了时间。

前方成功的阻击为红军游击队主力迂回包围赢得了时间,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以后,游击队发动了总攻,保安团全线败溃,主力大部被歼,游击队战果辉煌,缴获轻重机枪多挺和上百枝步枪及弹药等物资,改善了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1935年初,主力红军已被迫长征,北上抗日,各地都留有部分红军游击队坚持在原地与国民党军周旋,国民党趁机对我红军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妄图彻底扑灭革命的火种。闽赣边区游击队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敌后游击战的三年中,1935年初是最为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军为孤立红军游击队,切断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实施了大规模人为制造“无人区”的政策,将游击队活动范围周边的人民群众迁移,将小村并入大村。并经济上采取控制墟场,限定群众购买粮、油、盐以及其他日用品的数量,多购者以“通匪”论罪。严格封锁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的渠道。在军事上,则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全力“清剿”红军游击队,妄图将游击队彻底消灭。

在这样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卢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与战友们分析革命斗争的形势,让大家坚信困难是暂时的,胜利最终将属于劳苦大众。在他的带领下,全连指战员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

在连生存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根据游击队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积极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卢胜带领全连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军多处据点,并且经常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开辟一些新的游击区。



1935年夏秋间,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边区特委决定在云(霄)、(平)和、诏(安)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卢胜积极主动地争取到了这一光荣的任务。为了表明开辟新区的必胜信心,也为了在新区活动方便,他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卢家杨改成卢胜。

卢胜率领全连到达新区之初,老百姓误以为是土匪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反面宣传,使得老百姓不敢接近游击队,有的甚至躲上了山。

为了争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为开辟新区开好头,卢胜带领部队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经常以野菜和竹笋充饥,对老百姓的房屋与物品秋毫无犯,而且还代为看管,维护治安,真情终于使人民群众了解了真相,了解了红军游击队。

在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以后,游击队如鱼得水,放手开展开辟新区的工作。

在卢胜的领导下,红军游击队首先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反动地主,然后开仓济贫,建立农会组织。还在群众中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发动当地青年参加红军,使游击队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实现了特委部署的开辟新区的目标。

9月,随着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闽粤边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云和诏独立营,当前主要任务是继续开辟和巩固云和诏边区,卢胜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

由于卢胜先期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好,部队扩编进行得很顺利。原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都是有着多年游击战争经验的老红军,经过短期整训,独立营很快就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游击劲旅。

云和诏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工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云和诏独立营的建立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恐慌。

1936年初,国民党地方当局又纠集了四千多人的队伍专门对云和诏边区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一举歼灭我党这支新生的武装。由于卢胜的巧妙指挥,独立营多次粉碎了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的疯狂进攻,打击了敌人,保存了有生力量。

同年9月3日,卢胜率独立营一部化装潜入国民党占领区云霄县城,在红三团团团长何鸣的接应下,奇袭了县城钱庄,缴获现金1万余元,银元300余块,解决了部队的冬衣和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困难。

至此,卢胜领导下的云和诏地区,上接靖和浦,下连潮澄饶,与闽粤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开创了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 3. 虎落平阳,被困漳州城;深夜出逃,重建革命武装

1936年5月,面临日本加快侵华战争步伐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接着于8月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倡议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这些善意的主张并没有被一心想彻底消灭红军的蒋介石所接受。

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打开了新的局面。



器,因为你们的武器太旧了,以后准备发新的给你们……”

游击战士们肺都气炸了,眼睛迸出火星,队伍中传出了子弹上膛的响声和愤怒的斥责声:

“你们讲不讲信义?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抗日?”

“我们决不放下武器!”“你们这是汉奸行为!”

“打!拼了算了!”

可惜,猛虎已落入了陷阱!

近千名游击健儿还没有实现抗日杀敌的宿愿,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敌人逮捕了闽粤边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制造了震惊整个南方游击区的“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就在“漳浦事件”爆发的当天,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组织了20多名老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秘密商议,决定逃出去重建革命武装。

于当日深夜,卢胜带领50余名老游击战士乘国民党军看管松懈,越过了敌人的警戒线,泅过一道河,又跑回了山上。

在以后的几天里,近千人的队伍又跑出了将近一半。

上山后,卢胜将逃回的部队集合了起来,并与中共闽粤边有关负责人朱曼平、何港等会合,他们商量后,决定成立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以何港为书记,卢胜、林路、朱曼平、王胜等为委员。

同时重建闽南红三团(对外称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由卢胜任团长兼政治委员,王胜任参谋长。

10月,经卢胜等人的精心组织,新红三团已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卢胜率新红三团和闽西部分革命武装开始公开活动,积极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国民党漳州当局又恨又怕,再次出动重兵进攻新红三团,红三



团指战员义愤填膺，积极请战，都想狠狠教训一下国民党顽固派。

卢胜审时度势，认为教训一下来犯之国民党顽军非常必要，于是他们进行了周密筹划，以红三团为主力，协调各地我党掌握或受我党影响的武装，给来犯国民党顽军一部以狠狠的打击，歼灭国民党军 70 多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为被扣押的独立大队报了仇，极大地鼓舞了周边人民群众的上气，扩大了红三团的影响，人民群众积极要求参加红三团，很快这支武装又发展到了 300 余人。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卢胜奉命将闽南红三团正式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并就合作抗日重新发表了《为反对内战告全闽南各界同胞书》，此举在闽粤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关注闽粤边革命斗争，对“漳浦事件”更是十分重视。

毛泽东、张闻天多次电示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林伯渠、叶剑英、张云逸等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进行交涉，毛泽东又指示张云逸找粤军实力派余汉谋，要其迅速将闽粤红军游击队的人、枪如数归还，同时指示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必须吸取“何鸣事件”的教训，严防国民党暗算。

经多方交涉，国民党福建当局不得不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漳浦事件”中的被扣人员，归还闽粤边红军游击队 300 余枝步枪和机枪。

### 4. 文武兼备，深受叶挺赏识；能征善战，受到陈毅称赞

1937 年 12 月新四军军部成立，报中共中央同意及国民党当局



核准,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每个支队二个团,分别由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实施编组。

1938年2月,各支队分别进行改编集中。第二支队辖第三团、第四团,共1800余人。卢胜任第四团团长,叶道之任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任政治部主任。

3月,卢胜率第四团大部于福建龙岩誓师北上,于4月中旬到达安徽省岩寺,与新四军其他各部队胜利会师。

各部队在军部的统一安排下立即进行了整训。调整部队编制,健全各种组织,调配各级干部,制定落实各项正规化规章制度;充实武器装备,配发军需物资,加强临战训练,为随时投入作战作准备;各部队还在自己驻地周围广泛开展民运工作,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是个重大转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绝大部分指战员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但是,由于远离家乡、远离原来长期生活战斗的地方,环境不熟悉,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得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不稳定。卢胜等同志结合军部政治思想工作的统一部署,做了大量稳定部队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由于长期分散游击作战的特殊环境,南方各红军游击队没有正规的指挥机关,作战主要靠指挥员机断指挥,没有强有力的参谋机构和参谋工作,缺乏严格的集中统一的规章制度。

新四军组建后,在叶挺军长的倡导下,建立了职权一致的参谋工作系统,明确参谋处在指挥机关的重要地位,卢胜因为有作战经验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被选调到新四军参谋处任参谋工作。第四团团长由陶勇接任。在参谋处工作期间,卢胜积极参加编写各种军事训练教材,制定各项工作规章,工作卓有成效;6月下旬



又参与组织了新四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为新四军参谋处的早期建设作出了贡献。

7月,新四军召开第一次党代大会,卢胜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大”的代表。在这期间,他还抽出时间参加了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队的学习,系统学习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

10月,卢胜奉命重返第四团,改任第四团政治委员。从此以后,卢胜与陶勇并肩作战,率领第四团驰骋长江南北。

新四军军部遵循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在取得东进作战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为避免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一步摩擦,也为了向北发展,适时撤回了叶飞率领的东进作战部队,北渡长江,到达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开展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争。

为统一协调与指挥苏南的新四军部队,1939年11月7日,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在溧阳县水西村合并,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部辖第二、第四、新六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11月14日,江南指挥部派第四团团长沙陶勇、政治委员卢胜率团部及第二营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改称苏皖支队。1940年2月,与挺进纵队第三团合编,仍称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

卢胜带领部队进入仪征地区后,不断出击,打击日伪军。短短二个月的时间,共歼灭伪军二个连和一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此举引起日军震动,遂纠集日伪军800余人于1940年2月采用分进合击的方式重点进攻苏皖支队,妄图一举歼灭苏皖支队。苏皖支队在陶勇与卢胜的率领下利用月塘集有利地形,伏击了来犯之敌,日军伤亡30余人,伪军死伤60余人,沉重打



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国民党看到八路军、新四军的蓬勃发展,内心非常恐慌。

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共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国民党以正规军直接进攻西北、华北的八路军,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华中,国民党一面催促新四军长江以北部队南调,企图陷新四军于江南狭小地域加以聚歼;另一方面密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对活动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两侧的新四军部队实行东西进逼,企图消灭或驱赶新四军至江南,强占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开创的淮南抗日根据地。

卢胜和陶勇奉命率苏皖支队主力配合第四、第五支队对进攻驻合肥东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东南大桥一带的江北指挥部之敌。

3月7日,苏皖支队越过津浦路,于施家集将滁县顽保安团800余人消灭,并在管家坝击溃第十游击纵队一个营。

9日在王子城与第七团会合后,与八斗岭顽军第一三八师一部激战两昼夜,将其击溃。此次战斗共歼灭顽军2000余人,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官兵1000余人。为了争取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团结抗日,新四军乘胜收兵,提议和谈。

3月21日,国民党鲁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去路西作战之际,集中八个多团1万余人的兵力围攻半塔集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留守机关及主力2000



余人,形势十分危急。对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闻讯后,当即令半塔集所部固守待援;令挺进纵队主力西援;令江北第五支队和卢胜、陶勇率领苏皖支队东援。

半塔集位于天长、仪征、六合、米安、嘉山、盱眙诸县之间,是一个东西短、南北长的小镇,也是我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接到命令后,卢胜与陶勇率部队日夜兼程东返。守卫半塔集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3月28日,顽军见半塔久攻不下,反遭重大杀伤,新四军援军将至,为免遭覆没,于当晚仓皇后撤。苏皖支队在进至半塔西南20公里处的张山集后,对逃跑之敌实施了追击,在王店集、莲塘一线,与赶来掩护撤退的顽军保安第十旅激战,将其击溃,并跟踪追击,直追到三河南岸。此次半塔保卫战,苏皖支队配合挺进纵队和第五支队共歼灭顽军3000余人,受到了陈毅等领导的高度评价,也创造了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坚守待援的范例。

### 5. 虎口夺路,日军目瞪口呆;郭村解围,陶勇、卢胜百里驰援

1940年初夏的一天,卢胜和陶勇率领部队在苏皖边地区小胜敌人后,正在一座村庄边休整,突然听到急促的马蹄声“得得得”而来。陶勇和卢胜同时起身向村外迎去,他们预感到将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不其然,马蹄催征,大战将临。

陶勇从通信员手中接过急电。心头一紧。电文是挺进纵队叶飞发来的,上面八个大字赫然醒目:“郭村告危,挺纵待援。”



陶勇把电报递给了卢胜，卢胜也是一惊。

郭村是挺进纵队的驻地。当年苏皖支队和挺纵进入苏北扬(州)泰(州)地区时，陈毅即从江南到苏北来，亲自进泰州城与李明扬、李长江商谈。他从抗战大义出发，提出“团结抗战，互助互让，共同发展”的主张。

两李从自己私利出发，一来想借助新四军声威，抵制韩德勤的兼并政策；二来利用新四军在此一带的活动，替他们挡住日军，因此和新四军一直维持着“毗邻而居，相安无事”的局面。可是随着华中反共风云日紧，泰州两李在韩德勤的威逼利诱下，也磨刀霍霍，向新四军动手了。

“老陶，救人如救火，你认为？……”

看着深思中的陶勇，卢胜有些沉不住气了。

陶勇无语，警卫员摊开了地图。卢胜转身吩咐通信员把支队各级指挥员都召集过来，情况紧急，作战任务会随时下达。每当遇到重大情况，卢胜都是最大限度地配合陶勇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陶勇用手在地图上量了量，一估算离郭村相距整整 100 公里远。这期间，要跨越天(长)扬(州)公路，渡过邵伯湖，通过仙女庙和高邮日伪的重点封锁线，还要通过已由中立倒向反共的两李防区。障碍重重，只要一处受阻，就难以迅速到达郭村。

陶勇起身简单与卢胜交换了一下意见，见各级指挥员都到齐了，转身对大家说道：“同志们，想必大家已经听到了，挺纵在郭村受敌围困，形势危急，其他部队还在长江封锁线以南，即使渡江北上增援，一时也赶不上。只有我们苏皖支队能够驰援。此地离郭村有 200 里路，路途远，沿途敌情复杂，但是，解救兄弟部队于危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和政委商量决定，立即驰援郭村，



部队轻装,准备出发。”

此时,陈毅又从江南发来急电:“苏北韩、李等部,集结十倍于我兵力,企图全歼挺纵于郭村地区,着令苏皖支队火速驰援!”

敌情和我情更为清楚了:十几个团的敌军把我一个团紧紧围困在郭村,万分危急!

陶勇和卢胜对视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两人同时飞身上马,断然下达命令:“立刻出发!派人通知外出分散活动的二营,火速赶上。新建的部队边走边整编!”

根据事先的商定,陶勇率领侦察分队先行一步,侦察前进,卢胜率领主力随后跟进。

夜深人静,身着便装的陶勇率侦察分队飞速前进。他们钻树林,跨沟坎,躲过敌人探照灯,摸黑直闯天扬公路,来到邵伯湖前。

湖水波光涟涟,日军巡逻艇来往穿梭,控制湖面。陶勇等人埋伏在湖边的芦苇中。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对渔船控制很严,入夜就集中到据点去了。

陶勇命令侦察排所有人员分散行动,动员渔民想办法,趁白天打渔时偷出船隐蔽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当卢胜于第二天天黑时分到达湖畔时,数十条小船已隐蔽在芦苇丛中等候。下半夜,敌人放松了警惕,卢胜指挥大部队躲过日军汽艇巡逻,悄然渡河。

部队全部渡河后已是黎明时分,当部队集结继续前进一段路程后,天已破晓,前方就是日军重点封锁的仙女庙到高邮的公路,公路上筑有敌人的碉堡,敌人巡逻队和车辆随时可来。怎么安全通过这道封锁线?

时间就是胜利,挺纵在等待,兄弟部队战士们在流血,拖延不得,可是怎么办呢?



卢胜和陶勇在冥思苦想,支队干部们也纷纷献计。有的提议:等到晚上再走,安全些。有的认为:等待的时间更容易出现麻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

陶勇一边倾听,一边思谋,权衡着行动的利弊。

忽然,卢胜沉稳的声音传入陶勇的耳中:“出其不意,大胆地冲过去!”

这与陶勇跃跃欲试的想法不谋而合。

陶勇一抬头,目光与卢胜又一次交会,二人心照不宣,他们的考虑是一致的。日军是了解我军多在夜间伏击、偷袭的战术的,何不利用敌人这一心理特点,趁他白天麻痹大意,不加防备之机,出其不意,就在大白天闯过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卢胜进一步把自己的决心告诉了大家,大家都被他的豪情感动了,一致赞同卢胜的意见。陶勇又低声作了布置。紧接着,一场罕见的“虎口夺路”行动开始了。

陶勇在前,卢胜断后,率领着苏皖支队,以锐不可当之势,跃上公路。他们子弹上膛,脚步如飞,在日军封锁的公路上奔进,奔进。

突然,前边出现了一队大摇大摆的日军巡逻队,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在晨光中闪耀着恐怖的阴影。

发生了什么事?一队身穿灰衣的队伍竟然大摇大摆地冲了过来,这怎么可能,莫非是这一阶段被新四军搅得不得安宁产生错觉了?

队伍越走越近,日本鬼子终于醒过神来了,这是真的,新四军不要命了,日本巡逻兵赶紧散开,手上的枪随即响了起来。

“打!”奉命阻击的三营和敌人交上了火。

听到枪声,支队官兵纷纷停了下来,子弹上膛准备战斗。



陶勇和卢胜一前一后,赶紧制止:“不行,赶路要紧!冲过去就是胜利。”

陶勇对跑步过来报告情况的三营长命令道:“你带一个排纠缠住敌人,掩护大部队通过!”

三营长领命如飞而去。

日军不明情况,稀里糊涂地和三营长带领的一个排耗上了。他们瞪着恼怒的眼珠,恨不能置三营小分队于死地而后快。

战火硝烟在公路上弥漫,时间在枪声中悄然流逝。

全支队大步流星,冒着枪林弹雨,在公路上疾跑而去,在拐弯处又向东飞奔。

三营长眼看大部队已安全通过封锁线,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组织部队边打边撤,甩开敌人;敌人是穷追不舍,弹如雨下。走在队伍最后掩护战友的三营长中弹倒下了。

“营长!营长!”担任阻击的一排战士痛声大叫。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压下敌人,抱起生命垂危的三营长,含泪追赶大部队。

三营长的牺牲,传到陶勇、卢胜的耳朵里时,苏皖支队已到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李长江的防区。陶勇和卢胜是心如刀割,这笔血债是国民党顽固派带来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笔账要算在李长江身上。

最后这道封锁线通过得十分顺利。虽然是二李的防区,但驻守者是二李收编的一些会道门头子的武装,战斗力不强,同二李的关系也不深。本来就不愿意与我军作对,经过我军的说服工作,愿意放行,只是虚张声势地朝天放枪,以对付李长江事后的查问。

苏皖支队一路奔进,终于在战斗打响前赶到了离郭村西南五六公里的杨家桥一带,陶勇命令部队原地待命,立即和卢胜潜进了



郭村。

“叶司令员，我们报到来了！”陶勇没进门，洪亮的声音先送了进去，屋里挺纵的干部们都跑了出来。

“老陶、老卢，你们真是飞毛腿呀，这么快就到了！”叶飞惊喜地迎上去，握住二人的双手。

“这下，可给我们解围了。”挺纵政委吉洛（姬鹏飞）一把拉住卢胜的手，含笑地说道。

“有什么战斗任务快分配吧！”卢胜和陶勇边握手边求战，二双大眼睛热切地注视着叶、吉二人。

“好嘛，你们比我还急！”

叶飞和吉洛相视一笑，干干脆脆地说：“那好，顾不上让你们休息了，咱们来研究一下敌情。”

不大一会儿工夫，陶勇和卢胜从叶飞那激动而明快的讲述中，了解到发生在郭村事件上的详情：

挺纵在大桥战胜日军之后，借驻两李防区郭村休整，很受郭村百姓敬爱。然而，李长江受韩德勤唆使企图用武力赶走挺纵，公然叫嚣要向挺纵“收复失地”。多日来，李明扬退居幕后观风向，李长江则赤膊上阵，调整部署，不断向郭村附近的挺纵防地推进，责令挺纵“受其指挥”，妄想吞并挺纵。便衣特务也四下活动，散布谣言，张贴反动标语，绑架百姓，杀害抗日人员。目前，挺纵已派出干部，携带陈毅呼吁团结抗战的电报，前往泰州同李长江谈判，说服他不要做反共先锋，不要干叛国反人民的勾当。可李长江毫无悔改之意，仍在积极调兵遣将。

“你们看，”叶飞指着地图对凝思倾听的卢胜和陶勇说，“郭村东南西，是李的主攻方向，派遣的是最反动的陈中柱、陈才福两个



纵队；郭村西南一线，是颜秀五和丁聚堂两个纵队，妄图分割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新四军的联系，并从侧翼威胁和进犯郭村；郭村北面是韩德勤派兵协助攻打的张星炳的保三旅。这么一来，顽军汇集了共十三个团的兵力，四面包围了郭村，摆出了打的架式。”

战斗一触即发！陶勇迫切感到局面的严重性，恳切要求道：

“老叶，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苏皖支队吧！”

“这怎么行？”叶飞说，“你们昼夜奔袭 200 里，太劳累了。”

他略一沉思，说，“这样吧，挺纵先守住郭村，你们守在麻村和杨家桥一带，等候江南十六旅三个团过江。”

“好吧。”陶勇欣然同意。但他估计到：不等江南部队赶到，穷凶极恶的李长江就会发动进攻，到时苏皖支队再挺进郭村不迟。眼下，客随主便，听从指挥。

“叮铃铃……”卢胜和陶勇返回驻地刚作好战斗布置，电话就响了起来。

“老陶，李长江在泰州城扣押了我派出的谈判代表。李顽两陈已从东南一线向我进攻了！”话筒中传来了叶飞急促的声音。

“什么？要不要我带兵进郭村？”陶勇焦急地问。

“再等等，我们还能顶住。”叶飞回答。

这边，陶勇、卢胜和参谋长张震东在指挥所中商量敌情，准备还击。

忽然，铃声又响，是二营营长朱传宝打来的电话：“颜秀五的三个支队从西南方向打过来了。”

“坚决阻击！不许放过一个敌人！”陶勇命令一下，举起望远镜纵观战场。

杨家桥阵地上，战火纷飞。二营战士面对猛扑而来的顽军，英



勇作战。整整一天,战斗持续着,接到二营一次次痛打顽军,予以重大杀伤的捷报,卢胜和陶勇面露喜色,狡猾的颜秀五被打得丢盔御甲,收兵缩回麻村。

黄昏时分,叶飞找到卢胜和陶勇,说:“挺纵南北受敌,打得很苦。是否苏皖支队也进郭村,兵力集中,把拳头攥紧了打!”

二人正等着叶飞这句话,立即答道:“没问题!”

干干脆脆三个字,就把他们愿与战友同甘共苦的决心表达了。

当晚,陶勇和卢胜率领苏皖支队开进郭村,接受了北面一线的防务。

星空皓月,夜风猎猎。苏皖支队进郭村后连夜加修工事。陶勇和卢胜伏案策划,制定翌日迎战方案。

午夜时分,郭村老乡送来了夜宵,什么荞麦饼、红烧肉、大米饭、煮鸡蛋。战士们深受感动,干劲更足了。

陶勇和卢胜在制定完作战计划并给各营分配完任务后,也来到了阵地,与战士们并肩战斗,加固工事。

翌日拂晓,南边敌人的枪声响了。陈中柱、陈才福气势汹汹,猛攻挺纵阵地。而北面的张星炳却不顾李长江的三令五申,按兵不动。

苏皖支队埋伏在阵地上,严阵以待,却不见张星炳部进攻,不免心中发急。

卢胜、陶勇来到阵前,静观眼前战场,只见远处顽军阵地上,几个敌军官偷偷摸摸地东张西望。

二人一眼看出,这是张星炳想趁火打劫,待南面突破后再从北面抢上来拣便宜。

哼!这种保存实力,貌合神离的打法,我们太熟悉了。卢胜、



陶勇不禁发出轻蔑的冷笑。

“注意前面的庄稼地。张星炳这小子滑头，等会儿来进攻时，一定要等他靠近了再打！”果然不出所料，张星炳见南面二陈一直打不出什么名堂，劲头上来了，幻想着自己有所突破可以抢个头功，于是命令部下从北面攻了上来。

他们利用庄稼地作掩护，沿着田埂、小路，以密集的队形冲上来。

“乖乖，来头不小啊！”一个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干部说。

陶勇乐呵呵地说：“看我面前这片开阔地，来多少敌人也不够喂我的机关枪。放心，敌人来了，我摔跤也把他摔出去！”

陶勇异常沉着，放敌人离阵地很近时，才大吼一声：“打！”

战士们将成串的手榴弹扔了过去，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打得痛快淋漓。顽军抛下一片片尸体，哭爹喊娘，连滚带爬往回窜。

“出击！”陶勇趁对方阵脚混乱，果断下令出击。官兵们跃出工事，杀声连天。俘获不少敌人，又迅速撤回阵地，准备再战。

顽军依仗人多，重整旗鼓，又冲了上来。陶勇统观全局，令参谋长张震东亲率部队还击。

从拂晓打到深夜，陶勇与张震东指挥部队，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自己阵地稳如磐石，屹立不动。

卢胜在指挥所里掌握全局，组织各项战斗保障工作，前线报告：“打退敌人第三次进攻了。”

战事仍在继续，整整两天两夜了。顽军人多势众，打下一批，还有一批，轮流可以休息，而我们的部队则整日在坚守阵地，动都不能动一步。

卢胜在协助陶勇组织指挥战斗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障指



战员能利用战斗间隔组织战场鼓动以及各项保障工作。在战斗不是很紧张的时候,亲自组织非战斗人员上阵替换一线战斗人员休息一下,喘口气,以利再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郭村保卫战进入到第三天,战斗愈加激烈。顽军继续从南北两面猛烈攻击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一南一北,顽强作战。

陶勇一边沉着地指挥北线作战,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一边审时度势,寻机再给敌人狠狠一拳。他从支队三个营中各抽出一个连待命,准备用在关节点上。

时机到了。当敌人再一次冲了上来,陶勇命令轻重火力一齐开火,压下了敌人,就在敌人攻势减弱,向后撤退时。陶勇一声号令:“出击!”

顿时,三个连队犹如猛虎下山,跃出工事,在褐色烟雾的掩护下,向敌后背扫射。

回窜的顽军纷纷栽倒在溅满血迹的玉米秆、豆子藤上……敌人死伤惨重。这下张星炳被打痛了。

突然,远处腾起漫天大火,在渐渐降临的夜幕中延伸着火红的光焰。原来张星炳在苏皖支队的突然反击下,阵脚稳不住了,吓得放火后撤。

卢胜、陶勇朗声大笑,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苏皖支队以锐不可当之势迎火而战,一下又把张星炳的保三旅全部冲垮。顽军一退数里,全线崩溃。

当陶勇看到活捉了100多个俘虏的出击部队凯旋时,高声赞道:“好样的!”

“老陶,你猜三天战果如何?”

卢胜满脸兴奋地迎了上来。陶勇含笑无语,等着卢胜下文。



光已照耀着郭村。

一会儿,卢胜赶到了支队指挥所,手里还提着一瓶酒,一进门就冲着陶勇说:“来,让我们大家庆祝一下。今天是7月1日,一来庆祝党的生日,再者也是欢迎王澄、陈玉生归队!”

陶勇兴奋地擂了卢胜一拳,高兴地说道:“知我者,卢胜也!”

就在苏皖支队在举杯庆祝时,李长江气急败坏地亲自由泰州赶到郭村督战,以挽回败局。他大骂张星炳、颜秀五无能,迟缓不前;又限令陈中柱、陈才福不惜血本再攻郭村。

第五天拂晓,隆隆炮声弥漫着郭村上空。骄纵专横的李长江带着一批高级军官在后边亲自督战,集中了所有的大炮和轻重机枪,孤注一掷地展开了猛攻。

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前沿指挥所里,陶勇和卢胜在组织部队反击。

部队战斗得很苦,伤亡也比较大。卢胜的心里沉甸甸的。李长江整团整营的轮番冲击,溃退后又在督战队的拦阻下一窝蜂拥了上来。连续的冲击和反冲击。敌人几度逼近阵地前沿,有些地段已有敌人突了进来,险象环生。

陶勇离开地图对卢胜说:“老卢,我去前面看一看,不组织几次反冲击,阵地有危险。”

正说着,二营营长朱传宝跑了进来,说道:“司令、政委,我把王澄部队接来了。”

“好,我们的生力军到了!”卢胜和陶勇喜形于色,齐声说:“咱们去看看!”

王澄带来四大队和机枪连,共有8挺重机枪、20多挺轻机枪,弹药充足,士气旺盛。一见陶勇来到,王澄当即请战,不肯休息。



队随后就地整训一周,进行政治动员,提出了“团结抗战、击敌反顽”的战斗口号,指战士斗志昂扬,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倍增。

### 6. 击毙张灵甫,打死黄伯韬,活捉杜聿明, 卢胜将军功不可没

1946年5月,为对付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也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新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在江苏如皋县宣告成立,卢胜担任政治委员,旅长张震东。

7月,卢胜与张震东率部参加了苏中战役,指挥部队自海安北上,先后攻克了吴庄、大孙庄、蒋家庄、高家荡等地,歼灭国民党军六百余人。此后转兵鲁南,参加鲁南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3700余人,活捉中将师长周额英的战绩。不久又指挥部队参加了枣庄战役。

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第一旅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卢胜任师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部队改编一完成,全师就投入了莱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300余人。

5月,卢胜率全师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在围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战斗中,卢胜亲临第一线指挥。当第七十四师退缩至孟良崮后,他亲自带领二个营向敌人最后负隅顽抗的堡垒六〇〇高地强攻,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该高地,全歼敌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



6月,为挽回颓势,国民党军发起“鲁中第三期会战”。卢胜为掩护主力摆脱国民党军七个整编师的合围,承担了艰巨的断后任务。

在他的指挥下,全师苦战六天六夜,冒着国民党军空炮火力的猛烈袭击,先后击退了其多次疯狂进攻,进行了大小战斗十八次,争取了时间,使主力部队安全地越过津浦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十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西进的任务,部队也出现了重大伤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师由原来的4000余人下降到1600余人。

卢胜及其十师指战员,勇挑重担、顾全大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受到各级党委的充分肯定与表彰,华东军区党委专门发来贺电,向全师指战员致以慰问。部队经过短暂的补充与整训后,不久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诸城攻坚战和潍坊阻援作战都有卢胜率领的第十师的身影,并均获大胜。

1948年5月,卢胜和全师营以上干部及部分战士代表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此后,他率师参加了开封、睢杞战役以及济南战役。

在睢杞战役中,他指挥全师逼近睢县西北龙王店,协同友邻全歼守军,并俘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及第六旅少将参谋长等国民党将级军官多名。

济南战役后,卢胜调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与老战友陶勇共同指挥第四纵队,继续南征北战。

淮海大战开始后,他协助陶勇司令员指挥并加强到所属部队指挥,在与友邻纵队的共同努力下,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击毙国民党兵团司令黄伯韬,并使该兵团全军覆没。



1949年1月,他与第四纵队等部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最终全歼了该集团,并活捉了杜聿明。

### 7. 炮击英舰,把“米”字旗打得粉碎;飞渡长江,卢将军勇往直前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序列,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卢胜任政治委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即考虑进军江南的问题,我各路大军陆续集结江边,进行紧张的准备工

作。长江素来以“天堑”著称,是我人民解放军南进的一大天然障碍。

国民党反动派,以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指挥的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上海至江西省湖口的地段上,其重点放在南京至上海段,直接担任江防的有54个师,并在长江下游集结舰艇89艘,在上海、南京等地配置飞机250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的“立体防线”,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针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一面通过谈判揭露敌人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渡江作战准备,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之湖口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实施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突破敌人长江防线。

站在江边,极目远眺,江风阵阵,波涛滚滚,卢胜和陶勇心情都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很不平静,想当年,抗战之初,他们第一次过江,从江南到江北,是给李明扬、李长江送子弹的,那时他们的部队还不足500人!而今天,他们率领的部队已发展到拥有3万多人马的一支正规军了。

“从1939年到1949年,从我们第一次过江到现在已整整10年了。在这10年当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卢胜感慨地说。

“是啊,是啊,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不过我们这次作战担子很重,任务也很艰巨。”陶勇分析说,“这次渡江作战与我们过去进行的战役、战斗不同。在军事上,必须以木帆船做横渡工具,去对付敌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立体防御。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新课题。”

“而且时间很紧。”卢胜接着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解决几百艘船只,要找来大批熟悉长江潮汛规律的船工,还要训练战士们游泳、划船、水上射击技能等等,任务确实非常艰巨!”

陶勇突然大笑起来:“有啃头,这个硬骨头有啃头!”

“那当然!”卢胜也笑着说。

在陶勇抓部队训练时,卢胜把各项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在船工中进行诉苦教育,军民共表决心,开展立功运动,大大增强了军民完成渡江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政权就要垮台了,它的后台主子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就在我大军即将渡江之际,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伴侣号”军舰,在长江上耀武扬威,来回游弋。对于这些军舰,国民党反动派是寄予希望的,它巴不得美英帝国主义插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蒋介石就是这样给他的部下打气的。而我军有些战士,因为第一次见到这些在水上飘飘摇摇像小城市一样的庞然大物,心里也没有底。

# “留苏学子”唐铎



1. 留法勤工俭学，同陈毅、蔡和森、李立三等一道被法国遣送回国
2. 走上航空路，亲眼目睹宋庆龄登上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
3. 苏军服役 28 年，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宴请
4. 面见刘亚楼，唐铎报效祖国的愿望得以现实
5. 中苏关系恶化，唐铎被打成“苏修特务”，关押七年之久



## 唐 铎

(1904—1983 年)

原名唐灵运,字金城。湖南省益阳县人。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反动派驱逐出境。回国后投入大革命洪流,被录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1925年赴苏联入苏联空军第二、三飞行学校、空中战斗学校、飞行观察学校学习飞行和通信技术,毕业于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学位,任苏军少校、中校教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等多枚。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回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任中共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辽宁大学副校长,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勤工俭学的学子们的就业情况变得十分困难。1921年1月,原主管勤工俭学活动的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将断绝与学生们的经济关系,中国驻法国公使也扬言要遣返勤工俭学人员。

为抗议这一不公正的行为,2月底,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中国驻法公使馆门前进行示威游行,唐铎当时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

后来,因法国政府拒绝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曾掀起了进占中法大学的斗争,唐铎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这次充满激情的斗争中,他不幸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一起遭到法国警察的逮捕,并被强行遣送回国。

回国后,唐铎一行人处于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境地。但是,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立即组织了“被迫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斗争。

他们还推举了陈毅为代表,利用开记者招待会、接洽报馆、拜访社会名流、发出通电等种种方式,揭露中法政府迫害他们的罪行,要求各界人士主持公理,募集捐款,联系进学校学习等等。

经过一段活动之后,终于解决了临时生活费用问题,并找到了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接纳他们继续学习。其中中国公学甚至允许他们免费入学。

于是,唐铎便在1922年春进入了中国公学的商科学习。过了三四个月,他又想转到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去学习。

这是一所由中法两国合办的中等专业学校,招收中国青年,使用法语讲课,又有工科,很适合唐铎他们的情况。可是细一打听,这所学校要收学费,这样一来,又把唐铎和一些想转学的同学们难住了。为了筹措学费,唐铎想到了上海的湖南同乡聂云台、谭延闿等人,这二人在上海有钱有势,何不向他们借助一臂之力呢?



当找到这两位同乡后,唐铎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聂云台和谭延闿二人表示愿意给他们提供资助继续学习。

于是,他们得以进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半年之后,1923年春,临开学前夕,他们又去找谭延闿时,谭延闿已经南下广州去了。断了学费来源,他们不仅无法入学,而且连维持生活都成了问题。

唐铎又一次处于困境之中,怎么办?

想来想去,唐铎决定直奔广州。

## 2. 走上航空路,亲眼目睹宋庆龄登上中国 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

广州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本营,要革命,就要到广州去,这是唐铎当时的基本思想。同时,也因为谭延闿已经先行去了广州。找到他,他一定会接济他们这些穷学生。

到了广州,从同乡口中得知,谭延闿已确实来到广州。唐铎就径直找到了谭的住所,见到了谭本人,说明了来意,谭允诺可以介绍他到湘军中去当一名军官。

但唐铎已打定主意,想要学习飞行,当一名空军驾驶员。

谭延闿知道唐铎这一想法后,也没有勉强他,而是写了一封信,要他带上信去找大元帅府航空局长杨仙逸先生。

这样,唐铎就没有再提要钱上学的事,随即告辞,直奔大沙头去拜访杨仙逸先生。

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就设在广州市东郊的大沙头。

唐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杨仙逸局长的办公室里,他呈上谭延闿的信函,并说明了来意。杨先生耐心听完之后,表示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很高兴,并鼓励他说:“你从上海奔来广州,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是有志气的中国青年。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

他又对唐铎说:“现时的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实际上是个维修所。要学习飞行,可以先到这个厂当实习生。不久,我们将要开办一所飞行学校,那时你可以再入学校去学习飞行。”

那个时候,唐铎总是幻想着驾驶飞机,遨游在祖国的蓝天上,保卫祖国的领空,或是驾驶飞机直接去轰炸陈炯明之流的军阀部队,为革命事业建功立业。他的理想就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个人哪怕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唐铎的决心已定,便向杨局长表示:“我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

杨先生听后,欣慰地拍着唐铎的肩头,爽朗地笑了,他对这位矢志不移的年轻后生的选择充满了希望。

从此,杨仙逸先生把唐铎引上了从事航空事业的道路,实现了他青年时代最向往的理想。多年之后,回想往事,唐铎内心里一直充满了对杨先生的敬意和感激。

唐铎进入飞机制造厂以后,听到许多关于杨先生的动人事迹。

杨仙逸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也是广东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人。青年时代曾就读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由于热心于航空救国事业,曾专门研究水陆飞行技术,在一次国际飞行考试中,获得了万国水陆飞机执照。

从国外学成归来后,杨先生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创建了革命空军,组建了一个航空飞行队。

为了表示追慕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志向,杨先生把孙逸仙(中山)的名字倒过来作为自己的名字,取名杨仙逸。他曾



率领数十名青年，到美国纽约航空专科学校学习飞行，还向华侨募捐筹款购买了12架飞机的设备带回广州。

杨先生的这种执著的革命情怀，深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和所有朋友的尊敬。

唐铎亲眼看到杨先生在大沙头和飞行人员合作共事，勤勤恳恳，刻苦钻研，用在外国购买的设备和部件，自行装配了一架飞机。

那架飞机装配好后，决定在大沙头飞机场试飞，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也亲自参加了试飞仪式。飞机制造厂的全体职工停止工作，大家热情洋溢地前往参观试飞。

试飞之前，大家围着那架飞机看了又看，高兴得不得了。

将要试飞的飞机上有两个座位，除了飞行员外，还可以再乘坐一人。试飞前，孙先生大声问道：“在场的诸君，谁愿登机试飞？”

全场肃静，无人应声。孙先生环视众人一周，微笑着，等待着。

突然，站在他身旁的年轻美貌的宋庆龄女士出人意料地向前走了几步，对孙先生说：“我愿意试飞。”

听她这么说，许多人急忙走上前来拦阻，说：“这是我国自己组装的第一架飞机，各种性能都不清楚，危险性很大，夫人还是别上去了。”

宋庆龄却微微一笑，说：“为了革命早日成功，我在所不辞。”

她回头看了看孙中山，孙先生凝视宋女士片刻，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去，给她戴上飞行帽和眼镜，宋庆龄从容地跨上飞机，端坐在座舱中。

一会儿，飞机飞上广州的晴空，在蓝天上盘旋了几圈，做完飞行表演后，安全降落到了跑道上。

大家顿时欢呼雀跃，为了表示对宋庆龄女士勇敢行为的敬佩，



大家提议用她在美国读书时用过的英文名字“乐士文”来命名那架飞机,孙中山先生高兴地表示同意。宋庆龄女士的勇敢行为给唐铎以很大的鼓舞,这一幕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伴随着他在自己的飞行生涯中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正如杨先生所说,飞机制造厂招牌很大,实际上是个维修所。厂内只有杨先生通过朋友从美国买来的十几架水上飞机,其中有几架是教练机,有一架可乘五六个人,还有一架可乘十几个人。

这些飞机降落在大沙头附近的水面上或大沙头的机场里,这些先进的飞机曾引来许多人的参观和赞叹,许多人都为中国革命能有这些飞机而感到宽慰和自豪。

飞机制造厂大约有 200 多人,其中有两名美国工程师,还有几位是德国和俄国的技术人员,另有十几名朝鲜人。

这座制造厂的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从人员组成来看,却是一个标准的国际性单位。美国的两名工程师具有很强的实干精神,他们教授大家飞机发动机原理和修理维护飞机的技术,并且亲自动手操作,非常热心地教大家学习技术。

在制造厂的所有飞机中,有两架是美国杰尔底斯工厂生产的,每架的功率是 45 马力,时速为 90 公里,这两架宝贝飞机当时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另外十几名朝鲜人,大都是青年学徒工。他们特别肯干,非常能吃苦耐劳。其中朴泰下和金震一两位青年,经常和唐铎一起干活,他们在共同的工作中逐渐熟悉,相互了解并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1924 年 1 月下旬,国民党“一大”开会期间,制造厂的职工,这些热血青年曾两次列队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庆祝大会



召开。但是在第二次参加大会之后,当他们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兴致勃勃地回到大沙头飞机制造厂时,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工厂最大的厂房和旁边搭起的一个大棚子已经变成一片灰烬。后来根据调查才得知,原来在他们游行时,愤怒的陈炯明派来特务侦探放火烧毁了制造厂的设施以泄私恨。

本来,制造厂的厂房和设备就极为简陋,全厂仅有的一座红砖砌成的二层楼房,作为办公室使用。那个大厂房和旁边的大棚子,既是职工们工作的车间,同时也是他们休息的宿舍。里面放着制造厂仅有的几台车床和其他机械设备,此外,就是职工的被褥衣物等等。这一场大火将一切付之一炬,职工赖以工作和生活的根据地没有了,连搪瓷盆也被烧得只剩下铁片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厂领导从大沙头附近的水上人家那儿租来了几只大船,权作职工的临时宿舍。他们在船上居住期间,曾经为列宁逝世举行过一次隆重的追悼会。

唐铎等四五十名青年,面对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列宁肖像,默哀致敬。他们自己并没有写悼词之类的东西,只是宣读了国民党“一大”发出的唁电,他们还宣读了孙中山署名的悼念列宁的祭文,祭文很有文采,宣读时又是用的诵读古诗词的腔调,所以,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其中有几句写道: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唯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

这些话语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唐铎多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而且对他的思想影响非常之大,更加坚定了他关于中国必须走十月



革命道路的认识,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方向。

1924年夏天,广州商团以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为头子,组织武装队伍,准备推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另立商人政府,当时甚至鼓吹说陈廉伯要当中国的华盛顿。

过了一段时间,商团竟从国外购进了大批军火运进广州,还同佛山地主勾结,散发传单,煽动反对国共合作的反革命情绪。

反革命商团的势力越闹越大,竟然还选了个军阀李福林当“市长”,另立政府,与广州革命政府对抗。

与此同时,对于革命志士,他们残酷地杀害。当时他们把捕去的革命人士的头割下来,碎尸数段,或丢进水里,或沿街示众。

而恰在当时,孙中山先生又离开广州去韶关指挥北伐进军,广州更是群龙无首。

在这种情况下,飞机制造厂的人们非常焦急和担心,很怕商团武装冲到大沙头来,抢夺或毁坏飞机。于是大家便自动组织起来,分作两三个人一班,日夜轮流站岗放哨,防止自己的革命武器落到军阀的手中。

这样紧张的日子过了十多天,突然,孙中山先生指挥的北伐军向叛乱的反革命商团武装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经过半天激战,北伐军就把商团军队全部粉碎。

这次镇压商团叛乱,依靠的主要力量是黄埔的学生军,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在战火中得到了锻炼并经受住了考验。

飞机制造厂的职工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只是实行戒严,搜查坏人,但他们成功地保卫了大沙头的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

镇压商团叛乱之后,唐铎离开了飞机制造厂,被派到航空局所属的飞机学校学习飞行。

## “留苏学子”唐铎



1924年9月,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即广州革命政府,决定成立一所军事飞行学校。这所新学校的校址,当时就选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附近。学校规模很小,兴办时间又短,所以只招收了两期学员。随着大革命失败,这所新兴的飞行学校也因之寿终正寝,因而,外人很少知道还曾存在过这样一所学校。

但是,正是这所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期间开创的中国航空事业的最初摇篮。

进入这所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共有十人。他们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刘云、冯旬、王勋(即王叔铭)、王翱、万鹏、袁政、郭子如,还有从飞机制造厂选派来的三名实习生,唐铎便是其中之一,另有两名是朝鲜族同学,是唐铎的同窗好友朴泰下和金震一。当时学校的校长是德国人,叫雅尔台,还有两名德国教官,一位叫风格列姆,一位叫瓦尔特。他们是孙中山先生聘请来的,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很热心地对学员进行训练和指导。

雅尔台校长亲自教授领航、侦察、战术,每天早晨他还亲自带领学员做操跑步,并经常强调说,飞行员必须有好的身体,而好的身体则是靠锻炼得来的。两名德国教官则专门负责教学员们飞行技术。

这十名学员,在飞行学校里共同学习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在校期间他们接受了正规的航空飞行训练,通过仅有的两架教练机,学会了单独驾机飞行。同时,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也经历了东征陈炯明,平定刘杨叛乱,沙基惨案以及廖仲恺遇刺等重大事件。唐铎在此期间,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加强了革命的本领,而且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唐铎的脑海里开始逐渐由抽象的概念变成为感性的具体形象了。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同期学员刘云给唐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唐铎以巨大的影响。刘云是唐铎的湖南同乡,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曾任学员队长。据说,他很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但后来又竟是蒋介石直接下令将他杀害。

在校期间,刘云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共产党员。他不仅同唐铎一样当学员,同时,还担任飞机学校的党代表。当时在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中,有国民党的党代表、军事首长和苏联顾问三人并列,共同决定重大事情。但这种党代表多数由中共党员担任,专门在部队中做政治思想和宣传工作。刘云是一位政治上旗帜鲜明的人,他虽然只比唐铎大三四岁,但显得非常老练、成熟。他很关心同学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当时,刘云与共产党员郭子如和万鹏是一个党小组的成员。他们开会学习,时常叫唐铎参加,以对他加强教育,使他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通过参加中共党小组组织的学习活动,通过平时谈心,唐铎明白了这样两点道理:第一,要革命就必须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党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动员并带动广大群众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第二,必须依靠与联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求得他们的帮助,以便准备武装力量,同反动军阀及列强势力进行战斗。无论是学飞行技术,还是搞空军建设,都是革命的需要,都是在为革命做准备工作。

刘云既有丰富的航空理论和实践知识,又具有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献身的强烈愿望。他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法尔曼飞机工厂附设的飞行学校学习飞行。

那家工厂制造的法尔曼式飞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当时一种非常先进的军用飞机。



会后游行时,刘云带领着唐铎和王翱等十来名飞行学校的学员,高举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横幅,走在军人队伍的最前面。在游行过程中,唐铎看见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蒋先云、王一飞、陈赓等在前面指挥和引导队伍前进,并带领队伍高呼革命口号,革命气势十分强大。游行队伍中,旌旗相望,锣鼓齐喧,场面壮观宏伟,令人精神振奋。

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十八甫南路,路过沙基的时候,却遭到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军警的屠杀,从而造成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通过这件事,唐铎更加坚定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的信心。

### 3. 苏军服役 28 年,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宴请

1925 年秋天,唐铎等人从军事飞机学校毕业。

当时,国民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都已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并且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战争。面对着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唐铎心潮起伏,恨不能马上驾驶战鹰投入战斗,歼灭敌人。

有一天,唐铎把自己心中的这种想法告诉了刘云。刘云很高兴地对唐铎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革命插上翅膀飞翔!”

他还问唐铎:“小唐啊,你愿意不愿意到苏联去看看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啊?”

这个意外的问题,像一块石头落在一池清水中一样,激起一层又一层涟漪。



早在跟随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时，唐铎就已十分向往苏联了。现在能够去，他当然非常愿意了。但他又缺乏信心，犹豫地问：“愿意是愿意啊，可是，哪儿有这么好的机会呀？”

刘云立刻大笑起来，说：“这个机会已经来了。国民政府已经决定派我们飞机学校的几名毕业生去莫斯科继续深造，其中就有你唐铎。”

唐铎突然得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蹦了起来，天上真是掉馅饼了。

当时在学校的学习仍在继续，刘云身为党代表，不仅带领大家认真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时深入学习飞行技术。

从入学不久，刘云即组织了一个俄文学习班，由苏联顾问马采依利克的夫人教大家学习俄文。这位夫人也是苏联顾问团的工作人员，她教课非常热心、周到。

第一次上课时，她拿来了一本载有列宁事迹的苏联画报，上面有一张列宁的半身照片，照片上还有俄文书写的名字。

她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向大家介绍了列宁的生平，接着，她就教大家用俄文写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几个字。

这是唐铎第一次听俄国人讲述列宁的生平，也是唐铎平生第一次学习俄文，由此他便与俄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家跟马采依利克夫人学了一年俄文后，唐铎才知道，创办这期俄文学习班，的确是刘云很有政治远见的一着棋。

因为直到为期一年的学习结束后，刘云才宣布大家要到苏联去学习飞行技术，这下语言可派上了用场。

到苏联学习前夕，发生的几件事使唐铎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一是，广州传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据说，苏联为了加强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联络,派出了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飞行员,驾驶着五六架飞机,从莫斯科起飞,越过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贝加尔湖、蒙古戈壁滩,已经到了北京。不久,又飞到开封和上海绕了一圈。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个消息像神话一样吸引着大家,使这些即将踏上苏联领土的年轻学员们对苏联卓越的航空事业更加充满了敬佩和向往。

二是,8月20日,广州突然发生了廖仲恺被杀的案件。这个案件犹如晴天霹雳,使大家非常吃惊,并给大家的心头上蒙上了一层阴云,使人感到非常压抑。当天,刘云、朴泰下、金震一和唐铎曾跑到廖仲恺先生遇难的地点——国民党中央党部(今广州越秀南路93号)门前,看到门前的台阶上还残留有鲜红的血迹。大家正是怀着这种无以名状的悲痛而沉重的心情,准备出发动身前往苏联的。

就在这一年,湖南益阳地区灾害严重,唐铎的父母连续几次来信,催促他回家照顾一家老小;而且,由于老人看到连年兵荒马乱,战事连年不休,他们担心唐铎在动乱岁月之中客死在外地,因而催逼甚急。已经将整个身心与革命事业密切相连的唐铎自然不会遵从老人之命。所以,当时唐铎虽然挂念父母家人正陷于灾害之中,常有牵肠挂肚的难言之苦,但他还是决定不离开革命队伍,而是毅然决然地奔赴苏联去学习革命的新本领。

唐铎和同学们经过一番准备,于1925年8月底,从广州动身,前往遥远的北方异国红色首都——莫斯科。

这次被国民政府派到苏联学习的,除了刘云和唐铎以外,还有王翱等共计六人。在国民政府航空局局长陈友仁的顾问李糜的带领下,他们一行从广州搭乘轮船首先到达上海,因为是秘密出国,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海峡,绕过朝鲜南端的山峦,越过日本海,就到了海参崴。

到达海参崴时,已是9月中下旬了,这里的树叶已经开始飘落。上岸之后,他们受到了第三国际派驻当地代表的热情接待,还参观了这个美丽的城市。

在这里住了两三天之后,唐铎一行人改乘火车又向西朝着莫斯科方向前进了。

火车载着他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奔驰,越过了广阔的西伯利亚,终于在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前夕,到达了心神向往的莫斯科。

从此,唐铎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活。

1925年10月,唐铎被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在该校学习的除苏联青年外,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印度、阿富汗、波斯的学员。

中国学员中除唐铎、刘云、王勋外,还有冯玉祥派去学习的郭允恭、石友信等人。在这所飞行学校,唐铎学会了驾驶安里奥式、布马式等多种机型,并于1926年2月经刘云等介绍加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唐铎于空军第二飞行学校毕业后,被派往图拉省的谢尔普霍夫城一所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开始学习战斗飞机的驾驶和空战技术。通过学习,他掌握了伏奥凯尔·采3、伏奥凯尔·11和13等三种作战飞机的空中战斗和驾驶技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苏联政府向中国留苏人员宣布:蒋介石政府要求全体留苏人员一律限期回国报到。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宣布:中国留学生如不愿回国,可以继续学习。

根据组织的安排,唐铎决定留下来继续学习。

1928年底,他按期毕业,被授予苏军空军中尉军衔。



次年初,他进入萨马尔州的奥林布尔格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学习。

1929年8月,唐铎于第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飞行大队任中尉飞行员。

1929年底,唐铎从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工作的刘云处得知,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已被撤销(因苏联不允许有外国党组织在苏联国内活动),因此各国共产党员可以加入苏联共产党。

为不中断组织关系,他随即向第十八飞行大队提交了入党申请,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的证明下,于1930年10月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1931年10月转为正式党员。

1932年初,唐铎又一次进苏联空军通讯学校学习。半年后重返原部队,并晋升为上尉军衔,担任旅通讯主任。

由于他飞行技术熟练,因此,在当年十月革命节飞越红场接受检阅的100多架飞机中,唐铎驾驶的飞机飞在最前列。受阅后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和宴请。

1934年,他考上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试读生,次年转为该院本科学生,从事空军兵器(又称航空军械)专业的学习。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苏军建军20周年时荣获奖章一枚。

由于受苏共“肃反”的影响,1938年初,唐铎突然被逮捕,关进了莫斯科的布德斯克监狱(后来才知道是苏联当局怀疑他是日本特务),直到一年以后,苏联内务部门在接到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以及在苏联文艺界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萧三写的证明信件后,唐铎才被释放出狱。1940年夏,他重新复学,插班到二年级继续学习。同年,他因在苏军服役满15周年,苏联



政府授予他红星勋章一枚。

唐铎在苏学习期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唐铎在此期间参加了苏联对法西斯的战斗,为保卫苏联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力量,光荣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苏德战争爆发后,唐铎随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撤离莫斯科,迁往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1942年,唐铎毕业后,获得了机械工程师职称,随即被分配到利比茨克一所专门培训从前线空军部队抽调来的师团级军官的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教官。1943年唐铎被授予少校军衔。1944年,经过多次迫切要求,他被批准赴前线参战。

当时,他担任空军第七十四团实习副团长。

1945年,在夺取列宁格勒和杰尔别尼克(今加里宁格勒)的空战中,他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鉴于作战有功,又获得两枚奖章。同年,由于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功勋卓著,苏维埃共和国授予唐铎一枚苏联卫国战争勋章,这是苏联对卫国英雄的最高奖励。

### 4. 面见刘亚楼,唐铎报效祖国的愿望得以现实

1945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唐铎被分配到彼尔姆苏联空军技术学校,任中校主任教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激励着他回归祖国效劳的强烈愿望,而且这个愿望日甚一日。此前,早在1939年初,他就曾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提出过回国的要求。但是,当时任弼时考虑到延安还没有空军,也没有



成立相关的学校，回去以后没有用武之地，所以让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等将来祖国需要时再回国效力也不迟。

唐铎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苏联学习和工作。

1948年，苏联红军为表彰唐铎在苏军服役期间对卫国战争和苏空军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奖给他一枚红旗勋章。但他没有就此满足，仍然坚持回国效力的意愿，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早日回国。

8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刘亚楼和王弼等人的要求下，唐铎得以与刘亚楼、王弼见面。

刘亚楼对唐铎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要组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我们已在苏联聘请了大批专家，到时候，你唐铎要带这批苏联专家一同回国工作。”

至此，唐铎朝思夜盼的回国愿望，终于看到了实现的可能。他多么希望早一天返回已阔别20多年的祖国啊！

1950年，唐铎因在苏联服役已达25周年，获得了苏联政府最高荣誉奖——列宁勋章。

在这期间，苏联国防部曾经三次召唐铎到莫斯科面谈他的回国问题，但却迟迟未作具体安排。为此，唐铎又通过我驻苏大使馆给军委空军写信，再次表达他想回国的迫切心情。

1953年3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又针对唐铎问题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苏联国防部终于作出了让步，批准唐铎回国工作。接到通知的当天中午，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李富春、蔡畅等人邀请唐铎在莫斯科苏维埃旅社共进午餐，共叙自留法勤工俭学以来30多年的离别之情，对唐铎



等回国工作表示由衷的高兴与热烈的祝贺。

1953年4月9日,唐铎告别生活了28年的苏联,携同他的苏联妻子盖妮娜·娃尔娃拉·伊万诺夫娜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同返回日夜思念的祖国。他的妻子伊万诺夫娜,1915年出生于乌克兰,是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员,俄罗斯克罗托夫卡市执行委员会打字员,1943年与唐铎结婚后,取名唐瓦柳。临别时,苏联外交部曾以莫洛托夫外长的名义正式电告中国政府,说明唐铎已被派遣回国。

唐铎一到北京,感到什么都亲切,心情也格外舒畅,立即请求分配工作,总干部部赖传珠、徐立清等领导接见了 him。

当时,因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在筹建之中,急需懂教学和航空工程专业的人才,在院长陈赓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派唐铎去哈军工参加筹建工作。4月底,唐铎在陈赓的带领下,去中南海拜见了朱德总司令。

朱德勉励唐铎等人要努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把中国自己的学院办好。

同年5月,唐铎被任命为哈军工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兼系主任。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献身精神投入到学院的创建工作中。1955年他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在唐铎的主持下,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包括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试验的教学大楼,同时还建立了二十七个教研室和一支高质量的教学队伍。在他的领导下,该系先后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等六个专业和一个空军机务干部培训班专业。为研究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事业,他还筹建设置了第七科,并亲自兼任科主任,后发展成为电机系。



唐铎在十年的空军工程系主任的任内,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运用他在苏联时学到并掌握的专业知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4年4月,学院突然宣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调唐铎到辽宁大学工作。这对于他是一个很打的打击,因为唐铎毫无思想准备。

唐铎虽然非常热爱军队,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但是出于多年的党性锻炼,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他立即服从了上级的决定。

随后,他转业至辽宁大学担任副校长工作。

### 5. 中苏关系恶化,唐铎被打成“苏修特务”, 关押七年之久

将唐铎调离部队的主要原因就是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人们对苏联越来越仇恨,于是,在苏联服役28年的唐铎就成了众矢之的,领导对他不信任了,群众也不敢接近他并和他疏远了。

有人担心他会将我军备战“苏修”的军事秘密给泄露出去,但在唐铎的工作上又找不出把柄,他仍然是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于是,领导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干脆将他调离军队算了。

在辽宁大学,与在哈军工时一样,他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从不计较个人待遇与得失,对于辽宁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及基本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然而,就在他以新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为党在另一条战线上



继续忘我工作的时刻,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8年初,康生在接见辽宁大学两派红卫兵上访代表时煽动说:你们要回学校闹革命,学校不是没有事做!唐铎是什么人哪?康生暗示,唐铎是“苏修特务”。这个消息传回沈阳后,唐铎立即被关押起来,而且这一关,就是七年之久。

在狱中,唐铎对林彪、康生的诬陷以及种种倒行逆施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无论采用怎样的“诱导”和怎样的逼供,他始终表示,“接受组织的审查,但我绝不是什么苏修特务。”

尽管如此,出于对党的信念,他坚信总有一天自己的事会真相大白,会水落石出。所以,他一直在狱中坚持锻炼身体,以便出狱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他以自己的一身正气显示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尊严和品德。

1974年11月,唐铎终于被释放。

1978年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和工作,他重新担任了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并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1983年后,他为支持年轻干部工作,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的领导职务。同年,他在参加辽宁省委扩大会议时,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80岁。

唐铎从青少年时代投身革命洪流,走过了极为坎坷的人生道路,经受过多次严峻的革命斗争考验,但他百折不挠,始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在侨居苏联以及归国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为中苏两国人民以及中国空军的建设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不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战士,不愧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优秀代表。

# “东江猛虎”曾生



1. 面对校长高高举起的教鞭，曾生猛冲上去，夺过教鞭，折成两段
2. 报效祖国心愿未了，却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监狱
3. 抗日宣誓：“谁不抗日，天诛地灭！”
4. “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5. 国民党宣布：“曾生部被歼灭。”可时隔不久，曾生又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6. 营救避居香港的文化人士，邹韬奋为曾生题词留念：“承蒙卫护，不胜感奋。”
7. 转战华东立奇功，毛泽东问：“你就是大闹广东教育厅的曾生？”
8. 叶剑英力保，举荐曾生担任海军舰队副司令、广东省副省长，但还是被黄永胜投进了秦城监狱



## 曾 生

(1910— )

广东省宝安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前在地方工作,后参加游击队转入部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团主席,广州抗日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海员工会组织部部长、书记,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惠宝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两广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珠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1. 面对校长高高举起的教鞭,曾生猛冲上去,夺过教鞭,折成两段

广东省惠阳县坪山乡,位于大鹏半岛北端,东南濒临大鹏湾,与九龙新界山水相连,西南为深圳,东北接连惠州,交通十分便利。

由于坪山属丘陵地带,土地贫瘠,许多本地人不愿在此居住,都到香港做工去了,也有不少人到外轮上当海员或漂洋过海去外国谋生,因此,这里是著名的侨乡。这样一来,外来人便陆陆续续来此开垦种植,世代相传,成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1910年12月19日,曾生就出生在坪山乡石灰陂(现属广东宝安县),当时父亲给他取名曾振声,因为客家话中“振”与“曾”音相近,而“声”与“生”音相同,因此,他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时,就用了“曾生”这个名字。

曾生的父亲曾庭杰青年时代因生活所迫,只身跑到香港,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当厨师,随船到过欧、美、澳、亚各洲的许多大城市,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带回家置了十几亩地,作为曾生母子的生活来源。

曾生的母亲钟玉珍,是坪山邻乡的一位纯朴的客家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思想开明,通情达理。

父母只生了曾生这么一个儿子,因此将其视为掌上明珠,但又不溺爱,要求很严。

曾生6岁时,被母亲送入家乡的福音堂读书,一年后转知新书室(私塾)继续就读。以后又转到龙岗圩外祖母处的沙梨园小学读了两年,10岁时初小毕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曾生的班里有个同学叫李冬虎,长得又胖又高,还比曾生大两岁。他自恃力气大,经常欺侮年纪小的同学,同学们都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牛头王”。

有一天,“牛头王”又欺负曾生的同桌李琦同学。李琦瘦小,斯斯文文,学习成绩很好。李冬虎自己不好好学习,却妒嫉学习好的同学。他借故突然揪住李琦的头发,还把李琦的书也抢了去。

曾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猛地站起来,大喊一声:“你把书还给他!”

这个“牛头王”一看曾生为李琦抱不平,就挥着拳头冲着曾生骂道:“关你什么事,你这个客家仔,是不是要和我比试比试?”

曾生也不服输,于是,二人约定放学后在校门外较量。

放学后,他们两人走出校门就你一拳我一脚地扭打起来,经过几个回合,膀大腰粗的李冬虎硬是被比他小两岁的曾生压在了地上认输求饶,围观的同学无不拍手称快。

从此,李冬虎再也不敢欺负同学了。

但是,胡雨川校长却对此事不依不饶,他不问是非曲直,认为打架就是违犯了校规,非得处分不可,又找曾生的伯父告状。

万般无奈之下,伯父只好让曾生回坪山读书。

其实曾生早已对超然学校失望了。短暂的香港求学生涯,使曾生明白:香港这个地方是有钱人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太不平等。中国人没有地位,总是在受洋人的欺侮。而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流落香港,更使这里增添了几份封建色彩。

回到坪山的曾生,感到像获得自由的小鸟。

在家乡重新读高级小学后不久,曾生的父亲从澳大利亚来信要他赴澳洲读书。此时国内军阀混战,粤系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



山之后不久,滇桂军阀入粤,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坪山正处在军阀混战的边缘地带,直接受到战火的蹂躏,很多年轻人都想到国外去谋出路。

但是,曾生又放心不下相依为命的母亲。

最后还是母亲看出了曾生的心思,对他说:“阿声,你放心去吧!去父亲那儿好好读书,有了知识将来才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业,不要为了我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在母亲的鼓励下,曾生终于下决心去澳大利亚求学。曾生母亲亲自把他送到了香港,把他交给了父亲嘱咐的一位熟悉的轮船管理员,才恋恋不舍地回去。这一年是1923年。在父亲好友的照顾下,曾生顺利地到达了澳大利亚的悉尼,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

很快,在父亲的安排下,曾生进入了一所教会办的补习学校读书。不久又读了初中。

初中毕业后,曾生转入一所自费职业中专学校——商业学院学习,主要课程有会计、广告、打字、速记等。曾生还利用业余时间到附近的汽车行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初中毕业后的曾生之所以没有接着读高中,是由于他父亲希望曾生早日学些商业知识,早点毕业后就能赚钱养家。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居住着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白人占据主导地位。这里谋生比较容易,但是中国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不得不忍受白种人的欺侮与歧视。在这里,中国被认为是“劣等民族”,中国人被鄙视为“东亚病夫”。

曾生与一些中国少年外出活动时,常常遭到白人小孩的讥讽与嘲弄。他们还经常用英语骂中国小孩。这一切不但没有使曾生



自卑,反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曾生希望祖国能尽快富强起来,使中国侨民在世界各地能够抬起头来做人,不受外国人的欺负。他暗地里立下誓言:效忠祖国,振兴中华。希望将来能回到家乡,报效自己的祖国。

1928年,曾生从商业学院毕业了。曾生有心回国,但又怕父亲不同意。

正犹豫之间,一天曾生的父亲对他说:“声儿,俗话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你母亲长期一人在家也够难为她了,我想回老家去安度晚年,不知你有何打算?”

曾生一听非常高兴,这不正合己愿吗!

曾生也把自己立志报效祖国的心愿告诉给了父亲,于是,父亲决定带曾生一起回国。

年底,父子俩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坪山,一家人终得团聚。

## 2. 报效祖国心愿未了,却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监狱

在曾生离开家乡的六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先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成功北伐,但是,不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被迫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战争。

曾生回到坪乡后,开始曾想像父亲早年那样去当海员,但是后来考虑到自己年纪尚小,学业未成,于是希望继续读书。

父亲在海外做工稍有积蓄,家中又有田地,经济还算宽绰。看



到自己的孩子好学上进,父亲心中非常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了曾生的要求。

父母亲考虑到曾生英文基础较好,而香港离家比较近,毕业后也容易找到一个好工作,因此,主张曾生去香港继续读书。

但是,曾生有自己的想法,他对父母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中国青年,已经读了不少英文学校,现在应该去读中文学校,以便将来为中国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提出想去曾是中国大革命中心的省城广州去求学。开明的父母亲支持了他的想法。

于是,1929年,曾生到了广州。

曾生从小就敬仰孙中山先生,所以一心想进中山大学学习。那时曾生的中文只有初中程度,所以先要去中山大学附中读高中,而要考高中也需要补习中文,为此曾生先进入了“百粤补习学校”补习中文课程。

补习学校校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对中国的现状忧心如焚,不愿意与旧势力同流合污,因而自己筹资开办了这家补习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一些中国明天的希望。

潘子湘老师对同样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曾生非常欣赏,对他倾心栽培与帮助。

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努力,曾生的中文程度提高很快,当年暑假就考上了中山大学附中预科。

1929年冬,正当曾生准备参加中山大学附中的期终考试之际,一天晚上,一批军警突然到曾生住的学生旅馆抓人,曾生也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监狱。

原来,“学旅”的房东黄明堂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成为

## “东江猛虎”曾生



张发奎的部属,受指派回广州做策反工作,伺机推翻陈济棠的统治。事情败露后,广州当局认为住宿的学生也参加了黄明堂的活动,就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此时附中不愿意出面担保,曾生只好求救于潘子湘校长,经潘子湘的多方努力,曾生等学生才被担保释放。

这次被捕入狱,使曾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之前,曾生也抱有一种正统思想,寄希望于国民党来领导人民建设国家,振兴中华。

但是,新旧军阀连年混战、争权夺利,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状使曾生认识到,依靠国民党中国是不会有前途的。

在牢房中曾生又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下的许多革命标语与口号,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等等,使曾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鼓舞。

作为知识分子的曾生,也曾接触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通过对比分析,曾生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未来可能要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出狱以后,曾生便开始留心打听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注意阅读马列主义等进步书刊,在同学们中间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

1930年,曾生与附中的钱兴、粟稔、韩瑶初、钟远蕃、罗宗皇等十多位进步同学成立了学习进步书籍的读书会。学习革命书刊,交流学习心得,出版进步刊物。他们出版的杂志《铁轮》,刊登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杂志除在同学们及乡下散发以外,还邮寄给香港和海外华侨。在曾生与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份自办



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途经“沙基惨案”的发生地涌向市中心。

中山大学的“双十二”示威大游行,打破了广州几年来抗日运动沉闷的空气,使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一个高涨的时期。

中山大学的“双十二”示威大游行后,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起来,纷纷要求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但是,中山大学抗日会主席团被消极抗日的“抗声社”成员所把持,他们无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救亡活动消极怠工,有些干脆不予执行。

对于广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怕得要死,急忙召集全市学生自治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拚凑成立了御用组织“广州市学生联合会”,鼓吹“读书救国”,妄图瓦解爱国学生的斗志。

与此同时还指使中山大学“抗声社”成员继续把持中山大学抗日大会主席团,敷衍学生,阻挠学生爱国运动。

在学生的爱国运动无法遏制的时候,广东省当局又授意其走卒提出“停课十天,下乡扩大抗日宣传”的阴谋,妄图通过这一手段平息市内的抗日怒潮。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继续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曾生与钱兴、粟稔、金昌华等进步同学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如何进一步开展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他们决定今后要努力团结全市爱国师生,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广州市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对把持中山大学抗日大会主席团,阻挠抗日运动的“抗声社”成员给予彻底的揭露,把他们从抗日大会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把中山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



领导权完全掌握过来。工作方针明确以后，曾生和他的同学们工作劲头更足了。

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一次十分成功的全校抗日大会，严厉地斥责了“抗声社”成员把持主席团，实行“包而不办”、消极怠工的行径。

大会选举了新的抗日会主席团，并推举曾生担任主席团主席。

会议通过了三项重要决议：①通电全国，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反对华北自治；②筹组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以大会主席团成员为筹备委员；③再次举行广州市抗日示威大游行，继续扩大抗日救亡运动。

面对中山大学师生进一步高涨的抗日热情，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坐不住了，他从南京参加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充当压制和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

广州军阀陈济棠对邹鲁背叛自己，投靠蒋介石也十分不满，也借机指责邹鲁办学无方，放任学生“大闹学潮”。

邹鲁为讨好新主子，破坏学生爱国救亡运动更加积极。他一方面而继续标榜自己一向“抗日”，强调全校师生必须在“抗日”校长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具体措施是：企图取消由学生选举产生的中山大学抗日会筹备委员会，代之以教职员占多数，完全受他操纵的中山大学抗日会。

1936年1月6日，邹鲁策划的全校师生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如期举行，会议一开始邹鲁就一反常态，极力为蒋介石不抗日作辩护，吹嘘自己一向如何主张抗日，接着又板起面孔，摆起校长的架势，指责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过火”了，“行为越轨”了。



宣布会后他要亲自来“领导”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要解散由学生选举产生的抗日会筹委会，成立由学校领导的抗日会。

他讲完话后，就立即宣布散会。同学们非常气愤，全场哗然，不肯散会，并高呼抗日口号。邹鲁的爪牙们纷纷跳上台来为反动校长帮腔，但纷纷被学生们轰下台。

恼羞成怒的邹鲁在主席台上大肆咆哮，公然拍着桌子辱骂学生。

会场出现了僵局。此时，为同学们欢迎的邓初民教授站了出来，公开承诺如果学生们因抗日而流血，他愿意与同学们流血在一起。

同学们深受鼓舞，接着邓教授又非常策略地要求同学们拥护抗日的校长，如果校长什么时候不抗日了再打倒他。

这一招果然有效，邹鲁可不愿意背一个不抗日的名声，也就不敢再大呼小叫了，会场的气氛也为之一变。

曾生抓住这个机会，立即站起身来，面向同学们，一边招手，一边走上主席台，并高声招呼抗日会的筹备委员上台，号召继续召开全校师生抗日大会。

大会排除了邹鲁等人的进一步阻挠开得很成功。

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救国会，并克服重重困难成立了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敌救国会执行委员会，推选曾生为主席。

会议临近结束时，曾生根据预先计划突然建议请邹鲁领导全校师生员工举行抗日宣誓，同学们立即鼓掌响应，邹鲁无可奈何地站起来，举起右手，领导宣誓：“我们中山大学全体师生一致抗日，谁不抗日，天诛地灭！”使得邹鲁至少从表面上不敢轻举妄动。



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

曾生连夜主持召开执委会全体会议,定于1月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更大的抗日示威游行。

1月9日上午,中山大学3000多人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举行誓师大会后开始游行,队伍像一股洪流涌向市中心,沿途不断有学生、市民参加进来,到了下午,游行队伍达到3万多人。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妥协投降!”

口号震动广州城。

游行过程中曾生、钱兴等学生纷纷发表演讲,大会还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推举曾生为主席。

广州“一九”抗日示威大游行声势浩大,推动了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一九”示威游行后,号称“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撕下了“支持抗日”的假面具,开始公开镇压抗日救亡运动。

曾生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接着,中山大学停止了曾生的学籍。广州的“中青”组织又莫名其妙地停止了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组织生活,给曾生以很大的打击。但是,曾生坚持抗日,矢志不渝,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山大学师生的掩护下,仍在中山大学内坚持抗日活动。

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曾生等人不得不一个晚上换几个宿舍睡觉。

后来,由于环境日渐恶劣,加上不能公开活动,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于是曾生与钱兴等人认真研究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



钱兴建议由他坚持在广州的抗日斗争,让曾生去香港设法寻找党的组织,以便可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曾生同意了钱兴的意见。

### 4.“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1938年10月12日。

一个黑色的日子。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危急。

13日,在与大陆唇齿相依的香港的一座不起眼的公寓里,几个人围坐在桌前,低声交谈着。气氛十分紧张,门外还有几名身着便衣的壮汉在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港英当局时隔很久才明白,这天晚上,在这里曾发生了一件改变粤东抗战格局的重要会议。

这座公寓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此后7年里,开展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决策就是在这里作出的。

一位略显肥胖,外号“胖子”的中年人就是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只见他目光炯炯,心情沉重。

他向在座的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和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他说:东江地区可能迅速沦陷,共产党人务必在东江敌后开辟游击区,务必马上考虑如何回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等问题。

吴有恒比曾生小3岁,1913年出生于恩平县,18岁便参加青



年抗日救亡运动,做过小学教师,1936年从事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虽然只有25岁,但已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先任工委书记,后任市委书记,为人文静稳重。

上级组织决定从吴、曾两人中选派一人去东江沦陷区组织敌后武装。与此时尚且“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东江敌后无疑是很艰苦的,并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胖子”停住了话题望着吴、曾两人。

“我去。”

“我去。”

“不,你留下。”

“你留下。”

两人相持不下,等候“胖子”的“裁决”。曾生仿佛胜券在握,一条条摆起自己的有利条件来:“老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适合。第一,从个人来说,你是恩平县人,语言不通,人地生疏;我是惠阳县人,语言通,了解情况。同时,我在家乡坪山地区进行过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青年,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从组织上来说,惠阳县淡水、坪山地区的党组织是由我们海委直接领导的,我从任海委组织部长到任海委书记期间,负责指导他们的工作。现在家乡沦陷,乡亲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有责任回去组织群众,开展救国救民、保家保国的抗日游击战争。”

“但那是我的势力范围啊!”吴有恒说。

“我看,从便于开展工作考虑,还是派曾生回去吧!”廖承志沉默了片刻后说。

曾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吴有恒用食指敲着桌子,顺手辗死了一只飞蛾。



参加“惠青”工作团。

一个多星期后,淡水和坪山的党组织动员一批青年来参加工作团,工作团员叶维儒从家里拿来德国制造的全新长短枪七支,坪山党组织又送来四五支步枪。很快,一支30人左右的队伍就组织起来了。但是,要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对阵还差得很远。人手还好说,枪支奇缺是最大的问题。

曾生了解到在坪山附近驻防有两支国民党部队,一支是国民党正规军第一五一师温淑海旅,旅部设在龙岗大井村;另一支是国民党地方部队罗坤大队,大队部设在坪山附近。在日军占领淡水、惠州、广州之后,这两支部队与其上级指挥机关失去了联系,成了孤悬敌后的部队,经济困难,军心动摇,处境艰难。曾生决定做温、罗两部的工作。在队伍到达坪山几天后,曾生委派刘宣等人,以“惠青”工作团负责人的名义,去拜会温淑海和罗坤,表明他们回乡抗日的决心,希望与温、罗携手抗战。

温、罗两人想趁机收编这支武装。刘宣赶忙转了话题,对罗坤说:

“我们工作团住在坪山学校,敌人住淡水,相隔才20多公里,坪山又靠近公路,我们需要有武装放哨自卫。”

罗坤是淡水人,早年曾追随邓仲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带领一支武装在澳头沿海地区包烟包赌,大搞走私。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省港罢工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聂平到淡水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物资运往香港,拦截香港进口的私货,触犯了罗坤的利益,罗坤就带领他的土匪武装奔袭淡水,杀害了聂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这支土匪武装被国民党当局改编为一个



1938年10月底,曾生回香港向廖承志和东南特委汇报工作。

临走时,廖承志交待:“我们要在国民党军队驻防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武装,先要争取一个公开合法的名义。这对发动群众十分有利,特别是对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有利。”

曾生将这番话牢牢记在心里,从香港返回惠阳,即向中共惠宝工委作了传达。

11月初,曾生偕同刘宣、周石永、陈铭炎、黎孟持(坪山学校教员)一行五人,来到龙岗大井村温淑海旅部,要求温旅支持组建部队,给予合法名义。来得正巧,宾主各有所求。

会谈气氛变得融洽起来。温淑海正想通过“东宝”工作团取得群众和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持。

于是,对曾生他们视如贵宾,热情备至。旅长、政训处主任和参谋长一起设宴席为客人接风。

席间,政训处主任笑吟吟地赞扬曾生他们说:“内地一些人,平时空喊抗日,说什么要打到东京去,叫得很响亮,但现在敌人一来,都跑得最快,有办法的人,都跑到香港逃难去了。你们在香港的青年却在敌人登陆还不到半个月,就组成回乡救亡工作团回来参加抗战,实在令人钦佩!”

温淑海也说了许多赞扬的话。

在主宾谈兴正浓时,刘宣顺着话语提出:“日军人侵,群众深受其害,老百姓纷纷要求抗日杀敌。我们工作团根据群众的要求在沿海澳头、坝岗和内地山区周田、坑梓、常柏田等乡村组织有二三百名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我们想把所有这些民众抗日武装组成一支队伍,既可配合你们部队作战,又可维持地方治安。希望温旅长给我们一个抗日武装队伍的名义。”



温淑海抽了一口烟，眯着眼睛沉思了一会儿问道：“叫什么名字？”

刘宣说：“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温说：“衙门太长了，不如改为抗日义勇军。”

曾生说：“这是我们大家商量定下的名称，还是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吧。”

大约温淑海认为名称不是一个什么实质性问题，便改口问道：“谁当队长？”

这倒是实质问题。

周石永指着曾生说：“曾振声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在香港海员工会搞抗日救亡工作，他父亲也算是当地一个乡绅，我们推举他当队长。”

温淑海没有表示异议。

饭后，温淑海当即给曾生发了委任书：“兹任命曾生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第一五一师旅长温淑海（签名），民国 27 年 10 月 30 日。”

当晚天黑以后，温派了一个荷枪实弹的武装班护送曾生一行回到坪山。

有了合法名义，燃眉之急就是加紧成立部队。曾生一边派人去香港刻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印章，一边紧锣密鼓地展开筹备工作。

这时候适逢占领广州的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和保障其海上运输线，对滞留广九铁路沿线两侧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回归扫荡。

抓住这一机会，11 月 21 日，曾生又派刘宣带了几位工作团团员一起去龙岗向温淑海借枪。



刘宣等人到达温旅部时,他们正准备撤退。

说明来意后,温淑海即叫身边的刘永图团长借给 10 支步枪和一些子弹。

11 月 23 日,日军向坪山、龙岗一带进攻。

这时,“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部队仍未正式宣告成立,曾生带领工作团的 100 多人集中在一起,因只有 30 支枪,大部分人没有武器,且其中不少是女同胞。

书生出身的曾生,未带兵打过仗,也未打过游击,一时心里不踏实,万一敌人来进攻,怎么办?

经过一番考虑后,曾生等人拉着队伍随温淑海的部队向碧岭方向撤退。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听到日军来了,温部从上至下,慌忙逃跑,溃不成军。撤退到碧岭时,日军赶上来了。这时周伯明和红军出身的彭沃立即指挥曾部士兵利用原来已挖好的战壕做掩护,向日军开火。日军突然听到阻击的枪声,立即停止前进,但未发现他们,而是猛向碧岭山上撤退的温淑海部队开枪射击。曾部的人、枪以及子弹都很少,打了一阵,日军一停止进攻,他们就撤出战斗。

天快黑了,日军在前面压过来,他们只好向三洲田、盐田、沙头角方向撤退。

半夜,曾生、周伯明、刘宣、陈铭炎等人在盐田学校碰头,商量决定:武装人员留下在靠近香港英界地区隐蔽,由周伯明指挥;其他非武装人员暂回香港,看形势如何,请示上级之后,再作决定。

翌日晨,曾部到了沙头角。这时温淑海部的两团人已在沙头角挤挤攘攘,一片混乱。连长以上的军官都化装跑到香港英界那边去了,留下的士兵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有些士兵害怕日军打过来也往英界跑,结果一过界就被英军缴械扣留,送进集中营。

到了九龙,曾生立即去找“胖子”廖承志汇报。

廖承志说:“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东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广州沦陷后,11月1日,中共中央就及时明确指示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上帮助友军开展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利用国民党政政府的命令到处组织自卫队,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廖承志要曾生他们迅速返回内地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他说:“你们回去要尽快正式成立部队,把抗日部队的旗号打出来,对群众就更有号召力。成立部队要有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你是总队长,叫周伯明当政治委员。”他停了一下又说:“叶挺来了香港,我带你去见他,我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驱车来到香港九龙的新新酒店,他们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

曾向叶挺汇报了他们回坪山开展的工作和这次撤回香港的情况。听说国民党军队1000多人已撤退到沙头角溃散,叶挺将军说:“你们尽快去收容这些溃散的士兵,把他们带回去打日本鬼子。”

曾生找到在坪山时相识的温淑海旅刘永图团第三营营长麻玉标,希望他帮助收编溃散在沙头角的国民党士兵,带回东江敌后去打游击,麻营长表示同意。

11月26日,遵照叶挺将军和胖子的指示,曾生又带领四五十名“惠青”工作团团员回到沙头角,和周伯明带领的武装队伍会合。



此时,国民党军队的不少士兵已由沙头角跑进了英界,丢下的枪支很多,他们便每人都挑选了一支步枪。这样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了。

离开沙头角时,刘宣带领几个人留下来,他们很快又发现了一挺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和数十支步枪。回到沙头角后,在曾生协助下,麻玉标已勉强把约 1000 名国民党士兵收容起来。

11月29日,曾生、周伯明带着 100 多人的队伍,和麻玉标带领收容到的约 1000 名士兵,从沙头角回到惠阳县淡水附近叶挺的家乡沙坑周田村一带。

正当他们筹备成立惠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时候,温淑海亲自到周田来。他找到曾生后,提出要将他的部属带回去。接着就把麻玉标及其收编的约 1000 名士兵带走了。这是曾生他们由于没有经验,没有及时打出抗日旗号所造成的损失。

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周田村宣告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郑晋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部队一百余人。

在此前后,广东其他地区也相继成立了许多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一道不断打击日本侵略军,极大地鼓舞了东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斗志。

1939年元月,王作尧等人又在“东莞模范壮丁队”及收编的其他抗日自卫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任党总支书记。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十分重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自1939年以来先后派遣梁鸿钧、卢伟良、李振亚等一批红军军事干部赴东江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是,它以勇战强敌的姿态出现在东江敌后战场,沉重打击了东江地区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惠宝边军民的抗日热情,锻炼了这支新建的抗日武装。

由于新编大队主动出击,作战英勇,收复失地,保护群众利益,深得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赞扬,连国民党第四战区和游击指挥所也不得不传令嘉奖新编大队“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1940年春,曾生领导的新编大队发展至700多人,以坪山为中心的惠宝边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部队的活动范围也由坪山扩展至葵涌、沙鱼涌、盐田、沙湾、龙岗、横岗等地以及沙头角、深圳附近。

曾生部是以民众抗日武装面目出现的,无固定的经费和粮饷,经济非常困难。国民党虽然给了他们一个部队番号,但从来不给粮饷。部队的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从当地群众中筹集,一方面依靠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援。

曾生在香港领导过的“余闲乐社”、惠坪乐善公所,以及惠阳青年会、宝安青年会、惠侨救乡会等救亡团体和华侨学校的师生,通过募捐、巡回义演等活动,进行筹款,支援家乡抗战。

吉隆坡“惠侨救乡会”为支持祖国抗战,1939年一年就发动了两次募捐,第二期募捐所得款项的百分之四十献给了新四军,百分之四十献给了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直到1940年3月,曾生部的经费和物资供应,主要依靠着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

除经济上的支援以外,广大侨胞和香港海员还大批回国参加各种归国抗战团体,直接投身抗日游击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该团对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此外，南洋华侨包括美国华侨也给予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大力支持，有的将自己的子女不远万里送到东江来参加游击战争。

这支部队中主要成员除了曾生从香港带回大陆的爱国青年外，还有大量的爱国华侨青年。如，由吉隆坡爱国侨领黄伯才和张郁才出资，以黄志强为队长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两才队”；爱国侨领官文森独资，以王春红为队长，由七位女侨胞组成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由吉隆坡各界侨胞集资，以黄义芳为队长，由73人组成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和“加影队”、“星柔队”、“士毛月队”，以及“北马华侨回国服务团”等华侨子弟队伍。

据初步统计，先后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武装的港澳同胞和华侨子弟在1000人以上。其中涌现出了林文虎、钟若潮、陈延禹、黄密、沈尔七、黄志强等许多华侨战斗英雄，谱写了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 5. 国民党宣布：“曾生部被歼灭。”可时隔不久，曾生又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抗日武装的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在牵制日军后方的同时，对国民党“一党治天下”的局面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于是,国民党开始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在国统区实施反共大行动。

从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由北向南不断发展。国民党广东当局也不断向东江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施加压力。

11月,蒋介石亲派陈诚来到广东部署反共行动。广东国民党东江当局立即配合,于12月下旬颁令限制“东团”的活动。1940年1月底,“东团”杨德元、李健行等23人被逮捕。这仅仅是东江国民党当局反共的前奏曲。真正的大规模的被“瓦解与消灭”的厄运,即将降临在东江两支游击队头上。

1940年2月,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命令曾生的“新编大队”到惠州集训。一天一个电话,还不时由罗坤转告催促。但“新编大队”按兵不动。

曾生他们知道香翰屏搞集训的目的,就以多种理由拖延时间,不去集训。

香翰屏恼羞成怒,以“军令必行”向曾生发出最后“通牒”。

为了避免摩擦,保存实力,曾生决定派“新编大队”副大队长周伯明上惠州“晋见”香翰屏,一方面了解对方真实意图,一方面为游击队对下一步的行动决策争取时间。

周伯明到了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后,没有见到香翰屏,但从其参谋长杨幼敏的口气中了解到国民党的真正意图确实是企图消灭“新编大队”,并设计好了聚歼新编大队的场所。

情况紧急,周伯明巧妙脱身,返回总队驻地曾生报告了情况。

“新编大队”自然不去集训。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魔爪已经伸出,岂能善罢甘休。

1940年2月,战斗在国民党第四战区惠州游击指挥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李一之、张敬人匆匆赶到坪山中共东江军委驻地,密报了一个机密军事情报:国军已部署就绪,近日将派出部队围攻坪山、乌石岩一带曾、王二部。

军情危急!一发千钧。

军委和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负责人梁广、梁鸿钧、曾生、王作尧、何与成等人开始磋商对策。

由于地域上远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加之通讯手段落后,信息闭塞,此时全国的抗战形势如何,对国军的围攻该如何处理,他们心里都没有底,对周围的情况变化,只能靠有限的材料而作出判断。

国民党军步步进逼,危在旦夕。大家对转移已经形成一致意见。但在向哪里“走”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有人主张去罗浮山,有人主张东移海陆丰,有人主张回东莞水乡地区。大家七嘴八舌,意见纷纭。

决策困难的焦点是:走到日占区还是走到“国军”的后方去?按常理,抗日部队,应当在前线抗日,但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时,哪一个方案更保险呢?

就安全而论,海陆丰当是比较“保险”的。

海陆丰地区位于粤东潮汕的惠来与惠阳中间,一面临海,山川交错,地势复杂。打游击的回旋空间较大,又是中共的老革命根据地,著名的农运领袖彭湃曾经在这里领导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的部队也曾撤退到这里,群众基础很好。但是,容易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口舌。经过激烈的争论,尚无万



全之策。

东江军委决定向中共广东省委请示,但在未得到答复之前,曾、王两部先按向海陆丰地区转移的方案部署工作。

会后,曾生的新编大队整编为三个战斗中队和干部队、政工队。大队部下设医务所和修理所。全大队共500多人,其余70多名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留下隐蔽。

1940年3月初,广东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对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实行迂回包围。游击指挥所属下的罗坤、梁桂平支队和惠阳、博罗大队共千余人,已从北面和东面向坪山推进。

3月8日晚,正当曾生部在坪山圩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时,国民党军队已从龙岗、坑修、淡水三个方向进逼,便衣队已接近坪山。

9日晚,新编大队由东江军委负责人梁广、梁鸿钧亲自率领,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过包围圈,经石井、田心向东突围。与此同时,香翰屏指挥军队在王作尧第二大队驻地乌石岩周围增添兵力。

国民党军队发现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向东突围后,立即调动兵力,前堵后追。国民党广东当局和第四战区司令部急电各部迅速进行侦察截击。第四战区保安司令章远飞亲赴海陆丰指挥。

新编大队突围后,部队走得很慢,一个晚上只移动了10多公里,本来,东移前部队已经过整编,但非战斗人员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许多人不愿意就地疏散或隐蔽,执意要跟随部队行动;一些从南洋、广州、香港等城市来的男女学生根本没有行军的经历,刚走一天就累垮了。

新编大队拖着全部家当,一路受到国民党顽固派重兵围追堵截,损失惨重。



抗日志士，未死在御敌的沙场，却死于“友军”的枪口！

经过一番鲜血的洗礼之后，王作尧、曾生二部，合在一起剩下不足100人。但这100左右的人，却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火种”。

1940年8月下旬，天高云淡，秋色宜人。

曾生、王作尧两部百把个人回到宝安布吉乡的上下坪村后，中共东江特委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整，并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五八”指示，确定部队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五八”指示批评了“东移”的错误决策，指示重整旗鼓，更好地开展敌后武装游击斗争。

上下坪村位于鸡公头山西侧的山沟里，周围环境清幽，山峦葱郁，林木参天，这里地处日军和国军之间，因为山穷水恶，一贫如洗，日军国军双方都未曾涉足，村子隐蔽而安全，是养兵开会的好地方。

1940年9月中旬，会议如期举行，会议由林平主持，梁鸿钧、曾生、王作尧、郭强、卢伟良、周伯明、蔡国梁、阮海天、黄高阳等参加。

他们派出短枪队侦察敌情，在各条路口放了便衣哨，加强警戒，封锁消息。会议进行了五天，与会者沉痛总结了东移的惨重教训，着重讨论了此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以及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和部队的组织建制等重大问题。

林平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部队抛弃国民党原先给的“新编大队”、“第二大队”的番号，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副大队长郭强，政训员卢伟良；第五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副大队长周伯明，政训员蔡国梁。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



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两个大队的军事指挥。

从此，曾、王两部在组织上完全摆脱了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受国民党的约束，不受限制地扩大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这样，部队以更加鲜明的面目出现在广东人民的面前。

会议还决定，第三大队编制 70 多人开赴东莞活动，建设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编制 30 多人留在宝安路西一线，建设以阳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部队的领导机关设在东莞，林平、梁鸿钧随第三大队行动。

上下坪会议，对于当时这两支几乎溃不成军的游击队而言，是一次大幅度修正航向的重要会议。从此，这两支抗日游击队发展很快，在此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几百次战斗中，“东江纵队”以其辉煌的业绩面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蜚声中外。

### 6. 营救避居香港的文化人士，邹韬奋为曾生题词留念：“承蒙卫护，不胜感奋。”

在抗战初期，内地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文化运动，拥护和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抗战成绩，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国民党顽固派视这帮爱国的文化人为眼中钉，进行残酷迫害。

“皖南事变”后，他们在国统区更是难以立足，所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下，先后撤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们积极活动，创办了各种进步报刊，继续宣传抗战。对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起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

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军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挨



同时,还护送了 1.5 万余名港九同胞和侨商、侨眷脱离香港安全回到内地。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在离开东江游击队时,还专门为曾生题词留念:

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曾生大队长,以文士奋起,领导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保卫祖国,驻军东江。韬从文化游击队自港转移阵地,承蒙卫护,不胜感奋,敬书此奉赠,藉表谢忱。

韬 奋

1942 年 1 月 20 日于白石龙

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抗日斗争,东江纵队还先后营救了 100 多名各国战俘及商人,其中有 42 名英国人,54 名印度人,3 名丹麦人,2 名挪威人,1 名俄罗斯人,1 名菲律宾人。

1944 年初,曾生等人领导的东江纵队还营救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从日军重兵搜索围捕之中,抢救出一名又一名美军落难飞行员,此举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盟军提供情报,积极配合盟军合作抗战,取得了较大成绩,得到了盟国好评,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942 年春,为加强东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和地方中共组织的统一领导,成立了东江军政委员会,林平任主任,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谭天度、黄宇为委员。同时将第三大队及第五大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李东明任副主任、郭强任参谋处长。对外则称曾生、



王作尧为正副总队长，以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的面目出现。部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四个地方大队。

此后，曾生等率部开展了持续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第七战区余汉谋部的斗争，打破了其反共阴谋。并率主力伏击日军小股部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至1943年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与日伪顽军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使原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完全恢复，并向完太、宝太等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以及大鹏湾、大亚湾沿海扩展，同时建立了港九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脱产的抗日自卫队近千人，从而打开了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七个大队，共计3500余人。

1944年7月至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广东先后建立了路西解放区、惠东解放区、北江抗日根据地以及海丰县民主政府等解放区和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超过百万。此外，在这些地区边缘还建立了相应的“两面政权”。

东江纵队成立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各部队机动灵活主动出击，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在东莞的东江纵队一部以及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宝安大队、独立第三中队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的进攻。

此后，曾生等东纵领导人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又多次打退其较大规模的进扰，取得了许多重要战果。并组成短枪队深入日伪军占领区袭扰其后方重要军事和交通设施，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东江纵队领导下的海上游击队在此期间也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7月,东纵港九大队扩编为护航大队,积极在海上打击日伪军海上运输线,不断取得小船打大船和木船消灭日军机动船的战绩。

据不完全统计,海上部队先后俘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虏日军36人,击毙90余人。击毙伪军近100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中给予东江纵队以高度赞扬。他说,华南敌军约三个半师团,二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共8万余人。其中日军第五十七师团在广九铁路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百分之七十。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在广州、从化、三水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其百分之三十。

对此,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澳》的大字标题报道了东江纵队1944年上半年的战绩。报道指出:

东纵主力半年来与日伪军进行较大的战斗148次,攻克日伪军据点110个,破坏公路188余公里,铁路35公里,桥梁12座。毙伤日军440人,伪军560余人。俘伪军764人,伪军反正144人。像一把利刃插在华南敌后,威震港澳地区。

1944年8月,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曾生作为重要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决定大力发展武装,扩大部队。要求曾生的东江纵队在现有4000人基础上发展四倍。对此,纵队随即进行整编,先后建立三个主力支队和北江、西北、第四、第五支队,共七个支队。并全面开展了游击战争,先后发起了挺进北江先遣队行动,创建了以罗



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和北江抗日根据地。1945年春组建了东江纵队第六、第七支队,使纵队进一步扩大。至此,东江纵队已拥有九个支队和六个独立大队,共1.5万余人。

同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曾生与林平、梁广、王作尧、杨康华、林钢云、梁鸿钧(已牺牲,但当时尚未获悉)、刘田夫、罗范群、周捕、黄松坚、连贯、梁嘉为委员。

此后,曾生根据区党委意图,命所属西北支队执行北上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的重要任务,但由于8月14日日本已宣布投降,南下支队继续南进计划改变。曾生所部之西北支队即留粤北坚持游击作战。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曾生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率纵队参加受降斗争,共受降日军171人,收缴海岸炮4门,野炮1门,重机枪28挺,轻机枪21挺,步枪2385枝,短枪56支等(歼灭日军和投降伪军数均不在内)。迎来了华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 7. 转战华东立奇功,毛泽东问:“你就是大闹广东教育厅的曾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斗争形势更加复杂。

国民党反动当局一心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45年10月25日,已改任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在广州召开“两广绥靖会议”。其中心议题是在广东发动全面内战,限期三个月将共产党游击队消灭干净。

10月底,国民党军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曾生等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分散坚持,保存下部的战略方针,除了由曾生和林平率领少数部队留在惠宝边沿海坚持斗争以外,大量的部队分散在粤北、赣南、湘江南和东江的江北、江南、江东 40 多个县的广大地区,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广东当局企图三个月消灭东江纵队的计划。

张发奎在积极“清剿”华南游击队的同时,国共两党经过 40 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

我党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的原则立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意将我党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皖南、湖北、湖南和河南(不含豫北)八个解放区让出来,将区内军队逐步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

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又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并组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委员会”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先后向内战最激烈的八个地区派出了执行小组进行实地监督和调解。派到广州的是第八执行小组。该小组主要成员是: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将,美国代表米勒上校。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以及被东江纵队所救的国际友人的声援与大力支持下,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广东省有中共武装力量存在,并在重庆签订了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初步协议达成后,谈判转到广州继续进行,第八执行小组派出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军事代表团,国民党方面的宗阉上校,共产党方



面是廖承志(由曾生协助),美国方面是柯夷上校。与张发奎进行了一系列的面对面的斗争,于4月2日就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签署了具体协议。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北撤计划只允许2400人,而且要在一个月內集结完毕,大量抗战精英不得不就地复员或暂时转入隐蔽斗争。

1946年6月底,东江纵队班排以上干部及部分家属2000多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按时在大鹏湾的葵涌集结完备。

此时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仍不甘心其阴谋的破产,又纠集重兵,妄图一举全歼我东江精英。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对广东当局的阴谋进行了及时揭露与斗争,广东各界民主人士及港澳同胞也纷纷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美国代表米勒上校也从中斡旋,张发奎的阴谋终未得逞。

6月29日下午6时左右,曾生率东江纵队(含珠江纵队部分部队、韩江、粤中、南路的部分干部)等部2583人(与美舰协商,只要能装下,可不受人数限制)终于登上了美军提供的五八五号、五八九号以及一〇二六号三艘登陆舰,顺利北撤山东解放区,圆满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战略意图。

曾生率领东江纵队抵达山东烟台后,受到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针对东江纵队的问题,中共中央确定了“保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方针,紧接着华东局又作出了“东江纵队名义保留;战斗部队编为教导团,仍由东江纵队司政机关统率;地方干部、技术人员分别送入党校及侦听、卫生、通讯学校学习;军队干部编成一个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东江纵队教导团统归华东军政



毛泽东高兴地说：“打得好。”

毛泽东十分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问道：“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

曾生回答说：“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

上了火车后，毛泽东又来到曾生身旁，和曾生继续交谈。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就在广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于是毛泽东问曾生：“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

曾生被这句话问得一时语塞，答不出话来。

毛泽东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伦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

毛泽东当时与曾生谈赵伦的故事，意思是要曾生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

在北平短暂的逗留期间，曾生被安排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到北郊机场参加阅兵式，检阅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部队。阅兵式那壮观的场景，使曾生心情无比激动，更加坚定了早日解放华南的决心。

经过紧张而又稳妥的整编，6月21日，两广纵队整编完毕。

全纵队共1.36万余人，实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立一支万余人的华南主力部队的既定目标。

9月11日，曾生经长途转进抵达江西赣州参加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见到了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副书记林平等领导人。



9月28日,叶剑英、陈康签发了广东战役作战命令。两广纵队及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被指定为南路军,由曾生、雷经天和林平统一指挥。任务为于10月20日进至广州、虎门之间地区,截断国民党军南撤的退路。

10月13日后接受国民党第一五四师少将副师长郑荫桐率部举行的起义,并归两广纵队指挥。19日南路军占领虎门要塞,至此,国民党军沿珠江南逃的通路被完全截断。此后,两广纵队奉命与粤赣湘边纵队组成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还被指定为前委书记,统一指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珠江三角洲地方部队,担负歼灭珠江三角洲残敌,肃清土匪和建立人民政权等任务。先后解放了珠江三角洲广大地区。此后,又于1950年12月止,解放了广东沿海的全部岛屿。

两广纵队既是两广人民的子弟兵,又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部队。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敌1.9547万人,缴获坦克8辆,火炮279门,轻重机枪1128挺,各种枪支3.2176万枝。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对两广纵队的殷切期望,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和战役战斗任务,并在国内外、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 8. 叶剑英力保,举荐曾生担任海军舰队副司令、广东省副省长,但还是被黄永胜投进了秦城监狱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成立,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陈光、洪学智任副司令员(洪兼参谋长),曾生被任



命为副司令员兼两广纵队司令员,赖传珠、林平、冯白驹任副政治委员。

为坚守祖国的南大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曾生继续带领部队开展肃清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以及严密封锁海边防,监视港澳英葡的行动等项重要战斗任务。

1950年2月,曾生兼任珠江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当时的珠江军分区规模很大,下辖独立师、炮兵团、教导团和五个步兵团及八个县大队,总兵力共达2.65万余人。与此同时,曾生还兼任了珠江地委书记。

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曾生指挥军分区各部队先后进行了两年多的剿匪作战,给予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武装土匪以沉重打击,同时进行了地方政权建设并组织开展工农业生产,为广东珠江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春,第十五兵团调防,广东军区改编为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吴克华任参谋长,肖向荣任政治部主任,曾生被任命为副参谋长。

同年夏,叶剑英调回北京工作。黄永胜任华南军区司令员。

叶剑英知道曾生受黄永胜排挤,决定将曾生推荐给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安排工作。

肖劲光接到叶剑英的推荐信后,立即安排曾生先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在四年的海军系生活中,曾生学习异常刻苦,成绩十分优良,是全班三个全优的学员之一。他于1955年,在学院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但他总是以一个普通学员的身份学习、生活和工作。



1956年6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下达命令,任命曾生为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

人民海军的建设是从白手起家的。曾生在南海舰队四年多时间里,积极配合赵启民司令员和方正平政治委员将舰队逐步地建设起来。他首先协助司令员、政治委员抓好了军事训练这一重要工作。仅1957年全舰队就组织了24次远征集训和锚地集训,由此提高了舰队首长和司令部训练水平。

同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南海舰队在广州湾海区进行了多种舰艇与岸炮协同、在航空兵支援下,在敌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大规模抗登陆实兵演习。在组织领导中,曾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整个演习获得了圆满成功。

曾生在领导海军舰队的建设中还十分重视指挥员的训练。他自1958年起,亲自兼任舰队军官军事轮训队队长,全面轮训舰队司令部机关部处长、各编队首长、参谋人员,为完成舰队党委提出的“三年完成海军党委五年军官训练任务规划”的决议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受训对象中有南征北战几十年,但文化程度较低的老红军,水警区司令员、要塞区司令员等中高级领导干部,也有许多专业不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年轻学员。由此使教育训练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曾生面对困难毫不退却,他以刘伯承元帅办军事学院的一整套教学思想和教育方法为军官轮训队的“罗盘”,取得了很好的训练成绩。并于1959年底,建立了联合学校,使教育训练机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他重视和关心舰队舰船修造工作的建设。使舰队自1953年开始的建造木壳护卫艇发展至1959年能够自行建造自己设计的



国产高速护卫艇。

1960年10月,经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推荐,中共中央批准,曾生被借调去广州,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对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曾生作为共产党员服从了这一安排,但工资待遇仍保留在南海舰队。

改任地方领导工作后,正值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的时期,曾生肩上的担子十分重大。他关心人民生活,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工作并首先纠正了“左”的政策及其不恰当的做法。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了农、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终于使广东的形势逐步好转。

在广州市长任内,曾生还同时兼任市委书记,在广州的市政建设、公安政法工作、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各个方面多有建树,为广州的全面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66年6月,当曾生率领中国广东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归国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其死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以及他们在广东的爪牙,精心策划了一起所谓的广东地方党是“叛徒、特务党”的大冤案,其黑手开始伸向曾生。

1968年春节前夕,曾生正在越秀宾馆参加广州市委会议,黄永胜派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一位科长以立即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名义将曾生带走。随后秘密送往北京关押在京郊通县一个部队。1968年5月18日将曾生转入了秦城监狱。

曾生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牢房里,牢房内仅有一张矮床,床上仅有一床被子,起初甚至连枕头都没有,



曾生只得用自己的鞋子充作枕头使用。低矮的床凳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曾生脊椎变形,整个脊椎的关节骨质增生疼痛异常。

由于不准与别人讲话以及长期关押与世隔绝,曾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严重减退,以致后来被释放与战友和亲人见面时,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这种现象,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

在狱中5年多时间里,曾生先后被“专案组”“提审”了300余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曾生的主要罪名首先是“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在这一罪名被曾生光辉的革命历史所否定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曾生——日本大特务》的黑材料,编造了所谓曾生1966年5月率领“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因玩弄日本妓女,中了日本特务的圈套而出卖中国海军情报,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无耻谎言,并运用宣传工具采用换头术的手法伪造了所谓曾生的“罪证”照片,企图以此致曾生于死地。受此案影响,遭到打击迫害的原东江纵队指战员多达1000余人。林彪死党黄永胜为打倒曾生等东江纵队的老同志,还专门成立了所谓“东江纵队专案组”,以此对曾生等原东江纵队指战员进行残酷迫害。林平(原广东省委书记)被扣押,关在粤北山区;王作尧(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被关押;杨康华、邬强、周伯明、黄布、彭沃等老同志或被隔离审查或被关押揪斗。

1973年3月,曾生的女儿曾克南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告诉了父亲被秘密逮捕的情况。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监狱允许曾生的亲属探监。1974年,曾生因身心遭受摧残十分虚弱,被转送医院治疗。此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曾生的冤案终有了结



论,被释放。

1974年9月30日,曾生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国庆招待会。会上,曾生见到了许多老同志,心情万分激动,决心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参加工作,以补偿被关押而耽误了的为革命工作的时间。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国家各部门和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同年10月,曾生被任命为国务院交通部副部长。1977年10月又担任了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协助叶飞部长抓全面工作。1979年2月,叶飞调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曾生接任部长和党组书记。

在交通部工作的5年中,曾生协助叶飞狠抓了部属企业的整顿和发展远洋船队以及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工作。担任部长后,他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安排和开展交通部的工作。为中国交通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吴克之 (1911—1985年)

广东省琼山县人。年1937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伍。抗日战争时期,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三中队中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一总队大队长、支队长兼琼山县县长,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琼崖纵队支队长,纵队第三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纵队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事学院研究部副部长、训练部副部长,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 1. 迫于生计,加入国民党军队,揭发反动军官贪污案,被罢免职务

在我国风光秀丽的海南岛,有一个琼山县。它紧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海口市。

这里风光旖旎,有壮观的古火山遗址,秀美的西湖自然景观与泉出石隙、声如古罄、清冽甘美、千年不涸的“五龙泉”和“八仙泉”,滨海红树林有“海上公园”之称,“地下长廊”和“仙人洞”神秘莫测;还有琼台书院、五公祠、洗太夫人庙宇、著名历史人物丘浚、海瑞故居遗址等文物古迹,真可谓人杰地灵。

1911年9月的一天,就在这美丽的琼山县美兰乡(今演丰镇)塘内村,农民吴明良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婴离开母体,呱呱坠地。之后,吴明良为儿子取名吴钟华。

他就是后来成为琼崖纵队第一副司令的吴克之将军。

吴克之的父亲虽然只是位普通的农民,但年轻时曾参加过民军反对军阀的斗争,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这对于幼年的吴克之影响很大。吴克之的母亲是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一家三口住在一间半低矮的草房里,家中有5亩地,由于父母亲的勤劳,还能勉强维持生计。

幼年的吴克之个性刚强,聪明好学。父亲望子成龙,五岁即把他送入私塾读书。

吴克之不负父母亲的厚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聪明、乖巧,深受先生的喜爱,并预言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父亲满心欢喜,决心把儿子好好培养成人。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吴克之 12 岁那年私塾毕业,家人本想把他送入新学继续学习,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父亲莫名其妙地得了急病,一时无钱医治,母亲下狠心想卖地为父亲求医,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嘱咐母亲再穷也要把儿子培养成人,由于没钱治病,没有几天父亲就撒手西去了。

母亲也想遵照父亲的遗嘱让克之继续读书,可是本就家境贫寒,父亲生病时又借了一些债,父亲一去世,家中已是衣食无着,看着无可奈何的母亲,懂事的吴克之怎么也不肯继续读书了,坚决要求回家帮助母亲种地。

让儿子长大成人一直是吴克之母亲心中的愿望。

1925 年初,母亲忍痛要求吴克之的外祖父带克之去南洋闯荡,说不定还能谋条生路。

就这样,吴克之跟随外祖父漂泊到了南洋,不料一到新加坡,外祖父又不幸身染重病,不久就抛下吴克之去世了。13 岁的吴克之子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无以为靠,被迫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

不久,吴克之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乡,在他的介绍下,吴克之在一家橡胶园里谋到了一个雇工的差使,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因年龄幼小,他在橡胶园受尽了工头的辱骂和虐待,一年后,他愤然离开橡胶园转到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在这里他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受虐待的命运。现实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憎恨这个不公平的世道,憎恨殖民主义黑暗的社会制度。

但是,幼小的吴克之并没有在受压迫的命运中沉沦下去,相反,这更加激起了他的上进心,他想要多学本领将来为改造这个社会多出一份力。由此,他开始参加华侨工人夜校。



此时,正值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处于低潮,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为了免遭屠杀,纷纷来到新加坡。

华侨工人夜校既隐蔽,又可以较多地接触进步华侨,因此成了革命者比较集中的地方。通过与他们接触,少年吴克之了解到了许多的革命道理,并从中受到启迪。

随着交往的加深,他开始阅读一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刊,并参加华侨工人反对少数华侨反动分子的斗争。为此他多次遭到马来亚当局的怀疑。

不久,吴克失去了工作。

此时,吴克之已长大成人,家乡的母亲思儿心切,多次来信催促吴克之回家,并在家中为他说了一门亲事,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个家。

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吴克之返回故乡并结了婚。但是,新加坡崭新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青年吴克之,婚后不久他就再次告别母亲以及自己新婚的妻子,离开故乡重返新加坡。1929年,由于新加坡当局的迫害以及家人的催促,吴克之遂结束了海外侨居生活,回到了家乡琼山县。

1929年秋,回到故乡的吴克之并不甘心留在家中,通过努力,他考入了琼山县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正是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的时期。琼山的演丰、美兰一带苏区,一片白色恐怖。吴克之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参加进步活动。不久,他就被学校以“赤化分子”为名开除了学籍。

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吴克之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来到广州,但奔波数月后工作仍无着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迫于



生计，投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服役。

1931年，因文化程度较高被调入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所属的广东燕塘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第十九路军任少尉排长，不久就升为中尉连副。

虽然身在国民党军中，吴克之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在燕塘学校学习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并参加了由共产党员符哥洛、陈彭治等组织的“汇众社”的抗日爱国活动。

在国民党军中，他为人正直，不做损害人民群众的坏事，不与反动军官同流合污。对蒋介石发动的“剿共”战争极为不满；对蒋介石聘用德国法西斯军队中退役军官来华，充任国民党军顾问等法西斯行为十分愤慨。

1935年冬，在他目睹了一起反动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残害百姓的罪恶行为后，十分愤怒，于是带领一些思想进步的军人揭发了这起贪污案。结果遭到了打击和报复，被罢免了职务。

吴克之只得重返广州另谋生路。

在这一时期里，吴克之一直在苦苦地觅寻着共产党党组织，希望能直接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决心不再犹豫和等待了，到海南岛去参加琼崖工农红军。

在海南吴克之历时半年，走遍了据说有琼崖红军的大小山川，可是由于当时红军力量弱小，又几经挫折，因此，琼崖红军的活动都是处于秘密状态，根据地也经常转移，没有内线人员的指导根本无法找到红军游击队。



## 2. 营救符哥洛,终于找到了党。营救冯白驹,再次被撤职

1937年夏,万般无奈的吴克之回到了海口,为了暂时找个地方栖身,凭着他曾在国民党军中任军官的经历,他很快被任命为琼山县警政队队长。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全面展开。他坚决拥护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不久,他得知老同学、中共党员符哥洛等被关押在琼山县监狱,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设法将符哥洛营救了出来。就这样,他找到了共产党,并通过符哥洛的介绍,并经中共组织审查,于当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斗争需要,琼崖中共组织安排他继续留在琼崖县警政队坚持秘密工作。

随着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主动给琼崖国民党当局写信。提出琼崖国共两党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表示愿意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以效命于抗日保乡事业。并建议国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当局为了掩人耳目,表面同意我党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10月25日,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及夫人曾惠予下山指导我方代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他们到达谈判地塔市乡演村时已是深夜,于是二人就在一个老乡家中就寝。

第二天天刚刚亮,曾惠予醒来先穿好衣服,正准备叫醒冯白驹时,突然,两个持枪的国民党兵闯了进来。他们一个用枪指着冯白



白驹、实现国共团结抗日的呼声响彻全琼。

旅居海外的广大琼侨纷纷写信、打电报或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释放冯白驹,恢复谈判。

在党中央的直接交涉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琼崖当局被迫于12月无条件释放了冯白驹同志。此后,冯白驹同志便代表特委直接同国民党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遂使谈判时断时续,拖了将近一年,仍没有什么进展。

直至1938年10月22日,国共达成了协议,国民党当局才同意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独立队为一个大队编制,由国民党方面按月发给军饷8000元。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也作了一些让步:独立队一个队副和三个中队副由国民党委派,但人选须经我们同意。

虽然吴克之的方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吴克之的行为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不久即被找个借口撤了职。

此时,琼崖的革命形势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切需要更多的同志到一线领导抗日斗争,因此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吴克之回到了日思夜盼的琼文抗日根据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

### 3. 国民党高级官员惊叹:“共产党游击队中竟有此等优秀人才!”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最后同意红军改编,一是在团结抗日形势下,全岛各界、广大民众呼吁抗日。二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琼崖国民党守备司令王毅感到自己的力量单薄,想利用我党琼崖



红军力量抗战,于是答应了在云龙对红军进行改编。

同年12月,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县云龙墟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下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小队,共300余人。吴克之担任独立队第三中队队长,说是中队,其实就百把人。

队员绝大部分是从儋县来的,来了以后,大多不会说琼文地区汉语,所以只好让其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了儋县,就近从琼山再动员了一些农民参加改编。队员们用的武器也都很低劣,大部分是大革命低潮时埋在地下而又重新挖出来的,还有一些人用的是土制的单响枪。部队除了一些骨干是老红军外,绝大多数是新动员入伍的青年。

红军集中改编的地点和改编成琼崖独立队后的驻地之所以选择在云龙墟,冯白驹认为琼山县云龙墟位于琼山至文昌的公路干线上,交通方便,共产党组织较坚强,群众基础好,是革命老区,有利于战时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方案经特委同意后,红军改编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

12月5日清晨,琼崖的天际出现了一抹紫红色的朝霞,犹如一朵初绽的英雄花;接着,朝霞将海南岛的山、村庄、田野、椰子树……染成玫瑰色,灿亮而壮观。男女老少、姑娘、媳妇从老远的村庄汇集琼山县云龙墟,有的抬着菠萝、椰子、香蕉,有的在敲锣打鼓、舞龙舞狮,热闹非凡。

9时整,改编仪式在云龙墟六月婆庙隆重举行。全体官兵身穿清一色的灰色军服,全副武装,排成三列横队。

队伍整齐威武,指战员们斗志昂扬。

上万名群众和各界人士敲锣打鼓前来祝贺。院内慰问品堆积



如山,写着“抗日先锋”、“人民救星”、“人民先驱”、“人民子弟兵”的锦旗彩匾挂满庙堂;院外爆竹齐鸣,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落,充分显示出广大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拥护和支持,也充分体现了独立队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副司令杨永仁等国民党将级军官也作为统一战线代表前来参加改编活动。

在仪式上,首先由王毅宣布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正式成立的命令,并向独立队队长冯白驹授军旗、印章,之后发表了讲话。紧接着冯白驹同志也代表独立队全体官兵讲了话,表示誓死保卫琼崖的决心,并带领全体官兵振臂高呼“坚决抗日,保卫琼崖”等口号。

最后,举行了庄严的检阅仪式,检阅时队伍由吴克之统一指挥。

吴克之按照正规部队的一套来要求部队、指挥部队,操练起来步伐整齐、口号雄壮。

王毅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完全没有料到,这支“草莽出身”的部队竟然这么训练有素。在场的国民党官员和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直看得瞠目结舌,一问左右,方才知喊口令的人原来是由燕塘军校毕业的吴克之,于是连连感叹道:“共产党游击队中竟有此等优秀人才!”

的确,当时由吴克之指挥的操练是十分成功的。

虽然我军的装备很差,都是那些汉阳造和土造单响步枪,但是指战员都有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具有任何困难都吓不倒的精神,更何况其中的五六十名骨干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来的老同志。



因此,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很好,操练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很有一股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

这就难怪王毅等国民党军政要人惊讶了。

看到我们的队伍那么雄壮威武,广大人民群众十分高兴。

看完检阅之后,塔市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跷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唔!这才是克敌之军,国家和民族的栋梁呢!”

改编后的琼崖独立队军官起初每月可以得到国民党当局下发的几十元薪饷。吴克之等独立队指挥员则将自己领到的这些薪饷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组织,用于全队活动经费。

吴克之担任第三中队队长后,率部活动于琼山县的道崇、三江、苏寻三、云龙乡一带。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武装,完成了组建第五大队的任务,并且协助地方中共组织建立了“青年抗救会”、“妇女抗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扩大了群众基础,为有力地迎击日本侵略军入侵作了充分的准备。

### 4. 指挥斗门村战斗,击毙敌琼崖守备副司

#### 令李春农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同年3月,琼崖抗日独立队扩编为独立总队,吴克之又担任独立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坚决执行琼崖特委和总队关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积极打击日伪军,巩固和发展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

4月至5月,他指挥第二大队奇袭了永兴日军据点和海口市长桥林附近修路的日军,并取得胜利。9月,他又指挥所属第五中



队配合琼崖总队第一大队在罗板铺公路伏击日军,全歼日军十余名,毁军车一辆,并缴获一批武器。在此期间,琼文根据地也逐步扩展到琼山的云龙、咸来、道崇和文昌的甫阳、潭牛等地,革命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1940年1月,吴克之率第二大队掩护特委和总队渡过南渡江,西迁澄迈、美合地区。但这一行动很快被日军觉察,日军迅速由琼山、定安县调动数百人由南北两路向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合围。面对突变的敌情,吴克之沉着冷静,指挥所属部队英勇抗击日军,顺利地保护了党政军机关安全西迁。

为适应琼崖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年9月,琼崖独立总队将活动于琼文地区的第一、二大队合编为第一支队,吴克之担任支队长。主要转战于琼文地区。

12月,国民党琼崖当局制造了震惊全岛的“美合事变”,抢掠了总队历尽艰险由海外运输回来的医药器械,并逮捕了数十名随军的妇女儿童,残杀了100余名琼崖独立总队伤病员。琼崖特委和总队被迫撤出美合,东返琼文。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吴克之根据总队反顽指示,于1941年3月12日,带领支队人马埋伏在龙发和树德之间的罗蓬坡一带,与二支队一道准备伏击前来进犯的国民党保七团第五连、第八连和琼山县游击中队。

拂晓,大地浓雾弥漫,百米开外什么都看不清楚。战士们隐蔽在指定的阵地上,等待着进犯之顽军。

当顽军第八连进入罗蓬坡潜伏区域时,立即遭到独立总队四、五中队的正面迎击,趁此机会,吴克之指挥第一大队从右侧迂回合击。



于是,他立即指挥部队向敌发起了猛攻。顽军感到非常突然,连做熟了的饭都顾不上吃,便仓皇向公路以北逃窜。

吴克之心想,怎么也不能让他们跑掉,于是穷追不舍。这时,支队的一名机枪手看到公路上有个披着黑斗篷的人骑着大马夺路逃命,便架起机枪,一个点射,骑马人应声倒地。

惊恐不已的顽军残部由李紫明领着向锦山海边仓皇败逃。

事后,琼崖国民党顽军披麻戴孝,为李春农大办丧事。这时,独立总队才知道,被我打下马的敌军官,正是琼崖守备副司令兼保安第七团团长李春农。

这个恶贯满盈、直接挑起反共内战的罪魁祸首,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由吴克之等人指挥的斗门战斗,共歼顽敌百余名,其中包括李春农及多名下级军官。

胜利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琼崖大地,抗日根据地军民和琼崖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 5. 拔据点,反扫荡,吴克之抗日逞英豪

在对付顽军的同时,独立总队的领导和战士们时刻铭记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冯白驹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虽然在反共军的进攻下,但是我们必须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击我们惟一的凶恶的敌人”。

美德村处于琼文根据地的腹地,日军在这里设据点的目的是使美德同潭牛、大致坡两个日军据点互为犄角,互相配合对琼崖根据地进行“扫荡”。这个据点的日军时刻窥视着琼崖特委和总队部机关的驻地——咸来、树德两个乡。日军美德据点是一根插在琼



文抗日根据地的毒钉子,严重威胁着特委和总队部机关的安全。

1942年7月4日上午,潭牛30余名日军乘坐两辆军车前往美德据点。冯白驹得知这个情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一、二支队,采取伏击打援的战术,在美潭公路上分点伏击日军军车,继而消灭美德、潭牛、大致坡日军据点出来的援兵。冯白驹命吴克之与马白山分任正副指挥。

在美德,日军驻有一个分队,配有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和其他武器装备,且与驻潭牛、大致坡日军互为犄角之势。冯白驹和吴克之、马白山商定,把两个支队分为三路伏击,首先伏击美潭公路上的日军军车,诱敌出援时再将他们全歼,以拔除日军美德据点。

7月4日早晨,吴克之指挥部队都按照预定的部署设伏。7时左右,潭牛据点的日军30多人乘一辆军用汽车前往美德据点。日军相当狡猾,在行军途中,发现与往日不同,田地里没有一个老百姓干活,于是就在离第二支队设伏地点几百米远的地方下了车。他们不走公路,而是沿着路旁的树林,提心吊胆地搜索前进。当他们发觉有伏击部队时,即迅速组织火力,从第二支队后面发起进攻。情况突变,支队长马白山果断命令部队占据有利地形,以第一大队从正面迎击敌人,第二大队向西拉开,从侧翼打击日军。

吴克之见第二支队与日军已进入战斗,急忙派出一个中队增援第二支队。潭牛的日军遭到第二支队和增援部队的狙击,被迫停止了前进。

不久,两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从美德方向开出来,前后保持三百米的距离,向我第三大队和第六大队的阵地疾驰过来。第三大队长林伯熙当机立断,大喊一声“敌人发现我们了,打!”顿时,阵地上



枪声大作。前面那辆车上的敌人还没来得及跳车，登时被射倒几个，其余的乱叫乱嚷，一个个像火烧屁股似的争着往下跳。后面那辆军车上的日军跳下来早些，脚一着地就没命地向公路两旁散开，机枪、掷弹筒猛射过来。架在车顶上的重机枪也吐出了火舌。前面那辆军车下来的日军趁这当儿，也凭借着路沟和汽车作掩体拼命抵抗。日军的火力渐渐地占了上风。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吴克之率第一支队增援部队赶过来。原来，当吴克之听到美德方向枪声突起时，知道美德据点的日军已经出动，如果不能狙击其增援潭牛之敌，第二支队就难以应付。他当机立断，趁大致坡敌人尚未出动之际，除留少数部队警戒外，紧急率部队前往美德方向，迅速占领坑尾高地，进入战斗。

日军凭借武士道精神和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多次发起冲击，均被吴克之指挥的部队击退。在这场激战中，他的爱人、护士黄梅香不幸牺牲，吴克之强忍住巨大的悲痛，奋勇杀敌，指挥我军前后夹击，美德据点增援日军全部被歼。

在潭牛方向，第二支队与敌人激战一个小时，击退救援美德之敌。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地缩回潭牛据点。

日军随后调遣潭牛、大致坡、文昌、海口等地的数百名日军，在一架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前来增援，寻找独立总队主力决战，结果扑空。

美德之战，是独立总队与日军交战以来两个支队联合伏击、规模较大、缴获较多的战斗。吴克之灵活机动的指挥能力受到了冯白驹等总队领导和所有战士的赞颂。据战后统计，此次战斗共击毁敌军军车两辆，歼敌6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两挺，掷弹筒2具，步枪数10支，还有大批弹药和其他战利品。这次战斗



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大大增强了抗日军民必胜的信心。美德据点日军慑于被歼,于翌日夜间灰溜溜地撤走了。这颗插在琼文抗日根据地的毒钉,终于被拔掉了。

琼崖总队的英勇抗战,有力地撼动了日军在海南岛的统治地位。为了巩固海南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侵略南亚的根据地,日军调集了大量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对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与“扫荡”。吴克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与“扫荡”日军周旋,寻机打击日伪军。经过多次激战,先后在琼山县的大致坡、永兴、塔市、灵山、大林等地区狠狠打击了日伪军,共击毁日装甲车2辆,歼敌100余人。此后,他还成功地截击了9辆日军军车,歼敌40余名,击毁军车3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品。这是继美德之战后琼崖总队取得的又一次较大规模伏击战的胜利。

同年10月,日军发动4000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并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琼山县的许多地区变成了“无人区”。至此,琼文地区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在琼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日子里,条件异常艰苦,经常缺吃少粮。吴克之带领支队各级指战员战胜了饥饿和极为恶劣的环境,经受住了艰难斗争的考验,渡过了难关,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943年1月,为粉碎日军对琼文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吴克之率支队主力越过南渡江,向琼山县第一区、第二区和澄迈县部分地区挺进,开展外线作战,以开辟儒万山(今属琼山县东山镇)抗日根据地。在外线作战中,吴克之指挥部队接连取得遵谭、永兴、福山、才坡、安仁、梁沙、东山、东兴等地区的战斗胜利,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了部分土匪武装的中立。进入儒万山区



后,他派出武工队配合地方中共组织整顿和恢复区、乡两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并帮助建立了革命武装,在较短的时间内稳固了新区。同年秋,他率支队一部进入六芹山,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并配合兄弟支队建立了琼西地区抗日根据地。1944年秋,琼崖独立总队扩编为独立纵队,在此期间,他所领导的支队力量得到新的发展,不断壮大。与此同时,琼文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 6.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吴克之 腾挪有道

琼崖抗战胜利后,吴克之根据琼崖独立纵队的指示,积极部署自卫战争准备。他率领第一支队东进琼文地区,并担任了新成立的琼文临时委员会委员。1946年3月,为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他率支队连续进行了五天奔袭,一举攻克长昌、甲子和定安县的仙沟等三个据点,歼灭国民党军数十人。此后,他又指挥进行了反击国民党军“清剿”的战斗,前后历时三个月,以灵活的战术打击了来犯之敌,积小胜为大胜,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琼文解放区的重点“清剿”,有力地配合了冯白驹等领导的措、临、乐、万、昌、感等地区的自卫战争。

同年4月,中共广东区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琼崖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的指示。吴克之接到通知后,感到北撤事关重大,需慎重考虑,故在纵队未部署之前,他没有向下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由此稳定了部队。同年8月,广东区党委又发出了琼崖纵队准备“南撤”(撤往越南)的指示。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和琼崖纵



琼崖独立纵队首次全军代表大会上,吴克之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作了《典型战斗总结》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琼崖纵队从打小仗到打大仗,从简单的战斗到复杂的战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小部队作战到大部队作战,都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符合琼崖革命发展的规律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所以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针对未来的斗争形势,他又指出,今后要在打游击战的基础上,逐渐向打运动战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情况看,他的报告符合华南实际情况,既是部队战斗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近十年来指挥作战的历史回顾。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将琼崖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吴克之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三总队总队长和政治委员。

同年10月后,吴克之在琼东北和琼东南地区率部继续作战,其间随着部队战斗力的不断增加,仗越打越大,战斗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由此歼敌的数量也不断增加。经过这些大规模的战斗,再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韩汉英部重点防御和相机“清剿”的部署。吴克之所属第三总队下辖的第八、第九、第七支队在独立作战中,前后共歼敌四百余人。

1948年9月,在全国解放战场捷报频传的有利形势下,琼崖纵队决定发动秋季军事攻势。9月28日,担任秋季进攻前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的琼纵副司令员李振亚在万宁县牛漏战斗中不幸牺牲,吴克之奉命继任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他机动灵活,出敌不意,在运动作战中先后攻克了石壁、岭门、乌坡、枫木等据点。在11月12日的中原(今属琼海县)战斗中,吴克之所属部队又成功地攻克了国民党守军的坚固防御阵地,一举攻克了中原据



点。

1949年3月6日,琼崖纵队发起琼崖纵队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春季攻势,吴克之担任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在他的指挥下,琼崖纵队以三个总队共六个团的兵力向琼崖国民党军力量比较薄弱的琼西南地区发起进攻,最后取得了好保墟、临高等战斗的胜利。

3月16日,他指挥部队攻打新州。新州是当时国民党增县政府所在地,驻有县政警中队、县义勇大队和正规军第四七五团一部。该县城墙坚固,工事完备,且易守难攻,是一场攻坚硬仗。吴克之精心指挥并亲自组织突击队,在内应的配合下,秘密进入新州县政府大院,突然攻击城内守军,使敌出其不意,打乱了其防御部署。当守军退守防御工事后,吴克之亲临前沿,组织部队爆破守军碉堡,并采取火攻战法,点着了国民党军的坚固碉堡,烧得守敌无处躲藏。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持续作战,终于攻克了新州,共歼守军3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新州一战取胜后,士气大增。4月19日后,吴克之指挥琼崖纵队主力相继攻克了报板、东方、广霸、热水、海尾、昌化、昌化港、乌烈、沙地、通天、明山等十多个墟镇,并迫使感恩城守敌弃城撤退。至此,除北黎外,昌江、感恩地区全部解放。

在春季攻势中,为攻克崖县九所(今属乐东县),吴克之调用了三个团的兵力围困九所,另外以三个团的兵力埋伏于九所林东的黄金山、龙虾岭一带,待机打援。国民党军果然中计,经过激战,战役取得胜利。至此,春季攻势胜利结束。

春季攻势先后历时三个月,转战半个琼崖。这次战役,琼崖纵



令,大力加强包括雷州半岛、海南岛沿海西起临高、东至乐会在内的防御工事,海陆空机动配合,构成一道所谓“伯陵防线”,吹嘘为“固若金汤”、“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企图以此阻止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海作战。敌军在构筑防线、调整部署完毕后,即按制定的半年“清剿”计划,集中兵力向各个解放区和游击区发动疯狂的进攻,残酷地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清剿”。

在众多敌军向琼纵展开大围攻面前,吴克之和其他琼纵领导镇定自若,仔细分析了敌我情况,在冯白驹的领导下,和琼纵其他领导黄康、马白山一起,研究了新的作战方针,部署各总队、独立团独立作战,根据斗争实际,灵活分散或机动集中歼击敌人。在作战布局上,一总队在西区,三总队在东区,五总队在南区,独立团在北区,以广大农村为依托,广泛发动民兵和群众配合作战,灵活机动地杀伤敌人,在有利的条件下,集中全纵队力量歼灭敌人一营一团,以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

此外,在冯白驹的具体指导下,吴克之要求各级党政积极开展沿海地区群众工作,尤其是船只来往的港湾村庄的群众工作,同时组织发动人民群众抢收粮食、藏好粮食,以便迎接野战军渡海解放琼崖。

1949年12月6日,两广战役结束,华南大陆全部解放。14日,第四野战军首长指示:攻海南岛战役,由第十五兵团担任统一指挥。

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四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之后,两个军于12月下旬陆续开进雷州半岛集结。



琼崖纵队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接应野战军渡海登陆的命令后，立即召开了党政军领导干部研究部署接应大军渡海作战工作。经研究，决定向军委建议四野先以偷渡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琼崖纵队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

12月底，吴克之遂协助冯白驹进行接应第十五兵团分批分次的奇袭偷渡和强渡的指挥和领导工作，由于参谋长符振中一度赴广州和雷州半岛协助渡海兵团工作，所以他既任副司令员，还代理了参谋长工作。当渡海兵团大规模强渡登陆后，他又指挥琼崖纵队配合渡海野战军一举突破了薛岳（海南防卫总司令）吹嘘的所谓“东方马奇诺”的“伯陵防线”，歼灭国民党军3.3万余人，于1950年5月1日解放了全琼。

海南解放后，残留在琼的国民党军和土匪仍有1万余众，是巩固海南解放和建设海南的内患。为了彻底清除残敌，不久他奉命与琼崖纵队陈青山副主任等参加追歼和围剿残匪的作战，维护了社会安定，巩固了海南岛的新生政权和社会治安。

同年7月，琼崖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吴克之担任副司令员。至此，吴克之开始参加保卫海南和建设海南的领导工作。

### 8. 担任防化研究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贡献，却被江青污蔑为“白色据点”

1952年秋，吴克之与华南许多军师级指挥员一起奉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由于受当时华南地区反冯白驹的所谓“地方主义”的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株连,当时吴克之的职级待遇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坚信事情总会弄个水落石出。

吴克之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无私忘我地全心全意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工作中。同年冬天,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并留学院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长等职。

他在教学和领导工作中,坚持从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借鉴苏军的一些有用经验,同时又不生搬硬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学习和借鉴。他主持编审的集团军攻防战术及战役思想教材,既吸收了苏军的成功经验,同时又将人民军队用鲜血换来的宝贵作战经验融合于其中,生动鲜活,深受学院师生的欢迎。

1953年国庆前夕,中央军委要求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派出两个学员分队参加北京“十一”阅兵。经刘伯承院长批准,吴克之担任了该两学员队的训练教官职务。在他为期四个月的指挥和教练下,两个学员队出色地完成了训练和阅兵任务。

1955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吴克之被国防部授予大校军衔(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严格于其他军队,军职指挥员常有授予大校军衔的情况),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他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一心扑在军事教育工作上,教书育人,为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呕心沥血。自1952年秋至1964年春,他在军事教育战线上度过了近12个春秋,为军事学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4年春,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他调任院长。



1968年夏,灾难终于降临到了吴克之头上。原来,吴克之的海外侨居生涯以及传奇般的人生成为审查迫害他的借口。一时间“走资派”、“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员”等罪名铺天盖地而来。大字报贴满了吴克之的家门,各种莫须有的人身攻击也一齐向他涌来。

他被押上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游街批斗,造反派甚至逼他跪在冰冷的铁板上,有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尽管如此,他没有丝毫的畏惧,每次游斗一结束,他就擦干脸上的血迹,回到办公室继续坚持工作。

“文化革命”时期,对吴克之的迫害先后长达9年之久,这使他的身心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76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吴克之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当时他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部副部长。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对他的历史重新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强加于他的罪名至此才彻底得以洗刷。1977年12月,他负责筹备了全军防化科学技术大会,这是一次防化科技战线上的群英会,对“文革”动乱中奋战过来的防化兵广大科技人员,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成为防化科技事业加速恢复发展的起点。

经过文化大革命将近十年的劫难,他幸运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他无疑是又一次新生。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加衷心地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进行拨乱反正的各项工  
作,为开创防化事业的新局面而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他实事求是地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认真落实防化系统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防化科研和机关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吴克之一生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在工作和生活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计个人名利待遇。1982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他离职休养,并配备了专车和公勤人员。但退居三线后,尽管年过古稀,病魔缠身,他仍怀着对军队三化建设事业诚挚的热情和负责的态度,积极参加全军整党运动。他参与和支持《琼崖纵队史》的编写工作,对琼崖革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随后,他以坚强的毅力,带病撰写了长达十余万字的琼崖革命斗争回忆录《不倒红旗》,为海南党史研究留下了详实的革命史料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年9月18日,吴克之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北京逝世,终年74岁。吴克之将军在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身经百战,战功显赫。新中国建立后,为人民军队军事教育和防化兵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海外归侨的杰出代表。

# “两栖战将”叶松盛



1. 叶父赠诗：“亲患未报无须计，需平天下不平人。”
2. 叶剑英安排叶松盛赴延安深造，一代战将终有用武之地
3. 陆军改空军，叶松盛有板有眼；指挥打敌机，荣获朝鲜国旗勋章
4. 亲率空四师驻防广州，为毛泽东护航
5. 咬断牙，打断腿，坚决不揭发叶剑英的“罪行”



## 叶松盛

(1917— )

广东省梅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文化教员,七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团总支书记,淮南路东联防司令部特务营政治教导员,盱眙总队政治部副主任,路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二师独立第五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淮南军区独立旅第三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炮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空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 1. 叶父赠诗：“亲患未报无须计，需平天下不平人。”

叶松盛祖籍河南，曾祖父为前清秀才，后全家南迁广东定居在梅县。

1917年10月26日，叶松盛出生于梅县西街的十甲尾。不久，父亲即去南洋做华工，后定居印度尼西亚。由于父亲勤奋好学，刻苦自学了英语、珠算和其他文化知识，为其谋取职业创造了一定条件。在印尼玛琅定居后，他开始在一家商店充任会计，后以自己的勤勉独立经营起小商业，生活日渐小康。

叶松盛从懂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在南洋漂泊的父亲，他脑海中关于父亲的形象，是在母亲所珍藏的父亲相片上得到的。以后，他的两位叔伯为了谋生，也漂洋过海投奔了他的父亲，并从此定居异乡。

叶松盛幼时靠海外父亲的供养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并进入了梅县中学继续读书。他学习十分刻苦，除了认真掌握所有课程的知识外，为了能早日见到父亲，他还一直坚持自学英文，由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黑暗贫困，由于生活的困苦，又由于父亲在海外的召唤，于是母亲带领叶松盛告别了家乡梅水湖滨，赴印尼玛琅与父亲团聚。

在印尼玛琅，叶松盛被送入了玛华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殖民主义的种族歧视以及当局的反华排华政策的影响，在学校使用中文是要处以罚款的，因此在课堂中，教师和学生都必须使用英语。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对于这样不公正的境遇叶松盛十分愤慨,深深地感受到了华侨在国外的屈辱地位。他为此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开始了抗争。

一次,当一些印尼人在谈到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时,竟伸出小手指声称,中国人就如同小手指一样没用时,他义愤填膺,马上声辩道:中国人中有马占山将军,有那么多抗日义勇军,并伸出大拇指说:“中国人了不起,应该是这个。”以此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他还针对学校不准使用汉语的排华规定,偏用汉语讲话,使一些华侨学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叶松盛从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发展到了开始参加各种学潮活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并且在思想上日渐成熟。

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叶松盛见到了父亲的一位挚友朱天任。朱天任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叶剑英的早期同学、密友,大革命失败后遭国民党当局通缉。为免遭毒手,他远走印尼,现在靠教书谋生。

叶松盛是挚友之子,又是个热血进步青年,朱天任非常喜爱,两个人一见如故。

在朱天任的教育和指引下,叶松盛明白了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光明所在和抗日圣地在延安。渐渐地,在叶松盛的心头萌发了回国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念头。

叶松盛希望归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愿望得到了为人正直、正义感极强的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他同意叶松盛放弃家业和遗产继承权,决心把自己的长子送回国内,送到中国最民主、最平等、最光明的革命大本营延安去。

他在后来从印尼寄给叶松盛的信中所写的一首诗里有两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很快,组织上就安排叶松盛与其他一些华侨青年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叶松盛被分配到了一大队军事队。

在抗大这所大熔炉里,他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军政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极大地焕发出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热情。

叶松盛学习认真刻苦,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入校的第一天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年的10月,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5月,为加强华中新四军斗争力量,中共中央组建南下华中干部队,抗大在学员中进行了动员。

叶松盛主动要求随干部队南下,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他提前毕业,并被任命为抗大一大队军事队南下干部队的党支部书记。

叶松盛眼看着就要投身血与火的抗日战场,心情无比激动。

经过几天的准备,叶松盛告别了战友,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进入华中地区后,叶松盛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由于叶松盛的文化水平较高,所以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文化教员,不久就被任命为四支队七团宣传干事。叶松盛的理论水平高,革命热情更高,工作积极主动,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受到部队上下的一致好评,半年后就担当起宣传股长的重任。

1941年2月,叶松盛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旅第十团党总支书记,工作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淮南军区特务营政治教导员。不久,又担任盱眙总队政治处副主任。

1942年新四军进入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3月,叶松盛调任路东独立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7月,出任该旅第五团政治处主



任。1943年10月,他又调任路东独立旅第三团(后改称路东军分区第六支队)政治处主任。

在频繁的工作变换中,叶松盛干一行爱一行,所到之处,受到部队干部战士的高度赞扬,为新四军的基层部队的部队建设以及政治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1943年年底,叶松盛奉命进入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叶松盛在繁忙的战斗生活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尽管自己的文化水平较高,但是,时常感到自己政治理论水平的不足,很想利用这一次进党校学习的机会,努力学习,好好提高一下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以利于今后回部队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就在叶松盛在党校学习期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叶松盛以学员身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

整风之初,他抱着对党的忠诚,努力查找自己身上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经常在会上做自我批评,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却成了叶松盛的“罪状”,加之他是华侨出身,受到了一些人恶意的批评,这使得叶松盛受到了很大打击。

投身革命五年多来,在工作中虽然也遇到一些挫折,但是,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恶意批评还是第一次。他一时难以接受,思想负担也很重。

幸亏,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及时纠正了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澄清了一些问题,使整风运动重新走上正规,也使叶松盛免遭更大的不幸。

叶松盛经受住了整风运动的考验,最终问题也得到了澄清,学习积极性更高了,政治上也更加成熟起来。

1944年3月,叶松盛从华中局党校毕业,被安排到新四军政



治部组织部干部科,负责新四军的审干工作,他把自己在华东党校学习的切身感受引以为戒,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掌握好政策界限,避免伤害无辜的干部,为保护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全军上下的一致好评。

1945年5月,叶松盛结束了一年多的审干工作,再次调中共华中局军事高干班学习。

同年8月,在大反攻时,重新回到了老部队淮南独立旅第五团,继续担任政治处主任。

在华中敌后根据地期间,叶松盛先后参加了淮南津浦路西、路东反日伪军“扫荡”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的作战。在战斗中,他善于配合军事进攻而展开政治攻势,在瓦解伪军工作中起到了明显效果,并为此总结出了大量战时政治工作成功的经验,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好评。

解放战争爆发后,叶松盛所在团为反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参加了淮南保卫战,给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

战后,叶松盛担任了该团副政治委员。不久,即调任新整编的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副政治委员、团党委书记。并参加了苏北涟水保卫战,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进行了首次较量。

由于敌七十四师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我军力量分散,敌强我弱,让国民党这支王牌部队占了涟水,六纵损失较大,迫使华野放弃涟水之战,北上山东。这一直成为华野部队的一块心病。

1947年2月,叶松盛被任命为六纵特务团政治委员并继续担任团党委书记。2月28日华野发起了莱芜战役,叶松盛率领特务



团随纵队担任莱芜外围设伏的任务。莱芜守敌固守一天后，待援无望，向吐丝口方向突围，正好进了六纵预设的口袋，叶松盛与战友指挥部队奋勇杀敌，特务团就歼灭、俘获敌人 2000 多人。

莱芜战役后，叶松盛调任第六纵队炮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再次与老对手、老冤家，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交手。

战斗发起之初，叶松盛充分发扬炮兵火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有效地支援了步兵部队的战斗。

战斗持续到 16 日下午，突然阵地上枪声停了下来，前沿不断传来敌第七十四师已经全部被歼的消息，参战部队已经在打扫战场，准备下山。但是，野司认为，各部队上报的敌伤亡数字与七十四师的编制人数出入较大，要求各部队加强侦察，务必全歼。

叶松盛接到这一通报后，仔细研究周围的地形，发现六〇〇高地与孟良崮之间的谷地十分可疑，可能藏有敌人的残兵。

经过请示上级批准，叶松盛组织炮兵火力对该谷地进行了火力侦察，藏匿的敌人的战马首先受惊，这个谷地果真藏有敌人七千多人，伺机逃窜。

此时各纵队已开始抽调部队转赴其他战场，剩余部队都向谷地冲去，此时炮兵火力已经难以发挥作用，经过请示，叶松盛把炮兵团整编为一个加强营投入了战斗。

当面之敌是敌人一建制较为完整的团，叶松盛指挥部队猛打猛冲，创造了一个营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团的战绩，并率领部队最先登上孟良崮，攻克了张灵甫指挥所，缴获张灵甫司令部全部作战指挥器材。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叶松盛又率领炮兵团随六纵队转战山东、

## “两栖战将”叶松盛



为适应新任务的需要,叶松盛到处奔波“招兵买马”。从上海、南京等许多大中城市招收了一批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为部队发展和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1年5月2日,总队奉命率一团、二团进驻吉林省公主岭机场。

经过紧张的筹备,总队于5月31日正式改编为空军第十五师,师长黄玉庭、政委崔文斌、参谋长刘金才、政治部主任叶松盛。

早在1月已任命吕茂堂为飞行副师长,并指令他带二名飞行副团长、四名飞行大队长先期到达公主岭,开始熟悉机场区域飞行。

全师下辖四十三团(由一团改称)、四十五团(由二团改称)和四十三、四十五两个供应大队。团营主官干部职务不变,各团增设一名飞行副团长,师团机关的科、股、室多数是原来的,少数按飞行部队的需要增设。航校调来的32名飞行员,分给四十三团和四十五团各组成一个飞行大队。

6月,根据空军指示,又将十五师原已训练了一段时间的24名飞行员调给了空六师。7月初接收六、七航校毕业的飞行员46名和飞行大队干部2名。7月中旬又接收了三、五、六、八航校毕业的地勤人员493名,这时每个团各组成三个大队,全师总人数达3148人,其中党员1319名,占百分之四十一,团员593人,占百分之一十八点四,部队有较好的政治素质。

9月15日接收了苏军的飞机八十四架,各种车辆以及飞行保障器材。此时,全师人员充足,机构健全,装备也比较齐全,按上级要求完成了组建任务。

陆军部队经过整编重组,广纳人才,优化结构,添置武器装备,



健全指挥体系,成为一支地地道道的空军部队。

这也算得上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在整个部队组建过程中,作为师政治部主任的叶松盛除了做好日常稳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考察、选调各类人才,结合飞行部队的特点制定各类政治工作及安全防事故规章制度等等,为稳定部队,做好改编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正当空十五师组建期间,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10月下旬,叶松盛所在空十五师奉命参加抗美援朝,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序列,代号为二〇五部队。

这对于一个刚组建不到半年的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当时,摆在全师指战员面前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进行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二是学习航空技术、开展战前练兵,提高作战能力。

叶松盛以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这两项主要工作中去。他在师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带领政治部全体同志制定教育计划、安排教育内容,还亲自组织编写教材、油印讲义,为部队提供各种教育、学习材料,叶松盛还经常带领政治部机关的同志深入到飞行一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发现典型,总结飞行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

经过叶松盛等人的多方努力,全师调入了不少各类航空专业人才,但是,它的主体人员仍然是陆军,因此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主要任务是学习空军的专业知识,叶松盛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努力向友军学习,尽快由外行变内行,五个月能担负本职工作”的



口号。全师上下掀起了学习航空的热潮。

6月至9月,主要向苏军学技术,学业务,学习组织飞行的程序和方法。9月15日以后到年底,以我方为主,在苏联顾问指导下组织飞行训练,到11月底,完成了六千米以下单机到大队的基本训练,进入了团的编队训练课目。

1952年1月12日,师部率四十三、四十五团开赴大孤山机场,进行战斗课目的训练,主要是协同编队、大速度飞行、单机复杂特技和突击性的敌前战术训练。

为了搞好有针对性学习与训练,叶松盛还建议并亲自组织一批政治工作干部以及飞行干部到先期参加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绩的空四师学习、取经,学习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和作战指导思想,学习上级有关指示和战术原则,提前完成了战区试航任务。

为了加强作战指挥和外场保障力量,充实师指挥所和塔台的工作人员,叶松盛还大力协助司令部门制定了战时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同时,调整了战斗组织,两个团把技术较好的飞行员各编成一个大队,先参加作战,技术靠后点的飞行员加紧继续训练,准备补充。

当时,美空军,无论在兵力、装备、飞行技术、实战经验等方面都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占优势。而十五师的飞行人员,陆战拼过刺刀,立过战功,但是空战一天也没有打过,在喷气战斗机上仅飞过20多小时,只初步掌握基本驾驶技术,还没有飞过复杂气象,甚至连空靶也没有打过一次。

刘亚楼司令员和空联司刘震司令员都有些担心,亲自询问师领导:“队伍能不能上去参战?”

师领导坚定地回答:“可以上去!兄弟部队能打下飞机,我们



也可以学嘛！”

年轻的飞行员们纷纷表决心：“敌人技术高，咱们觉悟高。”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军营里不断唱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的雄壮歌声：

这样一种精神状态除与当时的全局形势分不开以外，也是叶松盛等人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2月19日开始打小仗，这是空十五师第一次升空作战。

上级要求十五师先在兄弟部队空四师带领下作战，后单独作战，先打性能较差的轰炸机，后打性能较好的战斗机。但因飞行员初次参战，几次战斗出动都没有发现敌机，或发现了终因双方高度差太大，也打不上敌机，大家都很着急，加上发生几次飞行事故，有些同志便产生了埋怨、急躁情绪。

为此，师党委提出“澄清思想，消灭责任事故，争取打下敌机”的口号，发动党、团组织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坚定信心。同时发扬军事民主，组织飞行人员献计献策，研究搜索敌机的各种方法，提高目视搜索能力。叶松盛更是把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宣传鼓动工作做到了一线场站。

3月20日，是十五师指战员难忘的一天。四十五团一大队在空四师十二团一大队掩护下升空作战，很快发现八架F-51飞机。林广山副团长连续攻击四次，首开记录，击落一架F-51飞机；一大队长樊玉祥勇敢接近敌机到160米开炮，又击落一架；中队长孙忠国也击伤敌机一架。

这次战斗，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首战告捷。

顷刻间，军营里一片欢声笑语，人人喜气洋洋。

## “两栖战将”叶松盛



叶松盛率领政治机关的同志及时对获得的这一战果进行了总结表彰,克服了畏难情绪,增强了信心,大家都期望再次升空作战,自己也打下敌机。

3月24日,四十三团团一大队与空四师十团二大队会合,迎击清川江上空八架F-80飞机。

飞行员韩德彩随长机攻击四架F-80飞机时,机警地反击威胁我机的另四架敌F-80飞机,将敌长机击落,再继续攻击,又击落敌机一架,为四十三团首创战绩。

战后,叶松盛根据师党委的计划组织召开了祝捷大会,号召全师再接再厉,打下更多敌机,创造更大胜利。

4月中旬,部队开始单独作战。22日那天,四十五团起飞14架飞机打敌F-86,孙忠国双机向攻击我机群的四架F-86反击,变被动为主动,击落一架敌机,但僚机反击另四架敌机后,却丢失了长机。孙忠国追赶部队,途中摆脱了四架F-86的攻击,后面又来了四架,他突然蹬舵拉杆,将冲到他前面的一架敌机击伤,但又遇到另外敌机的攻击,自己飞机中弹无法操纵,跳伞后负重伤,右腿折断。孙忠国脱险住医院后,忍受极大痛苦,钢条穿骨三次,才把骨头接上。他一面治疗,一面锻炼腿的功能,经八个月的努力,终于恢复健康,获准“飞行合格”,重新驾驶战鹰飞上蓝天。同志们赞扬他是好样的,纷纷夸他是“中国的无脚飞将军”。

5月4日,四十三团出动一个大队到平壤上空作战,该地区云量10,云高分为7000、3000、1500米三层,这对于没有飞过复杂气象的我机来说,只能凭飞行员的勇敢了。当飞机快到平壤时,地面指挥所通报高度3000米有FMK-8敌机,我机群穿过两层云,下降到2000米,掩护队长机王世臣发现敌机,总领队杨贺荣副团长



灵活机智地指挥,命令掩护队攻击,攻击队掩护,狠狠打击敌机,取得了击落 FMK-8 飞机 2 架的战果。

5月8日,四十五团出动 14 架飞机到平壤上空打敌小群机,经新义州、安州到平壤北。二号机李世英在 5000 米外发现敌机 180 度左转弯,正好便于我机群接近敌机,领队长机林广山命令二号机引导机群接敌,分掩护队和攻击队,下令返航时还规定航线和集合地区。飞行员英勇攻击,空战 5 分钟,有 8 人开炮,击落击伤 F-86 飞机各 1 架,击落 FMK-8 飞机 2 架。

空十五师经过四个多月的英勇作战,空战八次,共击落敌机 11 架,击伤 3 架,初步学会了在简单气象条件下,打敌中小机群的本领。1952 年 5 月 12 日撤回公主岭休整,准备再次参战。

部队到二线后,叶松盛不失时机地率领政治机关的同志认真组织评功、庆功活动,总结作战经验,把宝贵的经验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各飞行大队在师党委的统一安排下,从难从严组织战斗课目的训练,同时培养从二十一师调来的 18 名新飞行员,在完成米格-15 飞机的改装训练后,与老飞行员编在一起进行训练。

在部队休整的过程中,1952 年 6 月,叶松盛接到了他升任空军第四师政治委员的命令。此时空四师已经结束了四处朝鲜的作战,转场至辽阳休整。刘亚楼司令员曾说过:四师大小仗都打了不少,有较多的经验和体会,战斗力有很大提高。现在准备将四师转回辽阳,齐装、满员、全训以后,调至全国中心位置——武汉地区驻防,作为空军战略预备队,以便向各个方向机动。今后,无特殊需要,则不再调赴安东一线作战。叶松盛接到新的任命后,立即移交了工作,赴辽阳上任了。

空四师转回辽阳后,一面担负二线防空和支援一线作战,一面



桥、西海岸阵地等重要目标,采取提前起飞,小编队连续出动,超气象(云量 10、云高 1000 米以下),超技术(团以下各种编队穿云)作战,伸到清川江以南。

空四师进驻大孤山后,于 4 月 17 日打了第一仗。当日上午,十团团长邹炎率八机起飞,编队直插博川,与 30 余架 F-86 遭遇。在混战中,虽击落击伤敌机 3 架,但自己也被击落 3 架,不够理想。经过总结,接受了教训,注意了集中兵力,密切协同,故 24 日和 30 日十二团的两次战斗都打得比较好。

5 月份,敌人利用复杂气象,对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系统、水利灌溉系统、军事防御系统和军队补给系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破坏。

空四师协同友军和兄弟部队抗击敌人的轰炸活动,采取小编队连续出动,进行超气象、超技术作战,频繁突破 F-86 的“阻击屏幕”,深入到平壤一线打击敌人。

7 日,十团团长邹炎率十二机到泰川打敌轰炸机,与 20 多架 F-86 遭遇,由于指挥得当,机群协同较好。机群新飞行员陶伟紧追一架 F-86,在格斗中将飞机倒扣过来瞄准,在 120 米的抵近距离上将敌机击落。

26 日午后,十二团团长陈亮率 12 机到龟城协同友军作战,与 30 余架 F-86 激战。这一仗也打得很好,击落敌机 4 架。新飞行员任峰打得顽强,只身被 4 架敌机围攻,在格斗中两次坠入不明状态,改出后仍英勇反击敌人,击落敌机 1 架。

6 月份,战区雨季来临,天气变坏,经常云量 10、云高 500 至 1000 米。敌人利用复杂气象加强活动,F-86 带弹伸到铁山、南市、义州区域轰炸。志愿军空军与友军协同作战,保卫重要目标。



空四师两个团由邹炎、陈亮、张积慧、李永泰、耀先、椿福田、陈恒等分别领队，于13日、19日两次在铁山半岛和南市地区与近200架企图轰炸鸭绿江桥及新义州的敌机展开了激烈的大空战，打退了敌机的进攻，保卫了江桥。

7月份，安东和朝鲜北部阴雨天气对我不利，敌人利用复杂气象频繁袭击鸭绿江以南的目标，志愿军空军多作云下作战。十二团于16日在铁山上空空战，击落敌机一架。19日，四师协同兄弟部队在新义州南面与200余架敌机进行空战，击落敌机3架。这是空四师在朝鲜战争停战前的最后一次空战，也是空四师第五次作战的最后一次空战。空四师第五次作战，历时4个月，空战3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8架。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军委空军的嘉奖，叶松盛本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 4. 亲率空四师驻防广州，为毛泽东护航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叶松盛率空四师（后改番号为空一师）驻防东北鞍山，保卫东北钢城的安全。

1953年冬，空军司令部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次年毛主席将赴广州视察，要求空军做好防空安全工作。空军党委接到这一批示后，立即专门召开党委会进行了研究，认为空四师是空军最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部队，经过多次实战考验，战绩辉煌，而且装备优良，广州时常有美制蒋机入侵骚扰，为保障毛主席视察广州时空防的绝对安全，空军党委决定调空四师南下，接替空十八师驻防广州。

叶松盛在接到空军党委的命令后立即召开了党委会，统一了思想，决定坚决执行空军党委的命令，用最快的速度完成移防广州



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个月后,叶松盛就率全师主力由东北紧急转场至广州、佛山等地。

部队从组建开始就一直在东北,而且长期在战争的环境中,现在初到南国的大城市,社会环境复杂,空情不熟悉,而此番南下广州任务重大。师党委一班人在叶松盛的带领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心认真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师广大指战员要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

与此同时,部队还进行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针对驻地靠近大城市、面临港澳的特点,提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腐蚀。

叶松盛时时告诫全师指战员此次任务的光荣与艰巨,带领全师认真熟悉空情,熟悉当面之敌的情况,加强各种有针对性的训练,确保防空作战任务的万无一失。

毛泽东主席在对南方视察期间,全师高度戒备,各级指挥员全部吃住在场站,作战飞机全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蒋军空军听说是空四师南下广州驻防,除在外围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以外,根本没有敢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空四师圆满完成保卫毛主席视察南方的任务。

随后,空四师又按照原定计划,由华南北上鞍山,继续担负保卫祖国重要钢铁基地——鞍山的任务。

早在空军建立初期,根据中央指示,为打击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的袭击破坏活动,空军就开始在福建地区进行作战准备。

1957年12月,毛主席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作出“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指示。空军



和福州军区、福建省委负责人共同讨论了空军入闽作战的方案,为隐蔽我作战企图,提出了“分批进入,逐步推进”的方法,并确定了空军首批入闽作战的部队,即空一师、空三师、空九师、空十六师、空十八师。

1958年夏,叶松盛再次奉命率全师南下,参加空军入闽作战,在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指挥下,开始了福建前线人民空军史上规模最大的空战。

1959年12月,叶松盛被任命为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1年结业后返回广空,立即投入准备粉碎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战备活动,同时奉命赴惠阳地区统一指挥当地陆军和空军有关部队的作战行动。

1963年,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叶松盛为广州空军政治部主任,并担任了粉碎国民党空军空中侦察活动的粤西炮群的主要领导成员,主持政治工作。1964年,他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

### 5. 咬断牙,打断腿,坚决不揭发叶剑英的“罪行”

由于担任了大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工作后,对军委空军主要领导人接触和了解日益增多,故在工作中他对林彪的死党、时任军委空军政治委员的吴法宪对待抵制其错误行为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专制做法产生了疑问,并认为这是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的错误做法,必须纠正。为此,他在自己分管的工作范围内,对吴法宪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并利用工作之便先后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丛书

## “两栖战将”叶松盛



中获取所谓揭发叶剑英的“罪证”。为此,他们不惜使用暴力,将叶松盛折磨得遍体是伤,腿被打断致残,身心遭受到了极大摧残。

即使这样,叶松盛硬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就在叶松盛身陷囹圄中,吴法宪一伙的黑手同时伸向了他的家人。叶松盛的夫人被关押并遭到非人的折磨,致使身受重伤。子女全部受到株连,不许参军,不准入党,不准上学。叶松盛的弟弟原为空军第十五师的干部,因哥哥的所谓“罪行”也受到了株连。

1969年6月,叶松盛被“下放”到四川峨嵋机械厂内部控制劳动,后又被送往江西南昌洪都机械厂任控制使用的“党委书记”。

1973年,中共中央军委在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后,初步甄别了空军系统的重大冤案。在此期间,撤销了对叶松盛的审查并结束了对他的“内控使用”。但所谓“反革命”的帽子却未能最后摘除。

1974年3月,他重新回到了离别八年的广州军区空军领导岗位,担任了广空副政治委员,并参与领导了援越抗美作战和落实中共干部政策以及恢复部队战斗力的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主持了广州空军的清查工作,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叶松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委空军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空军的政治部领导工作。

1979年1月24日,当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决定为1968年在空军两期“学习班”上遭受林彪、吴法宪诬陷和打击迫害的领导干部以及遭受株连的亲属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之后,叶松盛及其家属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才最后得到昭雪。此后,总政治部和空军党委还对他专门作出复查平反结论,推倒了林彪、吴法宪之流对叶



松盛的所有诬蔑不实之词。

1980年,忘我工作的叶松盛因劳累过度患重病住院,经医院两次全力抢救才脱离险境。1984年出院后不久,奉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派,任中共中央驻上海市整党联络小组副组长。此后因工作辛劳再度发病休息治疗。是年底,叶松盛离职休养。

离职休养后的叶松盛,仍十分关心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并且保持着华侨老将军那么一种勤劳简朴、精明细致的特有风貌。

# “黎乡之鹰”陈青山



1. 告别病重的父亲,只身逃往新加坡
2. 刚出虎穴,又入狼窝,陈青山带领难友机智越狱,成为琼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3. 与少数民族首领“歃血为盟”的动人故事
4. 冯白驹破例为陈青山的婚礼批了十块大洋,陈青山感激地说:“司令员,我们的婚礼太隆重了。”
5. 接应四十军渡海登陆,为解放海南岛铺平海上通道



## 陈青山

(1919— )

福建省惠安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第一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琼崖独立纵队先遣支队政治委员,中共琼崖西区地委副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共琼崖东区地委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 1. 告别病重的父亲，只身逃往新加坡

1938年深秋。

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一位年轻人正守着躺在床上的一位老人不停地流泪。老人看起来已病得不轻。

只见他骨瘦如柴，面色苍白，不住地咳嗽，年轻人则不停地给他捶着背。

这时，门“咣”的一声被撞开了，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一位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由于跑得匆忙，已上气不接下气。

他一边比划一边急促地说：

“……陈……青山，快……快……快走，他……他们……要抓你……”

这位叫陈青山的人顿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作为槟城、吡叻、吉打三大洲学生抗日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早已引起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注意，不久之前，他就曾受到殖民当局的拘留审查。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只好先释放了他。

这一次，反动派是真要下毒手了。

党组织通知，陈青山马上离开此地。但是面对病重的父亲，他只好冒险偷偷地跑回来一趟。这时，那位学生已缓过气来，着急地说：“你快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老伯这里有我们照顾呢！”

此时，躺在床上的老人虽已说不出话来，但心里也明白出了什么事，他吃力地举起一只手，指着门口不放下。陈青山明白，父亲在让自己快跑。

可此时此刻，自己又怎么忍心离开呢？可不离开，又怎么办呢？如不走，不仅自己会遭不测，照顾不了父亲，而且党组织交给



自己的任务也完成不了,陈青山真是心如刀绞。

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多想,只好交待自己的同志一番,在床前给父亲磕了个头,急忙离开了。

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陈青山乘上了去新加坡的轮船。

一路上,他悲痛欲绝,泪水不停。这一走,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能见到父亲吗?

父亲这么些年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可自己又为父亲做了多少事呢?整个旅程,他就这样呆呆地坐着,回想着自己与父亲的一幕幕往事。

1919年10月,陈青山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洛阳镇陈垵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陈荣火。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带着他的大哥离开家乡,远走南洋,流落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靠拉人力车谋生。

1922年,惠安发生了严重的瘟疫,由于缺医少药,陈荣火的母亲和三个哥哥先后被夺去了生命。父亲得悉家中噩耗后,匆匆由槟榔屿赶回家乡。料理完亲人的丧事后,父亲含泪将幼小的陈青山带到槟榔屿。

在黑暗的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漂泊到异乡的华侨命运同样也很悲惨。

陈青山的父亲在槟榔屿的职业是黄包车车夫,每天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四处奔波,即使这样也挣不上几个钱,难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只得将陈青山的大哥送回家乡,以种田为生。可怜的大哥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全家七口人最后只剩下陈青山父子俩在槟榔屿相依为命。父亲日夜的勤劳,终于换



来了些许积蓄,陈青山9岁那年,父亲又为他找了位继母,并开了家咖啡铺赖以养家。为了让陈青山学点文化,将来能够找个好的出路,全家省吃俭用,供陈青山入私塾读书。陈青山也深知自己上学的不易,因此学习非常刻苦,在全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槟榔屿陈氏祠堂的董事长陈汉文见陈青山聪明好学,有培养前途,于是提出愿以祠堂的名义资助陈青山继续读书。就这样,陈青山的父亲便将他从私塾转到中华中学就读。

1935年,陈青山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华中学的高小部毕业。陈汉文等人又将他送往槟榔屿钟灵中学继续读书,这是一所马来亚华侨创办最早的著名学校。在钟灵中学学习期间,陈青山学习更加刻苦用功,学业成绩十分优异。

由于思想进步,为人正直,乐于助人,陈青山被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

在学校学习期间,陈青山的业余爱好就是打乒乓球。与学习书本知识一样,对于打乒乓球他同样倾注了十二分的热情,勤学苦练,因此,在多次比赛中他都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九一八”事变后,马来亚半岛华侨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陈青山所在学校也积极响应“马来亚槟城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号召,成立了“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的爱国组织。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义演义卖活动。

陈青山从一开始就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学运骨干。

马来亚共产党钟灵中学支部负责人陈文庆见陈青山家庭出身贫寒,为人诚实,办事精明,就将他作为骨干来培养,经常向他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故事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并



同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以及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这种学习和交流使陈青山得到很大的教益,懂得了身为炎黄子孙,应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而且他深信,人生的根本价值在于要心系祖国,为祖国的振兴有所贡献。现在,自己的祖国正在蒙受苦难,作为海外游子,应为国家兴亡奉献绵薄之力。

从此,他更加自觉地参与“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抗敌后援会”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参加活动过程中,陈青山渐渐地接触了一些共产党的知识。

在陈文庆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陈青山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在“抗敌后援会”组织抗日救亡斗争的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共产党主张的正确与伟大。由此,心中暗生要当一名共产党员的强烈愿望。

1936年年初的一天,当陈文庆向陈青山介绍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壮举时,陈青山情不自禁地抓住陈文庆的手说:“我要是能够回国,做一名冲锋陷阵的共产党员就好了!”

陈文庆对他说:“在海外你同样可以参加献身祖国的抗日斗争事业。”并表示愿意介绍陈青山加入共产党。同年3月,陈青山光荣地加入了马来亚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华侨共产党员。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由马共组织的支援中国抗战的各项工作也越来越紧张。

陈青山受马共的委托,负责学校的“抗敌后援会”和全槟城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工作。不久,他又担任了“槟城各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1938年他代表槟城学生到新加坡参加了全马“学抗”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全马学抗会常务委员,分工主持北马

## “黎乡之鹰”陈青山



(檳城、吡叻、吉打三大洲)学抗的领导工作,并担任马共檳城市委常委。

陈青山在父亲病情日益加重之时,一些好心的邻居劝他少管社会上的事情,好好在家伺候父亲过几天舒心日子。

陈青山看到父亲日见衰弱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他认为从事抗日爱国运动,正是为了千千万万与他父亲一样的受苦人不再受苦的一项伟大事业,自己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父亲的病要治,但自己肩上的担子也不能放。于是,他一面安慰病中的父亲以及为他担忧的亲友,一面继续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直到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

陈青山走后,马共党组织和好友帮助他为父亲治病,可他的父亲已病入膏肓,没多久,就去世了。

党组织和亲朋好友帮助料理了老人的后事。当在新加坡的陈青山得知父亲离开人世的消息时,悲痛欲绝,但是,他很快又调整好情绪,把痛苦深深埋在心里,为了党的事业继续忘我地工作。

1940年初,陈青山担任了星洲总工会宣传部长、马来亚总工会《前锋报》主编,不久又担任了总务(主持人)。

为了紧密配合国内抗日战争,反对英国殖民当局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马共新加坡市委决定领导各界工人和爱国华侨、青年学生开展大规模的罢工和罢课斗争,并决定委派陈青山担任总指挥。

5月1日,声势浩大的华侨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开始了。面对觉醒的人民大众,英国殖民当局惊恐万分,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马共党员及爱国华侨和工人、学生被捕。陈青山也没能幸免。

在监狱中,他多次受到拷打审讯,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失业青



年,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英国殖民当局只得以马共嫌疑分子的罪名判处陈青山半年监禁。虽然身陷监狱,但革命的活动并未中止。

正是在监狱里,陈青山见到了马共中央负责人杨少民、张理等同志。在杨少民的领导下,监狱中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杨少民出狱后,陈青山接任书记,继续领导难友们坚持斗争。

服刑期满后,殖民当局宣布陈青山等 300 多名华侨政治犯和刑事犯为不受欢迎的人,分批驱逐出境。临行前,马共中央派专人找到了陈青山等人,交待了到香港后接转组织关系的手续,并指定陈青山负责组织领导工作。

### 2. 刚出虎穴,又入狼窝,陈青山带领难友机智越狱,成为琼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1941 年初,陈青山被押送到了香港。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在香港的联络地点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到了香港后陈青山按照马共中央交代的联络暗号以及联络点已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此时,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与英国殖民当局秘密协议,将陈青山等一批抗日爱国华侨由新加坡引渡至中国国内乐昌县的“华侨训练班”(即集中营)继续看押。有些华侨爱国青年在此甚至被秘密杀害。

在乐昌华侨训练班,陈青山秘密组织越狱准备活动。在一次“训练班”组织“观光”的有利时机,他带领部分难友机智地摆脱了国民党看守人员的看管,经韶关、桂林辗转至湛江,终于找到了当



地党员杨少民和张理等同志。

在杨少民的帮助下,经中共南方局审查批准,恢复了陈青山等人的党组织关系。

找到党组织后,陈青山即向党组织提出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但党组织负责人却说:“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最近指示我们,要组织一批华侨和知识青年去海南岛支援冯白驹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你既是华侨,又是知识青年,应带头到海南去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当听说是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时,陈青山立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到琼崖去参加抗日斗争。

陈青山抵达琼崖抗日根据地后,立即受到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副总队长庄田、参谋长李振亚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与亲切接待。

冯白驹鼓励陈青山等人在琼崖为抗日战争和今后根据地的华侨工作作出贡献,使陈青山等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不久杨少民担任特委组织部副部长,陈青山被安排为总部宣传科科员。

参加抗日根据地公开武装斗争,对陈青山来说,是由地下秘密斗争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由城市生活转入农村生活的一个极大转变。

艰苦的海岛内的高山丛林生活对陈青山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然而,他努力学习并逐步适应了自己过去不熟悉的工作环境,很快掌握了斗争情况。他认真学习海南方言,很快学会了用海南话与当地群众对话,并能够用海南方言给部队讲课。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到根据地后一个月,陈青山就被任命为总队宣传科长,并协助总队参谋长李振亚创办了《军政杂志》。

同年11月,琼崖独立总队进行反顽作战。战斗中,他组织宣传鼓动工作十分出色,有力地配合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灭独”阴谋。

1942年初,陈青山调任总队组织科长。为培养总队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奉命主持政工干部训练工作。他为抓好干部训练而废寝忘食、勤奋地工作。他的悉心组织教导,为琼崖总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为党进一步进行武装斗争补充了一大批生力军。

1943年5月,琼崖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转移至澄迈美厚山区。陈青山调任独立总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其间与支队长马白山同志齐心协力,工作非常出色。由于马白山在作战中负伤,支队的军事领导工作也落到了陈青山的肩上。

同年7月,他亲率第一大队和猛进大队伏击日军运输车队。狡猾的日军见伏击圈地势险要,格外小心,还未进入琼崖独立总队预伏圈就下车徒步向前搜索前进。

陈青山在两位大队长的配合协助下,沉着指挥。由于适时下达了攻击命令,将日军运输部队全部放进“口袋”。经半个多小时的白刃格斗,共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敌3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数十支。

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军保六团团长和儋县县长共同指挥顽军1000余人乘日军“扫荡”琼崖根据地之机,大举进攻木排根据地。为击溃来犯顽军,陈青山配合马白山依据反“蚕食”斗争的经验,作出了“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决策。



当时由马白山率队坚守内线,陈青山率一个大队挺出外线,寻机打击顽军,开辟四里根据地。当进入四里地区后,陈青山随即抽出一批干部组织工作队,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并组织部队在洛基圩附近全歼监修公路的日军一个小队,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此后,又歼灭并驱逐了国民党顽军游击大队,使四里成为抗日的可靠后方。

在马白山和陈青山领导下,第四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不仅保存了和民、和祥、清平、洛基等根据地,还将白沙边区扩大成为抗日游击区,建立了以大星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并为总队进入白沙,建立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 3. 与少数民族首领“歃血为盟”的动人故事

1943年秋季的一天上午,四支队支队长马白山和政委陈青山正在用茅草房临时改成的司令部里研究如何“坚持内线、挺出外线”战略,突然,卫兵带进一伙人。

陈青山认识其中一个是中共临儋联县县长符英华,另外三个则不认识,看样子像是黎族人。这三个人面黄肌瘦,疲惫不堪,胡子拉茬,披头散发,全身近乎赤裸,只在腰间系着白藤,上面吊着的一片遮羞布——“吊裆”,也已经破烂成布条子了。

30年代,生活在海南山区的黎胞,女人着短裤,男人则仅挂那么一片布条。

如果不是符县长亲自领来,可能会让人以为是深山里跑出来的“野人”。

“父母军啊,可找到你们了,快救救我们吧。”



抗战爆发前,白沙县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成了琼崖国民党当局建立“抗战基地”首选之地。这里集结了国民党琼崖党政机关、守备团、保安团和九个县政府,共5000余人,偏安一隅。

在此扎营立寨的琼崖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的名义下,加重了对黎族、苗族同胞的捐税,使本来已十分穷困的黎族人更加穷困不堪。

以红毛乡为例,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个保每月必须缴纳粮20石,猪肉、牛肉、笋干各70斤,鱼100斤,鸡40只,木耳、酒各40斤,蜂蜜、蜂蜡、烟叶各120斤,白麻400斤,壮丁费200光洋。此外,还有“抗战粮”、“长官粮”、“参议粮”、“草鞋费”、“军服费”等等苛捐杂税。

当局的说法是:“国难当头,官吃主粮,民吃杂粮;官吃杂粮,民吃野菜。”

另外,还无休止地强求黎族、苗族人自带粮食和工具,去服各种各样的劳役,连孕妇、儿童和老人也不例外。

国民党驻军的保安团其实近乎土匪部队。黎族人无甚财产可抢,便“抢人”,将村寨的男人都赶到山上去,留下妇女供其淫乐,连老妇幼女都不放过。村寨田野时常可闻妇女的呼救声。

更有甚者,有的官兵甚至以杀人为儿戏。一个保安团的连长曾将一位苗族人生宰了做“下酒菜”。集体屠杀黎族同胞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真正野蛮的国民党军队视黎族、苗族为低人一等的“野蛮人”,任意宰割。

红毛乡的“乡长”叫王国兴,是黎族的“大总管”,按黎民风俗,头人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令行禁止,一呼百应。



但国军人驻后，一次，因红毛乡的粮食收缴不齐，王国兴被国民党军抓去吊在梁上一顿毒打，这位昔日声望显赫的大总管被打得浑身伤痕，口吐鲜血，惨不忍睹。

日军的侵略已使人喘不过气来，国军的胡作非为更让他们求生无望。头人王国兴坐不住了，他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遭此非人的折磨。

从1942年起，王国兴就以红毛乡为基点，暗中秘密串联。1943年春节期间，在红毛乡德伦山和什下山召开两次各乡黎族首领会议，决定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军对黎族人的迫害。

王国兴当然地成为起义的总指挥，秘密会议决定8月17日起事，鸡叫头遍时大家一起行动。按照黎族古老的传统风俗，黎乡的奥雅们（奥雅为黎语头人的意思）杀鸡饮血，对天盟誓。王国兴带头面对苍天跪下，起誓道：“誓与同胞们同生共死，若有背叛，蛇咬、火烧、雷轰、刀劈！”

说罢，王国兴将碗里的血一半洒在地上，余下的一半一饮而尽。其他人也都对天起誓，豪情地饮完血酒。

两个月后，各乡黎族头人举行了更高级别的盟誓仪式。各人用尖刀划破手腕，将鲜血滴在酒里，然后面对苍天，双膝下跪，高声发誓。

王国兴从随身带的箭囊里取出一支箭，用钩刀将箭“刷”地剁成两截，说：“我等为父老乡亲同心杀敌，如有背叛我黎人者，当如此箭！”

茂密的森林，呼啸的山风，预示着五指山下将有一场风暴来临。

转眼到了8月初，驻在白沙县一区向民村的国民党白沙县县



捕了前往开会的王玉锦、王正义等人。他还向士兵交代：等所有的“黎头”来齐后，一齐枪毙。

黎苗暴动，国民党军虽然损失严重，但黎族民众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因为这些黎族人只懂得使用砍刀、毒箭和粉铳（一种填硝磺炭末和铁沙的土猎枪），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官军的对手。

听至此，马白山、陈青山已明白了八九分……他们深深同情黎族同胞的遭遇，同时心中也不由得暗自高兴，他们心想：机会终于来了。

三个多月前，独立队第一、二支队主力挺进外线后，面临着日军与国军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冯白驹第一个想到的是，中共琼崖特委、琼崖抗日民主政府，还有独立队总队部这一大帮人马在何处落脚，倘若没有一个稳固的中心根据地来指挥全局，坚持长期抗战，几乎是不可能的。

冯白驹第一个提出：向琼西南方向转移。理由是：琼西南虽是新区，但区域广阔，连接着大山区，况且这里抗战前一直较为平静，人力物力都很丰足；琼东南则有许多不利条件：这里虽是老区，有群众支持的雄厚基础，但经济已遭重创，难以恢复；以嘉积至榆林公路为界，若向西边山区发展，会与国民党琼崖军政领导机关发生冲突，若向东边海滨平原发展，容易遭受日军围攻；这样，独立队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加狭小。

然而，在特委党委会上，多数人却主张向琼东南转移，建立内洞山中心根据地。

少数服从多数，冯白驹的提议遂被否决。

可以说，这一战略性行动的前因后果、具体困难，和东江抗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游击队曾生、王作尧部东移海陆丰相比,有极为相近之处。幸好,冯白驹的总部并未贸然行动,只是先行组建了一个第五支队去打前站,从而得以避免了重蹈东江游击队几乎全军溃散的覆辙。

1943年夏,中共琼崖特委组建了独立总队第五支队,挺进内洞山。

这时,东有在内洞山周围的日军几个据点,西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处于左右夹击之中。而内洞山周围的18个村庄,老百姓都跑得净光。第五支队开进内洞山地区后,经常断粮,靠采集野菜野果充饥。到了这里后,除了遭受饥饿外,可怕的疾病也随之传开,许多人受到了疟疾、痢疾、脚溃烂等病的折磨。支队长陈石也未能幸免,也病倒了。

特委不得不放弃在内洞山建立中心根据地的打算,取消了第五支队建制。

至此,特委方才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冯白驹的提案,向琼西南的六芹山转移,并准备向五指山下推进,创建山区根据地。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多次指示冯部进军琼西南。

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中共琼崖特委的电报中指示:“认真在30余万黎民中进行艰苦的联络工作,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不仅使他们不为敌伪所用,而且要使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战。必须认识到他们所在地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其他沿海地方都有敌伪盘踞的可能,只有有了黎民山地作为我军的巩固的后方,我们才能坚持长期抗战。”

中共中央这一指示之所以迟迟没有得到实施,是因为琼崖国民党当局已抢先一步,把这里作为“抗战基地”,捷足先登。在日军



攻陷海口、府城后不长时间，琼崖国民党的政府机关便迁到了白沙县，在此屯集重兵准备“持久战”。

两年后，王毅把琼崖警备司令部又搬到五指山的东边定安县境内。而人生地不熟的共产党员组织的独立队，一下子难以取而代之，加之深山少数民族黎、苗百姓历代以来屡受官府镇压，都对汉人防范三分，因而联络工作一时没有取得进展。

于是，琼崖特委决定成立东区、西区、南区三个地区的军政委员会，对各地区实行一元化领导。东区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为庄田、符哥洛，西区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为王白伦、李振亚，南区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为黄魂、符荣鼎。

与此同时，各支队的防区和建制也作了调整：由第一支队活动于琼东北之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第二支队在琼南之昌感地区活动并向白沙发展；第三支队仍在琼中之乐会、万宁一带，并向陵水、保亭和崖县发展；第四支队仍活动于琼西之儋县、临高，并向白沙发展。

新的发展目标的重点，显然在于由琼西、琼南两个方向，同时直指五指山下的白沙，这里，寄托着独立队的一个梦想，一个寻思数载而不得的梦想。

没想到，就在这时，白沙县的黎苗之变，给了冯部以绝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以实现进军白沙、圆“五指山之梦”的战略计划。

此刻，吉有理三人抱住了马白山、陈青山，激动得哭个不停，哽咽着说：“红军啊，你们原来在这里，快去救俚（我们）黎人吧！”

马白山看着王国兴写的呈文，大意是：黎人正受“国贼”的残害，现今被国贼困在深山老林里，眼看就要被剿灭，特请红军火速救援，云云。



少步枪和机枪,却一直不会使用。枪声一停,国民党军队便乘机冲出了包围圈,逃命去了。

五天时间里,白沙县境内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几乎全部逃出了该地。

白沙县是琼崖国民党政府惟一能安安稳稳呆下去的“抗战基地”,却未料到,竟然“后院起火”!王毅恼羞成怒,便乘着日军正在加紧对琼文等地共产党抗日武装“扫荡”、“蚕食”,日、共双方大战正酣、无暇他顾的时机,于9月底集中了手上的数千兵力,全力镇压白沙县的“黎民叛乱”。

黎族人手中的粉枪打野猪野兔还行,却敌不过保安团的机关枪,并且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遭到了惨重的损失,短短几天内,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各乡首领带着少部分人躲进了深山密林。

转眼间,轰轰烈烈的起义,变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大屠杀。国军的口号是:“斩尽黎子,杀绝苗人!”王国兴的家乡——红毛乡,从两个月前的2000余户,杀得只剩下十分之一。

村村寨寨大火熊熊,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成了砧上肉,被杀气腾腾的国军任意处死。

被捉住的参与起义的黎苗群众,受到的报复极为残忍。有一“招式”是这样的:先将人绑住,在其胸部划一刀,从背部猛踢一脚,内脏便抛出了体外。带头的奥雅(头人、蝮长),遭受的“招待”则是另一种:先剥皮之后浸以盐水,待其将死,再剖腹取胆……

至此,白沙黎苗起义看上去似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海南警司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的“匪首”王国兴。王国兴大难不死,潜回深山。

红毛乡的队伍被打散以后,王国兴率领剩余的一些人边战边



退,火药用完了,箭也射光了。最后,他们退到了山高林密的鹦哥岭。

王毅又派出保安团的队伍封住了所有的山口,把鹦哥岭下四周的村子全部烧光,悬赏捉拿“匪首”。

王国兴他们同山下断绝了联系,衣食无着。八九月份正是雨季,夜晚山风呼号,风雨交加,他们赤裸着身体无遮无盖。蚊虫、蚂蝗、瘴气,使不少人染上了疾病,死神威胁着这些处境艰难的勇士。

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头人们意见不一。有人说:“国民党军队是被日本人打进深山里来的,可以找日本人来把国民党军队赶跑。”

有人附和:“是呀,日本人比国民党厉害,就请日本人来帮我们打国民党吧。”

王国兴、王玉锦等人不同意:“日本人是侵略者,是来打我们中国人的,他们不会帮助我们黎族人的。”

那么,到底去找谁呢?

早在1927年土地革命初期,在黎、汉杂居的陵水县,成立过海南岛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共陵水县委的第一任书记黄振士就是黎族人。王国兴记得他的父亲王政和(也是一个黎族族长,1935年9月被当局以“抗粮抗税”的罪名逮捕)临死时对他说过:“世上只有红军是不欺负我们黎人的,没有出路时就去找红军。”

王国兴坚定地对大家说:“找红军去,这是我们黎族人惟一的活路。”王国兴又讲了他夜里刚刚做过的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他分明看见五指山上飘着五朵红霞,红霞里隐隐约约闪现着五面鲜艳的红旗,把半边天都染红了。红旗招展,指向东北方。这支打着红旗的队伍里有人向他招手,他想跑过去问问是不



是红军,可是两条腿不听使唤,眼睁睁地看着队伍跟着红霞走了,他一急,就醒了。

王国兴把这个奇怪的梦告诉了山上的弟兄们,大家都认为这是神的指点,那支打着红旗的队伍就是来搭救黎家出火坑的,红旗指出东北方一定是红军所在的地方。

也许这是天意,王国兴不该困死于绝地。他的梦真的应验了。

吉有理等三人,带着王国兴给红军的一张呈文,朝着王国兴梦中指示的方向出发了。他们三人挑上箩筐,装成盐贩子,带上一只狗,将呈文藏在竹筒里穿在套狗的绳子上,悄悄下了鹦哥岭,专门选择没有道路、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深山悬崖行走。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中共临僳县委所在地——和民乡的能仁村,见到了县委书记李汉、县长符英华,并递上了呈文。

随后,符英华又领着他们到了四支队的驻地。于是,便有了与马白山、陈青山相见的情景。

冯白驹命令四支队政治处主任江田安排带来的三个黎族人代表好好洗澡、吃饭、休息,他和其他特委领导,立即就白沙事态进行了紧急磋商。

特委一致认为:进军五指山区的白沙县,建立根据地,此其时矣。于是指示中共临僳联县和四支队立即派出得力人员组成武装工作组,随黎族武装前往鹦哥岭,帮助王国兴组织武装,为独立总队进山作战作好准备。

四支队参谋廖之雄等四人组成的武装工作组,带着山区斗争必备的火柴、硫磺、衣服、弹药等,来到了鹦哥岭。

王国兴一见到前来救援的“答伐”(红军),一把抱住廖之雄,热泪滚滚地说:“我们黎族人日盼夜盼,父母军终于来了,五指山出太



阳了!”

1944年2月初,中共琼崖特委又派中共临情联县县委副书记朱家玖、第四支队宣传股长郑心样(郑放)进入白沙,和先期到达的廖之雄组成黎苗民族工作委员会,以朱家玖为主任。

随后陈青山率领四支队第一大队,向白沙县的阜青、龙头乡挺进,成立了阜龙乡抗日民主政府,并在阜龙文头山建立根据地。

与此同时,中共昌感县委成立昌(江)白(沙)边区政府,配合第二支队向白沙三区发展。

4月份,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和第二支队奉命进入白沙县牙叉乡那繁村、什来苗村一带地区,以武装斗争配合县政府的组织建设,成立了白沙县临时抗日民主政府,由王国兴任县长,吴文龙任副县长。

“父母军进寨啦!”消息传开,躲在山上的黎族百姓纷纷下山回寨,拿出山兰酒慰劳“答伐”。

刚过三天,国民党守备二团集中两个营的兵力,向驻在那繁村的陈青山部进攻。

激战之中,第四支队参谋长王力征不幸中弹身亡。

为了保住五指山大本营,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兼行政长官丘岳宁不惜血本,亲自督阵,与驻地守军决一死战。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独立队渐渐力不能支,加上粮食来源受阻,只得奉命迅速转移。

王国兴恋恋不舍地与部队告别,他挽着陈青山的手,眼泪又流了下来,难过地说:“你们走了,我们又得上鹦哥岭了。”

陈青山则说:“我们的大部队还是要来的,你们在这里继续打游击,发动群众,等着吧,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这悲壮的誓言,五指山的丛林全都听见了,每一个死难的黎胞和苗胞都听见了。

此去灵台集旧部,深仇不雪誓不还!

冯白驹率领独立队的各路人马,以“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战略战术,成功地打破了日军“扫荡”。

1944年春天,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由此,华南抗战史上声名赫赫的“琼崖纵队”终于登台亮相了,与在广东东北部一带活动的“东江纵队”等,成为华南敌后战场上的生力军,极大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

以正规部队姿态出现的琼崖纵队,在司令员冯白驹的布置下,形成新的阵势:第一支队的主要兵力在澄迈和澄临边区,控制琼(山)澄(迈)临(高)山区根据地;第二支队在昌、感、崖、乐边界地区,逐步向白沙推进,策应第四支队的行动;第三支队的主要兵力在乐会、万宁一带,逼向陵、保、崖地区;第四支队在增、白地区,以主要兵力巩固阜龙地区,逐步向白沙腹地发展,并以部分兵力向海县挺进,与创建白沙根据地工作相策应。

陈青山带领四支队一大队,从白沙撤回信县的大星乡走兵岭,派人寻找王国兴余部。

王国兴在鹦哥岭上与国民党队伍周旋,环境险恶,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冲出重围,奔向白沙与儋县的边界。辗转多时,终于找到陈青山部,再一次请求出兵白沙。

他不停地对马白山、陈青山讲:“赫黎族老百姓给国贼杀光了,请红军父母救助黎族老百姓。”

马白山知道此事关系重大,要请示冯白驹和总部决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王国兴与陈青山等交往日深,觉得这两位“红军头人”是黎人可以信赖的朋友,提出要与他们歃血为盟。马、陈二人欣然同意。

一天上午,歃血结盟的仪式隆重开始。王国兴亲自操刀,杀鸡滴血,然后,又在自己的胳膊上划了一刀,把血也滴入碗里。马、陈二人照着王国兴的样子做。

双方饮罢血酒郑重宣誓。王国兴立誓要杀尽国贼,光复黎寨,同共产党的部队永世结好;马、陈二人亦宣誓:和黎族同胞团结一心,解放黎胞,光复中华。

冯白驹派人来了,接王国兴去总部所在地——澄迈县美厚乡绿现山黑藤水岭,表示了向五指山进军的决心,并决定成立“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郑心样、许世汇为副团长,王玉锦为参谋。王玉锦是王国兴白沙起义的积极支持者,早年被抓壮丁到过大陆,后曾进入黄埔军校,在黎族人中是一个见多识广、智勇双全的佼佼者。

1944年12月,由第四支队中的黎族士兵和白沙县的黎族青年,组成一支精悍的队伍。于是,白保乐解放团在王国兴、郑心样的率领下,重返白沙。

1945年1月,中共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决定迁驻阜龙文头山,并调集第一、第二和第四支队的重点大队(整训过的精锐主力),到阜龙及其周围地区,为进军白沙腹地作好军事准备。

3月份,东江纵队派出的联络员符气岱抵达文头山,转达了中共中央对琼崖抗日军民的慰问,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琼崖党和军队应该扩大、巩固中心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6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恢复琼崖抗日公学,史丹、符振中为正副校长,培养干部,准备作大的扩充和发展。



7月,三个挺进白沙的各支队重点大队,组成挺进支队,由李振亚任支队长,符荣鼎任政委,立即向白沙腹地进军。

他们在合口歼击国民党守备二团教导队,尔后兵分三路,向白水港、罗任、南挽推进,直捣红毛、毛阳、毛栈、毛贵和国民党后方基地文堂。国民党白沙县地方政权大部垮台。辛龙、红毛、细水、无门等13个乡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起来。

在此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乃撤销了白保乐人民解放团,正式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詹力之任县长,副县长为王国兴、王昌,在当地发动黎族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五指山区的白沙抗日根据地,至此终于建立了起来。琼纵机关也从阜龙南移,从白沙的保家、芭蕉村一带,转到了白沙县城牙叉。

千年百代以来,官府镇压黎苗人民、黎苗百姓对汉人隔膜极深的坚冰,终于在异族入侵、强敌弹压的共同处境中彻底打破了。生性慍悍的黎苗战士,壮大了琼崖纵队的抗日队伍。

### 4. 冯白驹破例为陈青山的婚礼批了十块大洋,陈青山感激地说:“司令员,我们的婚礼太隆重了。”

1945年夏天,在琼崖纵队总部驻地打道昂村的一间草棚里,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弥漫的浪漫气氛之中还飘荡着浓浓的硝烟味。

新郎陈青山、新娘何秀英在众人的“强迫”下,说起了他们的恋爱史:

1943年秋,独立队第四支队政委陈青山,率领所部第一大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开赴四里,准备在五指山外围建立四里根据地。在这里他们歼灭了在洛基圩附近监视民夫修公路的日军小分队,又将盘踞在此的国民党八个游击大队赶出了四里地区。

不久,冯白驹带着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部机关,搬到了附近的走兵岭,召见第四支队队长马白山和政委陈青山。

总部搬到这里以后,由于山里瘴气太重,水土不服,许多人生病了,拉痢疾、打摆子、烂腿等病症者急剧增多,加之缺医少药,有一部分人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非战斗减员相当严重。冯白驹一看着急了,便要率总部回澄迈,临行前将病员交由当地中共区政府和四支队安置。

何秀英是纵队的演员,也染了这种病症。当陈青山走进住在支队部附近的病号房,看见何秀英后,不由得笑了起来。以前他曾看过何秀英的演出,印象很深。何秀英是琼崖根据地的“大明星”,人称“海南一枝花”,没有人不认识她的。但事有奇巧,陈青山想不到竟在这里碰到了何秀英,病中的何秀英脸色有些灰黄,神情虽有些倦怠,那双迷人的眼睛却越发显得大而亮。

“秀英同志,你是哪里人?”陈青山坐在何秀英的对面,随意地聊了起来。

“我家在香港,我是来琼岛参加抗战的。”

“这么说,我们同是归侨了。”陈青山说,“我家是马来亚棋城的,我是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由党派来琼岛的。”

“想不到你也是归侨!”何秀英眼睛一亮,仿佛是他乡遇故知,“我爸爸和弟妹们现在都在新加坡,我也在新加坡生活过。”

她对陈青山顿时有了一种亲切感,不仅仅因为同是华侨、小知识分子,而且陈青山的热情、爽朗,加上他那英俊的面孔,魁梧的身



材，颇有男子汉的风度，这都让她产生了好感。

在养病的一个月里，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地，何秀英对陈青山的身世有了详细的了解。

此时，四支队已在五指山下站稳了脚跟。与何秀英相知日深，又让他平添了一种异样的心绪。何秀英病愈后要归队时，他把她一直送到了临高县的木排旁，两人恋恋不舍地就此分了手。

转眼到了第二年，陈青山应召回到了总部，汇报琼崖西区军事委员会的情况，又一次见到了何秀英。

冯白驹已听人说过他们在谈恋爱，就催促陈青山去向姑娘发起“进攻”。

在何秀英住的草棚里，陈青山直截了当地提出：“秀英，咱们订婚吧。”没想到，正在生病的何秀英心绪不佳，婉言拒绝了。

陈青山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四支队，不久，他收到何秀英从文昌寄来的一支钢笔，并附着一封充满感情的信，陈青山心中大为快慰。

1944年春，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即惯称的琼崖纵队）正式成立。陈青山奉命调回纵队总部，任政治部组织部长。

这一来，陈青山与何秀英见面的机会多了，在草棚里，在椰子树下，都留下了他们依恋的身影。

在这种战争的环境里，在荒山野岭，爱情也因之变得纯真而深沉，充满了一种别样的韵味和诗意，硝烟战火中涌动的情热，产生了一种新的冲动。

1945年夏，陈青山和何秀英向组织打报告，申请结婚。

报告送到了冯白驹面前，他大笔一挥，批示：“甚好，同意。”他把纵队总部管理科长陈英叫来，交代说：“陈青山与何秀英要结婚，



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杨少民任西区地委书记，陈青山为副书记。

为积极协助杨少民工作，陈青山为西区的土改运动和巩固扩大西区做了大量工作。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1948年初，陈青山调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强调纵队要注意学习野战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是年秋，特委和纵队任命他为东区地委书记兼琼崖纵队第三总队政治委员。

1948年秋至1949年夏，他率领总队先后参加了琼崖纵队发动的秋、春、夏三大攻势，并会同其他总队共同歼灭国民党军3800余人，解放县城三座、墟镇30余座，使解放区扩大到占全琼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在此期间，他还担负了训练干部、编写教材，主讲课程等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为重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为琼崖纵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了解放海南的命令。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积极准备接应和配合大军渡海作战。此时，陈青山又调回纵队任政治部副主任。

1950年2月的一天下午，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同志把陈青山叫去，面带笑容地对陈青山说：“青山同志，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区党委、纵队党委决定派你率领一总队到琼西去接应四十军渡海登陆部队。在琼东接应四十三军渡海登陆部队的任务，已派吴克之副司令员指挥三总队和独立团去完成。你过去在琼西地区战斗过，对当地情况熟悉。你的意见怎么样？”



## 中国人民解放军归侨将领传奇

听了这话,陈青山心中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终于盼来了野战军渡海作战的日子,担心的是时间紧迫,肩负的担子却不轻,怕完成不好任务。

但陈青山想到这是党对他的高度信任,便毫不犹豫地回答:“请领导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回到政治部,陈青山把手头的工作作了交代后,便带着一部电台和几个机要、警卫人员匆匆上路了。

一总队驻扎在新民县的藤塞浦,离纵队机关驻地约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经过五天的艰苦跋涉,陈青山一行顺利到达了一总队队部。

陈青山和总队长陈求光、副总队长辜汉东、副政委林阻、政治部主任黄歧山等总队领导见面后,向他们传达了冯白驹司令员的指示,讲明了作战任务。大家听后异常兴奋。

经过研究,确定由陈青山和陈求光、黄歧山组成接应指挥部,由团长李福文、政委许世准率领七团到澄迈的美厚、西昌、坡尾一带,迷惑和稳住澄迈、临高的敌人;八团的一个营由政委李恩铭率领插向据县、临高交界地域,控制临高的敌人;九团全部和八团的两个营负责接应。另派九团副团长卓志诚率领一个侦察分队,先行出发到增县沿海去进行侦察。

与此同时,陈青山还与西区地委书记兼一总队政委罗文洪取得联系,在藤寨坡召开了西区地委、行署及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会议,决定进一步动员各县、乡的支前组织,做好接应渡海部队的准备工作。

为选择好登陆地点,陈青山与第一总队领导派出多股侦察力量,反复侦察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摸清敌兵力配置情况并弄清了琼



直到下午3时,渡海部队才冲破敌机和敌舰的阻挠,到达登陆点。于是,陈青山指挥的接应部队以猛虎下山之势向海边防御之敌冲击,歼灭了据守登陆点地区国民党军的两个连,从而使先锋营迅速得以登岛。先锋营登陆后,陈青山一面组织部队抢救伤员,一面派出部队掩护登陆部队向安全地区转移。

6日下午,一总队与偷渡部队在排浦港海岸胜利会师。然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胜利地到达了白沙根据地的保家村、芭蕉村一带。这时,敌人从那大出动一个师,尾追面来。为了保存力量,他们仅以一总队的部分兵力与之周旋,并使敌人屡屡扑空。

3月12日,渡海先锋营和第一总队接应部队联合召开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会上,陈青山宣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十五兵团和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纵队发来的嘉奖令,先锋营和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因之士气进一步高涨。

3月19日,琼崖纵队和四十军军部分别发来电报,要一总队立即向增县西北部的光村挺进,准备迎接第二批潜渡部队登陆,一总队又组成了以陈青山为首的琼西接应指挥部。陈青山派九团一部前往增县大成、大星一带迷惑并牵制敌人,主力部队则利用暗夜迅速向光村方向直插而去。

经过两夜急行军,接应部队到达了临高县的木排一带。第二天晚上,当前进到东成地区时,九团报告说,发现敌一五九师的一个团进驻东成以西3公里的长坡市,驻和舍的敌人也有一部分往光村调动。

指挥部马上用电台与四十军联系,向他们反映了这一新动向。四十军回电要一总队停止前进,并告诉他们,敌人已知道我们的行动意图,派了两个师,准备在东成至抱舍一带的山路上伏击我们。



苟参谋长气愤地骂了一句：“可恶，这家伙叛变了！”

陈青山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参谋长告诉陈青山，他们营有个刚解放过来的文化教员在行军途中逃跑了，他推断十有八九是这家伙叛变投了敌、泄露了军事秘密。当时形势十分紧迫，不容多想，他们立即回师木排村隐蔽起来。

到木排村的第二天，四十军来电，将登陆地点改在临高县北部的临高角，要他们在25日拂晓前前往接应。

接应部队一行人星夜兼程，于24日赶到临高县城以西的高山岭附近，准备第二天迎接登陆部队。但不久四十军又发来电报，说因风向不对，登陆改期。这一变动，使他们感到左右为难了。

要知道这一带海边地势平坦，几千人马目标很大，根本无法隐蔽。

就在几公里外的临高县城驻有敌人的一个师，离他们不远的高山岭上也有敌人一个团部和一个炮连。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遭受损失是小事，过早暴露大军登陆意图，影响登陆任务的完成却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可是，如果部队后撤了，一旦登陆部队来了，他们很可能就来不及赶到海边接应，这同样会影响登陆任务的完成。怎么办？

他们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许钦明和符风耀，大家一起商量对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依靠群众，就地隐蔽，并立即把情况电告琼崖纵队和四十军。

当天，部队开进附近的几个村子，分散隐蔽。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派一个营插到澄迈县的美厚一带活动，派两个营往回走。就这样，他们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无声无息地潜伏了三天三夜。

26日，四十军来电，说登陆部队定于当天傍晚启航，第二天拂



晓前在临高角登陆。

当天晚上他们即进入预定位置。三五二团团团长罗绍福和一总队八团团团长伍向华率领渡海先锋营一个连和八团一个营,到临高角的雁棠、扶提、禾登、新村一带,准备拔掉海边的敌人据点。八团副团长王统江率领一个营,在高山岭附近和美珠村一带阻击由临高城和波莲墟来援之敌。八团另一个营则对新兴、东兴、美更方向进行警戒。渡海先锋营两个连及迫击炮连、一总队警卫连、七团两个营为第二梯队,在何朗村及北面高地集结。接应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高山岭下一个小山包上的多贤村。

27日凌晨4时,渡海部队给他们发来电报,说他们航行顺利,离登陆点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了。于是,他们立即命令各部队按预定计划行动,开辟登陆场。

四点多钟,拔除海边据点、占领滩头的战斗打响了。这里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一直到天亮,他们仍未能把登陆地段的口子撕开。

天快亮时,从澄迈方向的海面上传来了一阵阵枪炮声。他们用电台与渡海部队联系,没有回音。指挥部判断,可能是渡海部队临时改变了登陆地点,正在澄迈方向与敌人战斗。他们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琼崖纵队和四十军。9点多钟,四十军复电,证实渡海部队已在澄迈海岸登陆。

登陆部队不在这里登陆了,可是开辟登陆场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大批敌人很快就会出动增援。下一步怎么办,经过紧张的研究,他们最后决定:立即将情况向琼崖纵队汇报,让纵队通知西区地委和澄迈县委,赶紧做好接应工作;派同渡海先锋营一起过来的一一八师侦察科长带领渡海先锋营侦察连和一总队短枪排沿海



岸插向澄迈，相机做好接应工作；他们继续同敌人在这里坚持打下去，并设法把澄迈、临高附近的敌人吸引过来，从而达到间接策应和支援登陆部队的目的。

中午，敌人一个师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八团三营的阵地扑来。这个阵地位于高山岭下美珠村外的一个小山包上，如果这里失守，设在多贤村的指挥部和插向海边的部队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部队的退路也将被截断。敌人进攻的势头越来越猛，猛烈的炮火打得三营阵地硝烟弥漫，成连成营的敌人像一群群蚂蚁直往上爬。三营在八团副团长王统江的指挥下，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沉着应战，勇猛杀敌。他们命令渡海先锋营的迫击炮连进行火力支援。炮弹准确地落入了敌群，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三营受到很大鼓舞，直至黄昏，他们始终没有后退半步。

夜幕降临了，在完成了吸引牵制敌人的任务之后，陈青山指挥部及时撤出战斗，迅速转移。经过了一天的血战，战士们都疲惫不堪，但大家心里想的不是吃饭睡觉，而是渡海部队的安危。

30日，他们在澄迈县美厚乡与渡海部队胜利会师时得知，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率领的一个加强团，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协同指挥下，26日傍晚，他们乘坐的八十一艘木帆船横渡琼州海峡，途中风停雾大，船速很慢，无法在拂晓前到达指定登陆地点。

为了避免天亮后在海上遭受敌机、敌舰空中和海上攻击，他们临时决定在澄迈的雷公岛至玉包港一线强行登陆。在抵近海滩涉水抢岸时，收发报机浸水损坏，因而中断了联系。马副司令员是澄迈人，对当地情况熟悉，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协助下，部队很快向根据地转移了。



时,以迅猛的动作发起猛攻,打得敌人猝不及防。经过半个小时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高山岭上的敌人全部被歼,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这时,渡海部队正在抢占滩头阵地,与海岸上的守敌展开激战。随加强团先期登陆的一个野炮连此时立即赶上高山岭,用刚刚缴获的野炮向正在与渡海船队交战的敌军舰猛轰,打得敌舰狼狈逃窜。紧接着,他们又转而瞄准海岸上的敌据点,一个个地将其敲掉。

就在高山岭的战斗打响不久,插向临高角海边的部队也很快扫清了敌人在海边的防御工事,歼灭了美夏、昌拱、东英等据点里的守敌,开辟了登陆场。

渡海部队大举登陆时,两个团的敌人从美台前来增援,遭一总队七团坚决阻击,始终不能推进半步。

这时,四十三军两个团的渡海部队也在林诗湾的雷公岛、才芳岭一带海岸登陆了,然后迅速插至桥头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驻守桥头墟的敌六十四军一个团的敌人,并包围歼灭了花场墟的守军,与前来接应的部队在福山坡一带胜利会合,并将福山墟的守敌合围歼灭。

敌人大肆吹嘘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了。渡海登陆部队进展迅速,到17日下午4时,已向纵深推进了10多公里。黄昏时分,韩先楚、解方等同志来到多贤村。韩先楚副司令员满面笑容地对他们说:“你们打得好!你们辛苦了!”然后,向他们询问敌情以及他们自身的一些情况,同他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最后,韩副司令对他们说:“我们还要往前赶,消灭逃跑到美台和加来的敌人,然后配合四十三军消灭澄迈的敌人,最后解放海口市。临高县





































































































































